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1857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借向天京南门将士“讲道理”之机，避开安王，福王等人的耳目，潜出天京城，从此一去不返。

《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奏，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镇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铜井是个小镇，而石达开全军一日内便完成渡江，可见此时追随他的军队人数不会太多。而且正因人数不多，洪秀全还曾派人追击石达开。

《福济等奏金陵内讷请飭鄂赣相机防剿折》称，6月9日“石逆由金陵率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无为)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辞意，惧洪逆过甚，惧怕脱逃。”据此折，石达开到达安徽无为开始张贴五言告示时，所率军队应在数千人--应是他离开天京时的人数加上这些天来投奔他的人数总和。

7月2日，德兴阿在奏章中称，“洪逆甚为惊慌，因将城门紧闭，又以石逆尚在安庆，多方邀留，以图固结其心。”追击不成，洪秀全怕石达开会一怒之下纠集军队攻回天京，因此天京城门紧闭，对石达开的态度也转成了“多方邀留”----看来洪秀全对石达开的邀留是从石达开到安庆后便有的姿态。可是在同一时期，他却对进言“仍重用翼王”的李秀成严加处分，可见其邀留从一开始就缺乏诚意。

是年夏天，湘军乘机大举进犯江西太平军领区，攻陷瑞州，困重镇九江，临江，吉安。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由此可以看出，石达开的进军江西和后来的进军浙江正是这个“兵分三路，配合作战”的方案的一部分。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五至七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据《李忠武遗书》记

载，东梁山一带都是石达开的部下，他们前来追随石达开时，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只是“其党皆不肯，仍从石逆在安庆。”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对于某些自愿来追随他的队伍还曾劝他们返回原驻地。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知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拥护石达开的部队很多，但愿听石达开指挥的部队并不等于随其南下江西和后来远征的部队，而没有共同南下的部队也并不能说就是对石达开命令进行了抵制。《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是不符合实情的。

#### 入赣作战过程：

10月初，石达开从安庆渡江，经安徽建德，至江西景德镇。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曾派小股部队分扰彭泽，湖口，都昌，饶州，乐平，万年等地，目前不少记载都将这些地区的军队误为主力，其实石达开部主力是自景德镇走捷径以最快速度直趋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抚州。他们准备先援救被清军重重围困的重镇临江，吉安，肃清赣西清军，逐步收复失地，再倾力与南昌，九江一带的湘军决战。

是时，国宗杨辅清，石镇吉等率部自金溪，泸溪前往会合。清西安将军福兴，总兵李定太据守弋阳，东乡而同知李元度孤军守贵溪。石达开决定先夹击贵溪湘军。他命石镇吉往抚州援临江，杨辅清攻贵溪。11月上旬，杨军先胜后败，赣东战事受挫，石达开决定西进，与石镇吉南北两路援临江。但石镇吉受阻于张运兰，遂改为南援吉安。

而石达开本人率军由北路南进，进攻东乡。

11月19日，大败湘军副将周凤山部，斩道员帅远铎。

11月24日，击溃清军总兵李定太部。

12月上旬，在三江口再度大败周凤山部，兵锋逼近临江，并与抚州援军会师。

接着，石达开由抚州出发，向西挺进临江，吉安，其中临江城已经近在咫尺。但两城均在赣江以西，要想赴援，必须强渡赣江。而石达开部缺少水师，湘军水师炮船却在赣江中来往巡逻，将一切船只拉到对岸，使太平军无法使用。

太平军抢渡不成，石达开决定另外寻找渡口，于是挥军南下，七天之内，急行军两百里，历经新干，峡江两县地界，直到吉水。从12月20日开始，在吉水县以北的三角滩一带，太平军与清军进行了持续半个月的血战，在湘军内河水师与陆军的联合阻击下，反复冲锋。湘军深知赣江是阻止石达开进援临江吉安的唯一可恃之地，一旦被石达开渡过赣江，立即与守军对困城清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是以陆军死守不退，水师不断开炮猛轰。最终太平军由于部队伤亡太大，被迫北撤，退回抚州。

从整个驰援赣西的过程看，前一个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太平军自江西景德一路南下，冲破了重重阻击，很快到达了救援的目的地--临江，吉安。然而最终作战不利，主要原因是缺乏水师配合，在湘军水陆夹攻之下，无法渡过赣江。

临江在石达开北撤后不久，即于1月下旬为清军所陷。至此，赣江以西只剩下被重重围困的吉安一城，战事已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立即施行他在奏章中向洪秀全提出的第二个计划--东进浙江，以开创新的局面。

1858年2月16日，石达开率稍事休整后的部队自抚州，进贤，东乡率军东进，经贵溪，鹰潭向赣北推进。湘军将领李元度，西安将军福兴在鹰潭，弋阳等处，不敢膺其兵锋，退守铅山。

3月10日，石达开占领弋阳

3月15日，石达开攻克铅山，福兴退守广信(今上饶)。杨辅清所部也按计划于此时抵达铅山，于是分并两路，杨辅清率军入闽，石达开则率军北进。

3月19日，石达开先是大败广信清军，斩福建游击赖高翔，围江西广丰。随后在广丰大南桥击溃清总兵饶进选，副将周迈远。

4月12日，石达开在广丰击败浙江游击杨国正。

而后，石达开率军自广丰离开江西，进入浙江地区。

简析：

石达开为什么在安庆期间没有去和湖北作战的陈玉成配合？首先，他身边开始只有几千人，想配合也难。其次，他不清楚，如果他率兵行动，和其他太平军部队间的关系如何，所以不可能直接介入本军的战场。如果几支互不相属的军队同时参与一场战争，可能造成极大混乱。这也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石达开早不离开安庆，晚不离开安庆，偏偏选在送“义王”金牌的使者离开后不久离开安庆？因为那位使者终于使他可以找到自己在太平军中的位置。

再看他为什么“不援救九江”？当时九江重兵云集，敌军长濠坚垒，以逸待劳，贸然将有限的人马投入九江城下与敌人正面交锋是反主为客的下策，极可能与对方陷入混战中无法自拔，难以其扭转乾坤的作用。后来的安庆会战中，英王陈玉成与湘军在安庆城下连番苦战，结果主力兵团精锐损失殆尽，也没能救下安庆，便是一例。

所以，石达开没有直接前往九江，反而绕道前往抚州以援救另外两座江西重镇--临江和吉安。曾国藩此前为咸丰策划招降石达开时说，“以江西言之，瑞州、临江为根本，抚州、吉安为膏腴”，并说如果石达开献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中的任意一二城，就敢担保石达开是“真心归附”，可见临江，吉安，抚州的重要性了。而如果能够顺利地救下这两座重镇，就可以肃清赣西，再回师向东以救九江。当年石达开困曾国藩于南昌时，就是这样避开对方的精锐，从临江，吉安切入，直逼南昌，结果九江之围不救自解。

九江，临江，吉安，三点一线。石达开从临江北上，就会与九江守军对围困九江的清军形成夹击之势，里外合围，使其腹背受敌。这无疑比直接将有限的军队投入与湘军精锐的正面鏖战中更有胜算。而九江城防坚固，守军勇猛，假如石达开能够顺利救援下临江，吉安的话，九

江应该是可以坚守到援军到达之时的。因此，石达开救援临近与吉安与救九江并不矛盾。“从丰城、新淦等地插入瑞州与临江、临江与袁州之间，首先收复这里的失地。这个计划若能实现，不仅可解临江之围，夺回失守的袁州、瑞州，而且将会一举夺得江西战场的主动权：南下即可唾手而解吉安之围，东进威胁南昌，北上则兵临九江。这样就可与皖北陈玉成部对湖北成夹击之势，进而西征武汉，太平天国又将恢复到石达开主持西征时的全盛时期。这是一个既可救陈玉成，又可救江西战局，还能从根本上救天京的三全其美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要比先救镇江或九江，将敌人吸引到天京城下硬拼，确实棋高一筹。”（赵三军《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战场危局辨》）

有文章指石达开援救为虚，拉拢部队为实，如果这样，吉水之战决不至于打得这么艰苦，太平军在湘军水陆夹攻之下正面冲锋，不但兵力损伤很大，且有不少将领阵亡。如果石达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拉拢军队，那也太得不偿失了。更何况中间曾七天急行军两百里呢！

又有人说石达开本来没有决心救临江，吉安，他急着救吉安是因为翼贵丈黄玉昆在吉安。黄玉昆早在石达开赴援吉安前二十天以前就已经战死了。而且黄玉昆在吉安被困已久，如果石达开是为了着急救他才急弛吉安，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前往吉安而不是临江。

而如果说石达开愿意救临江和吉安，则没有理由不愿意救九江。说石达开因为和洪秀全闹别扭所以不救九江，却愿意付出极大代价去救临江，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观石达开所部在江西的活动，虽然在吉水遭挫，被迫放弃了援救临江，吉安的计划，但稍事休整后，兵锋仍然相当锐利，自抚州起至进入浙江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势如破竹，几乎是所向披靡。可见所谓其“士气不振，接连受挫”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石达开部援赣受挫后，湘军将领李度元曾积极对其进行策反，企图利用石达开与洪秀全的矛盾及军事上的失利来招降他，让他与湘军合作一举攻下金陵，由此得到湘军从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这当然是痴心妄想。后来因为李度元一厢情愿，纠缠不清，石达开“乃以大笔书一难字作答”。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二)东进浙江

### 一 东进浙江的战略

1858年4月15日，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克浙江江山，开始了在浙江长达四个月的活动，其间，围困衢州三月，一度攻占了浙西南的广大地区；同一时期，跟随石达开作战的杨辅清率部挥师福建；两地太平军声气相通互为应援。

有关石达开的这次入浙，向来史家多以为是无目的的流窜，是坚持分裂的表现。有的论者虽然承认这次军事行动减轻了天京方面的压力，却认定这仅仅是“客观效果”，而不承认是有计划的主观努力。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便说：“这是一条最不可取的路线，进入浙江、福建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是石达开消极行动，缺乏信心的表现……石达开进军浙、闽，客观上确实减轻了清军对天京的压力，但这并不是石达开有意这样做的，只是由于石达开入浙，清军大动了干戈，才在客观上减轻了天京的压力。”

前章曾提到的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附片可以证明，一直以来人们对石达开入浙行动的二种指责都是不合事实的。奏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这一奏片系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送到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军，而当时清廷上下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有皖，鄂，赣，闽，粤五种，浙江却在意料之外，德兴阿若非真正见到石达开的本章，他不会、没有必要、也不敢信口开河地在六百里加急中捏造石达开欲“窜扰浙江”的“伪章”和“洪逆伪批”，且奏片中提到的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赴长江下游后来也成为事实。这一奏片说明，石达开在离京数月之后对自己的行动仍向天京报告，洪秀全也仍有批复；石达开仍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各地将领，包括未随他远征的部份将领，他的东进浙江并非临时起义的“盲目流窜”，或者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而是一个早有预谋，曾经报经洪秀全本人批准的内外线协同共解天京之围的方案：在内线，由西线太平军主要将领直接应援天京；在外线，由石达开和杨辅清相互呼应，进军浙闽，减轻天京压力，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

针对这一奏片，近来有学者扬言，片中所提援应天京的将领都未随石达开远征，因此只是石达开明知这些将领拒绝“分裂”而故作姿态，故意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出于自己的命令，送一个“顺水人情”而已。

窃以为这种推断完全不合情理----须知，德兴阿截获的不是布告，日记，也不是信函，而是石达开上给洪秀全的奏章。石达开上这份奏章的时间正在洪秀全赠其“义王”金牌前后，作为当时太平天国毫无疑问的第二号人物上给第一号人物的直奏，旁人是无权也没有机会看到的。如果石达开是故作姿态，也只能是作给洪秀全一人看的。以洪秀全的心机之深和对石达开的疑忌之甚，难道会被这种伎俩蒙骗？以石达开对洪秀全的了解，难道会对其有如此低估？这种“故作姿态”除了凭添洪秀全的反感，进一步恶化君臣关系之外，对石达开还有什么益处可言吗？难道石达开能预料到这份奏章将被清军截获，保存于故宫档案，流传到后世而成为给他“定案”的旁证材料？或者他仅仅为了这种“可能性”而故意把自己的军事计划泄露给敌人？----何况德兴阿的奏片并非截获于送往天京的途中，而是洪秀全作出批复后送往石达开军中的路上！更何况，洪秀全正愁捉不到把柄打击石达开在军民中的崇高声望，如果石达开竟敢公然欺君，把各位将领们的自觉行动说成出于自己的命令，只要洪秀全将此奏传示各将，石达开岂非弄巧成拙，自绝于诸将，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声名狼藉？石达开会愚蠢到去编造一个如此容易被戳穿的授人以柄的谎言吗？这种诠释史料的手法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感，实在令人遗憾。

石达开与天京方面及没有随他远征的将领间所保持的合作关系后文另有说明，在此谨提供另外一条与德兴阿奏出处不同史料：《东华录》咸丰卷载福兴奏片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这再次印证了德兴阿奏片所说的石达开为回应天京的“求援”而作出进兵浙江决策的说法。（此处提到进军浙江的太平军“号称十万”，按当时太平军各部常常有意夸大自己的兵力，如北伐军有“以一为四”的习惯，即对外宣传时将实际兵力夸大4倍，因此石达开部入浙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在3-5万当是合理估计。）

1853年至1856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多次会战，从未用过进攻浙江作为配合，为什么到了1858年时石达开会想到利用攻浙减轻天京压力呢？

这恐怕要追溯到 1856 年的一破江南大营之战。对于该次战役，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石达开在决战开始前分兵攻打溧水，将张国梁部调开的“声东击西”战术，而忽略了石达开的另一重要部署：1856 年 4 月，石达开奉东王令自江西回师天京参加解围战，途中取道皖南，攻克重镇宁国、芜湖等处，并命部将张遂谋留守宁国，经略皖南基地。这样，太平军实际已经取得东进苏南和浙江的前进基地，令清军头目们陷入极大恐慌。如向荣认为，“现在上游贼焰肆炽，广建一带处处可通苏浙，我军惟集高淳，仅能截贼入苏之路，相机进剿，而入浙各路仅有秦如虎一军扼剿，力难周密”。由于苏浙是清政府在江南的财赋基地，是赖以补给江南军用的主要筹饷地之一，更是天京战场上清军的主要饷源和后勤所在，向荣除急忙从大营调兵开赴皖南外，又请旨调悍将邓绍良暂回浙江“调度防剿，以顾大局”。按照石达开和张遂谋的部署，皖南太平军在对江南大营的总攻打响之前曾多次向东发起牵制性攻势，吸引了邓绍良等部上万清军，使其无法增援向荣，从而确保了天京战场的太平军居有绝对优势兵力，对顺利攻破江南大营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石达开张遂谋当时的战略使命是攻破江南大营，无力重兵东指，但皖南的军事部署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浙江对于清廷和江南大营的重大意义，而清军在太平军做出东进姿态后所表现的慌乱，更使他们确信攻浙江为清廷之所必救。因此，在石达开受到洪秀全排挤的情况下，以“攻浙”吸引清军，减轻天京的压力，就是水到渠成的战略选择了。后来脱离石达开的“六十七将领”在给洪秀全的奏本中曾提到“翼王专听元宰张遂谋筹画……进攻浙右衢州”，这一奏本为了推卸远征责任，对石达开有很多捕风捉影甚至捏造颠倒事实的指责，又因这些将领毕竟深受石达开之恩，不忍过份贬抑，往往将焦点转移到张遂谋身上，因此这一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不过从以上考证看来，张遂谋曾是“皖南牵制战略”的直接执行人，对清廷的弱点体会最深，因此攻浙战略由他力主而得到石达开的支持也在情理之中。果真如此，则更证明了石达开东进浙闽计划的拟定是“蓄谋已久”的。

另一个问题是，“分金陵之势”是石达开攻浙战略的唯一目标吗？窃以为，石达开在衢州城下持续攻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石达开有在浙江建立长期根据地的打算。

有论者认为，石达开在衢州不能速克的情况下，没有抢在大批援军到来之前放弃衢州，集中全部主力直下杭州是种失策，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原因之一是由石镇吉率领的部队当时已经深入浙江腹地，太平军最终未能直下严杭并在浙江建立根据地的原因实在浙江战场之外；原因之二是衢州地势险要，素有“铁衢州”之称，不易轻下也属意料之中（后来 1861 年 5 月侍王李世贤率大军 10 万攻衢，同年 10 月忠王李秀成亲统大军再度攻衢，也都未能得手）。但衢州为浙皖赣三省通途，若出于建立根据地的长远考虑，拔掉这颗钉子应是势在必行的。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1861 年太平军由于衢州急切难下便弃而不打，直接深入腹地，结果是给浙西基地留下一个严重隐患。

还有人认为，石镇吉部的活动目的不在于深入浙江腹地开辟根据地，而仅仅是衢州战役的一部份，意在分散清军兵力，但也造成了自己兵力的分散，得不偿失。笔者同样表示异议，原因也有两点：其一，如果太平军局促衢州一隅而不深入腹地，威胁最富庶的金华严杭地区，是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调动清军，起到为天京减压的作用的，因为清廷最担心的是太平军摧毁他们的战略后方。（正是基于相同的认识，1860 年李秀成等人以“围魏救赵”之计为天京解围时，将奔袭的目标选定为浙江腹地的杭州）。其二，石镇吉部的活动主旨在于开辟浙江根据地而非配合衢州攻坚，分散清军兵力至多是其附带作用。这从石镇吉部攻占各地后多派兵驻守而非随占随弃，以及会同石镇吉作战的将领“显天燕”陈享容张贴于金华府永康县的告示中可以看出：

“显天燕正军政司办理永康县民务程为晓示义和孝义士庶口等知所亲上痛痒有告事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途，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我天朝制度维新，举于国者居一邑之尊，名称监军，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

后文更提到已经举得“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等，该告示显示，石达开部曾在永康设“军政司”“办理永康县民务”，并且出告安民，举官图治。另据《处州府志》记载，石镇吉部在处州也曾“立师、旅、卒、两、伍名目”，建立乡官政府。可见深入腹地的石达开各部在占领地区多有建立地方政权之举，其活动自不止是为了配合衢州城下之战，而更是为在浙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纵上所述，石达开东进浙闽是个“一石二鸟”的战略计划，一方面可以吸引清军兵力，减轻天京战场的压力，另一方面意在开辟东线战场，建立浙闽根据地，从而达到扩大太平天国版图，使苏、皖、鄂、赣、浙、闽六省太平军声气相通的目的。具体方案则是兵分两路，一路在衢州实施攻坚，清除未来浙江基地的后患，另一路则利用清军为防守衢州而收缩兵力造成的腹地空虚长驱直入，攻城略地，着力于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并进一步威逼严杭。

石达开脱离天京政权是被逼无奈，但东进浙江的行动表明他当时并无意远离太平天国辖区，更无意成为“流寇”；相反，他让出了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避免了因为“地盘”争端造成内部矛盾激化，却有心在临近的浙闽地区建立长期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与天京势成犄角。江南大营以苏、常一带为腹地，将浙江作为其巩固的后方。若占领杭州，则其腹地变为前沿，进则江南大营根本动摇。而且，从后来历史的发展中看，中外势力联合起来绞杀太平天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倘若石达开在1858年就在浙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继而控制除上海以外的天京东线广大地区，局面势必与1860年以后才着手开拓东线大为不同。（对列强而言，进攻抵抗力量基本已被消灭，新的秩序已经确立的建有稳定地方政权的地区所需付出的代价，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远大于攻击尚未来得及稳固控制的地区，风险性会大为增加，回报率则显然下降），因此，这也是一个曾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写太平天国历史的战略规划。

## 二 入浙作战的情况

石达开部入浙不久即分兵攻占了衢州附近的常山和开化，此后三个月间，这支部队一直控制着常山开化两县及周边地区，并保持进攻姿态，频频骚扰皖赣浙边境，与驻守江山的太平军一起有效地牵制了清军的增援部队，支持了主力的战斗。

扫荡了常山、开化以后，石达开率军从三面围攻衢州，网开一面，留下北门，想迫使清军从北门撤退。清军则从福建调来总兵饶廷选等所部近万人，又从皖南调来江长贵、周天受等军，并把衢州附近各县兵力全部收缩拢来，集中加强城防。再加上各方面闻讯赶来的救兵，守城兵力迅速增至两万人以上，但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仍然险象环生。双方在作战中互有伤亡，其中6月4日一战，太平军在东门外大败清军，总兵饶廷选被打得狼狽逃窜，其他各路军马亦闻风败退，太平军奋勇追击，直达东门濠边，几乎冲进城内。是时饶廷选颓倚女墙，涕泣呼天，幸“金衢严道”缪梓援兵恰于此时赶到，清军才又勉强堵上城门。此战过后。缪梓和饶

廷选等惊惶万状，龟缩在城内待援，不敢出城还击。6月11日夜四更，太平军再度进攻东门外敌营，破敌安勇营，其他敌营所部皆不敢出战。16日夜三更，大南门城墙坍倒出现缺口，太平军立即发动抢攻，势将冲入，守军急忙抢塞缺口，连续向太平军抛掷火罐药包，勉强应付过关。

正当两万清军在衢州被石达开部死死咬住，附近州县兵力异常空虚之时，另一路太平军由石镇吉陈享容等率领，绕过衢州迅速北进，自龙游越清萌岭袭取遂昌，克松阳，顺流而下，攻破处州府城。5月17日，清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加总督衔周天受，总兵明安泰部副将李嘉万，陶森茂合兵于银场，欲图阻挡石镇吉部。5月19日，石镇吉大败清军主力于银场，斩知府唐宝昌，都司马元镇，秦坤等，周天受身负重伤，两指被砍断，率残兵退回金华。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宜平等地，军锋所指，势如破竹。

一直以来，因为曾国藩在一年以后的一封信中曾说石达开“钝于浙”，人们便认定石达开进军浙江遭挫。其实曾国藩写信之时正因为清政府的小气而大闹别扭，不能单凭他在的一封信中的几个字就妄下断语。从前述来看，石达开入浙实际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虽然衢州攻坚一时未能得手，但二个多月攻克十二个府县，势力覆盖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并对严州和杭州形成重大威胁，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钝”。(1861年时侍王李世贤和忠王李秀成先后入浙，都曾攻衢州不克，但从来无人因此得出李世贤或李秀成“钝于浙”的结论)同一封信里，曾国藩又指石达开“不敢逼严杭”，其实这同样是事过境迁后的无的放矢，石镇吉部占据的永康、武义距金华府甚近，而当时因为清军主力多数正在衢州城下鏖战，金华驻军不过数千，且银场一战已令其丧胆，如果石镇吉部休整之后自永康攻金华，以其当时锐不可当之气势，极有可能得手。另一方面，石达开又分兵于6月23日攻克寿昌，该地距离严州仅60里，严州守军只有数百，太平军要攻克严州亦当不在话下。如此一来，太平军便将深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带，无论从严州还是寿昌，都可顺流直下杭州。正如当时金华一位地主文人在笔记中所记载的：“粤匪石达开由处州攻陷永康、武义，径逼金华。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宦舍一空……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贼尚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再攻则杭州震动。”可见当时太平军大有直下杭州的气势，显然不能称之为“钝”。而在这种形势之下，也不可能有石达开“不敢”逼严杭的问题存在。(至于为什么没有“逼”，后文再谈)

曾国藩在另一份奏片中又称入浙太平军“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这一考语也一向深受许多论者青睐，被毫不犹豫地引用来垢病于石达开远征军。(相比之下，这些论者在处理太平天国中后期大量对于其他太平军部队的类似指责时就谨慎得多了)。入浙以后，乃至此后转战福建江西时期石达开部队的“气”“势”如何，我们在前后文中都以一系列事实来证明，在这里只须讨论一下“无纪”的指责是否属实。

笔者以为，从地方史料，太平军本身史料，当地口碑三方面考查，这一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地方史料方面，据《寿昌县志》记载，石达开“部将攻克寿昌时，全城一千余户，连一根屋椽也没有被毁过”，“街上的贸易和平时一样”，真可谓秋毫无犯，鸡犬不惊。清人许瑶光所著《谈浙》一书中记载清总兵明安泰部仁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入缙云，一路掳掠。至铅锡场，乡人大呼贼至，仁勇狂奔，逮拾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军，其实不遇一贼也”，同一书中却绝无石达开部在缙云处州等地“不仁”“掳掠”的记载。正因为入浙太平军在百姓眼中是仁义之师，才会有大军入城，贸易如常，以及百姓自发骗杀“剿贼”官军的情况。



太平军本身史料方面，前文提到的永康县新发现的石达开部将“显天燕陈”告示其中一张的内容便是宣布太平军对民众的要求和太平军本身军纪(石达开在过去经营安徽江西根据地时都曾有号召百姓举报部队违纪之举)，告示中所列军纪的精神与《太平条规》完全一致，共计有“擅杀人命者罪必斩”“战阵不齐罪必斩”“私取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妄坐箠轿者必斩”“碎民用物者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猪罢皮者必斩”“凡系行程过境擅敢沿途一路掳掠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下乡搜索者必斩”等“二十八斩”和“六游营”。

“显天燕陈告示”中还有一张是“为晓示各乡各都共诛土豪以安良善事”，申明太平军打击土豪恶霸的政策。告示众一方面对其进行声讨，指出“人不顾礼义，肆意妄行，又一群小人受命胖？终日，不织而得衣，不耕而得食，无治抡奇以致之。乡有若人，则一乡受其害；都有若人，则一都受其害，使千万良者受制于若辈数人。若辈自以为得志乎，不知罪恶贯盈，人人得而诛之”，另一方面又申明，太平军“统率雄师，锄暴安良，断不得任若辈横行于乡都之间，不过待其改悔，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也”，这就表示，入浙太平军对于土豪劣绅采取的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消灭的政策，而是准其“改悔”，“倘若辈不改其行，是不畏死，在所当诛”，则准民众禀告乡官政府，合力擒杀，如乡官政府无力相抗，可以直接向军政司“禀请发兵”。

从石达开部将在永康发布的三道告示看来，入浙太平军所到之处一面申明对民众的要求，避免“不教而诛”，一面把自己的军律公诸于众，使民众可以对照监督，一面发动民众“除暴安良”，一面组织当地人举拔官吏，建立乡官政权，实在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的队伍所为。

民间口碑方面，一直以来有关太平天国的所谓“口碑”“传说”“民谣”失实之处甚多，其中很多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清政府恶意散布流传的诬蔑之词，还有不少是建国以后搜集太平天国史事时很多搜集者和被采访者为了迎合潮流而编出来歌颂太平军的，因此，两方面“口碑”在使用时都必须特别慎重。对于石达开入浙之战，由于时间较短，又长期不受重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口碑。但笔者却有幸在偶然间得见一颗“沧海遗珠”----这就是一首流传于浙江畲族民间的有关1858年太平军在浙江丽水，云和，龙泉地区活动情况的叙事山歌。这首山歌不是调查太平天国口碑时被“搜集”到的，而是出自有关部门征集少数民族文物时发现的一本整理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稿本，因此不可能为后人杜撰。它虽然用汉字记音，却是用畲族的语言传唱的(畲族没有文字，只能靠歌谣传唱历史)，故其可信度近一步增加。

这首歌中唱到：

“长毛皇帝早有计，何时起身无人知，无话通知长毛子，一时讲起就爱去。”

“杀掉兵子做两边，景宁兵子都逃完，杀掉带兵做两段，登云元帅亦不见。”

“景宁登云讲好反，到我云和也无干，去杀长毛未太着，自己身死做两段。”(注：未太着，即未见着)

“景宁未见讲好汉，到我云和亦无干，长毛便是天生子，千里未来就赫散。”

“长毛去了官兵来，未见官兵打一回，兵子亦赫长毛子，不敢近前相斗打。”

“官兵大人好名声，长毛城不敢行。等住长毛出城外，一时来到好高兴。”

“官兵又讲好功夫：我今未来长毛去，长毛住在月多久，不知官兵那路去？”

狠狠讽刺了清军见到太平军时狼狈的情况，描绘出入浙太平军的英勇善战和清军的闻风丧胆。歌中又唱：

“长毛皇帝心是正，斗夜起身无人声；行去十里天来晓，行行歇歇笑嘻嘻。”

“造反年景人罪过，善恶之人都走去，善人远去不久转，恶人回转刀下过。”

“造反年景人罪过，善恶之人都走去，长毛杀人在西门，西门路上杀恶军。”

“恶军也是无注定，长毛不来杀错人。杀人人讲景宁听，景宁官府不敢声。”（恶军，此处指官兵（参见上文），无注定，即没王法）

“长毛久住心亦宽，云和人子上山太，等了长毛云城外，县里何爷就担去。”

“长毛起身也捉人，捉去人子心中宽，心愿随阵就走去，心乃不愿便走散。人子走回亦就是，亦无长毛来寻你。人子归转是宽心，无文官兵又来寻。寻到人字又捉去，日夜挑担无安心。担如不去就打骂，不管老弱都怨心，担到几日人怨死，不知几时转回头。”

“长毛去了官兵来，来到云和乱捉人，男人捉去好挑担，女人捉去做夫妻。放你来杀长毛子，不杀长毛捉粗人，捉我粗人我便去，日夜挑担无工金。”（粗人，种田人；工金：工钱）

显示了入浙太平军太平军不强掳人，不滥杀，行军纪律整肃，驻扎时态度亲和，与官兵军纪形成鲜明对比。

从以上三方面的记载看，曾国藩对入浙太平军“势散无纪”的指责是不实之词。这倒未必是曾国藩存心诬蔑，要知道曾本人并未直接追击石达开入浙，因此有可能是他轻信了周天受明安泰等人的一面之词。举例而言，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关于石镇吉放弃处州府城时“焚民居三百余家”的说法，一直以来就深受史家怀疑（前文提到的地主文人所著《谈浙》一书的记载便是质疑依据之一），香港史学家简又文先生在考察远征军军纪时就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军纪一向败坏，入浙后甚至与团练发生矛盾的周天受将所部官军恶行栽赃在太平军头上。（“长毛歌”也唱到了周部的军纪，“姓周兵头是大兵，带到几百几千人，几千人头做兵子，来到云和乱捉人。一年四季付你食，官食粮了无寸情。”）

### 三 从浙江撤军的原因

就在清军在浙江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清廷为之震惊，入浙太平军已经进入浙江最富庶的金华府属地区，兵锋直欲指向严杭之时，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入浙计划。7月中旬，太平军开始从衢州城下撤退，向处州、缙云方向转移，同一时期，占领金华府武义永康县的石镇吉陈亨容部太平军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撤退。清廷看出石达开部有入闽意图，企图阻止，但石达开军行迅速，很快占领了处州南部的龙泉县，入闽已成势在必行。8月上旬，浙江太平军在龙泉集结完毕，为摆脱清军的追击，石达开在层峦叠嶂的龙泉布置了一场狙击战，以小股部队将追兵牵制了3天，确保了大队顺利从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断后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也随后抵达与主力会合。至8月下旬，石达开部已全部转入福建地区。

对于石达开部从浙江撤退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仅仅用衢州攻坚不利是不足以解释的。石达开“挟数万之众，裹数月之粮，意在必得此城”（《福兴奏》），虽然一时没有得手，但并未受到重挫，也没有遇到粮草短缺的困难（而且再过不久就是秋天，完全可以就地因地就草），加之深入腹地的部队进兵顺利，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战略的。

真正导致石达开放弃攻浙计划的，是浙江战场以外的变化。

首先是江西抚州、建昌的失守。抚州是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所以石达开入浙之前特留手下得力将领余子安率部份军队驻守，与建昌同为入浙太平军的后方。但是，由于抚州天地会首领叛变，在城中与守军相杀，引城外湘军梯城而入，余子安不得不于6月1日率众突围，抚州失守；四天以后，势单立孤的建昌守军也被迫弃城往与余子安部会合。这样，入浙作战的太平军就失去了后方。这一个十分不利的变化。

不过，抚州和建昌失守发生在6月初，而石达开部是7月中下旬才陆续撤军的，可见江西后方发生的变化对浙江战局并未产生根本性影响。这是因为按照石达开的计划，在他率军进取浙江的同时由杨辅清分兵入闽，开拓毗邻浙江的福建根据地，故浙闽太平军可声气相通，相互应援。因而即使失去了江西后方基地，也仍然留有回旋空间。然而，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就在浙江太平军开始向福建转移的时候，杨辅清却将福建各处部队向浦城集中，主动放弃了清军久攻不下的松溪、政和、建阳等城，其后更全军撤向江西，从此回到天京政权节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石达开还在浙江作战，就将成为四面受敌的孤军，而包括各路援浙清军又正在源源不断开来。石达开预见到了将有四面受敌的危机，才被迫放弃了图浙计划，向福建撤军。

曾国藩在后来的一道奏折中曾谈到石杨分道扬镳的原委，据他说，这年6月底到7月初，杨辅清打出“东殿”旗号，引起石达开的不满，遣“九公子”率兵万余由浙闽边界的塔岭进攻杨辅清在福建浦城驻地，被杨辅清袭杀过半。而洪秀全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不和，升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令他放弃开辟福建的计划，回师天京。

曾国藩这道奏折属事后之言，失实之处甚多。首先，《平定粤匪纪略》中曾国藩说杨辅清假“东殿”旗号时在2月，果真如此，何以当时没有爆发矛盾，还能合力共图浙闽？洪秀全公开为杨秀清平反昭雪是在1859年底，1858年杨秀清尚未公开恢复名誉，杨辅清打“东殿”旗号又有何益？其次，1858年6月底至7月初，石达开在衢州城下，石镇吉在云和、宜平等地区，所部均未到过福建，如何能与福建浦城的杨辅清部相杀？第三，如果石达开要派兵攻杨，兵力至少需如曾国藩所说在万人以上，而衢州与浙江腹地战势正酣，石达开不可能一下抽出上万部队入闽。而且，倘若真有此事，统兵之人必是石达开部下足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如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等人，而无论此前此后，都从未听说石达开部下有称“九公子”的将领。第四，石达开从来不曾用过强制手段逼迫部下跟随，后来在广西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几万大军先后脱离，从未发生兵刃相向的冲突，说他在浙江时只因为杨辅清打出“东殿旗号”就派兵讨伐，与其一贯作风相去太远。第五，石达开的实力比杨辅清强得多，真打起来杨军不是对手，因此如果石达开确有讨伐杨辅清之意，杨军必会迅速撤离福建，避免和石达开大部队的接触。但事实上，杨辅清部却是在石达开大队入闽之后才全部撤离浦城的，也并没遭到任何来自石达开部的阻挡或攻击。纵观当时福建战报，均未提及太平军曾发生火并。从事态发展看，杨辅清部全面撤出福建各据点是在石达开部向浙闽边界集结之后，而直到石达开前军抵达浦城前夕，杨辅清部才完全撤离浦城，似乎石达开早已知道杨辅清将要反旆而及时中止了攻浙，而杨辅清又有意等待石达开大队入闽后才撤走全部驻军，双方不像箭拔弩张的对立，却更似有条不紊的交接。

其实，只要看了骆秉章奏议中的这一段话，便知石达开与杨辅清的关系远未紧张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石逆在南安时(1858年底-1859年初)，景德贼(既杨辅清)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直到在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几个月后，二人还通过书信商议配合作战事宜，可见说他们此前已经大动干戈纯系无稽之谈。相反地，从石达开和杨辅清此后在军事上仍有相互磋商看来，前文第五点的猜测并非没有可能，即杨辅清先已将撤军意图通知了石达开，使其得以作出必要的应变部署，而后待石达开大队闽之后才将浦城驻军全部撤走，双方虽然分道扬镳，行动上却依然有所配合。

当然，不能排除在石达开先头部队入闽过程中曾与未及撤退的杨辅清部队发生小范围摩擦的可能，太平军高级官员之子称为“公子”，个别将领因对杨辅清的做法不满而与杨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不无可能，但这不能代表石达开和杨辅清本人的意图，更远没有严重到正面火并的地步，否则清军奏报中是不会一无提及的。曾国藩的说法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显然是大大夸张了。

天京事变以来，杨辅清一直和石达开关系甚好，石达开远征以后，两人又一直协同作战，既然不存在石达开对杨辅清不满而派兵讨伐的事，那杨辅清又为何突然反旆呢？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奏折倒是触及了要害----放眼太平天国，能对杨辅清起如此鼓动作用的，除洪秀全外不作第二人想。这从杨辅清离开石达开后不久即被封为中军主将一事不难窥见端倪。有人说，杨辅清被封中军主将是洪秀全对他返回江西后作战的嘉奖，此说难以令人信服。杨辅清论战功，论能力，论先前官爵，都不能和陈玉成李秀成比，若论与洪秀全的亲厚关系，作为尚未被公开恢复名誉的东王之弟，更加不能和洪秀全的心腹，原中军主将蒙得恩相较。论情论理，他都没有取代蒙得恩而跃居陈玉成李秀成之上为中军主将的道理。但如果这是洪杨之间早有的协议，是洪秀全用来拉拢(或云：争取)杨辅清离开石达开的政治手段，那就不难理解了。东王已死，其亲信旧部和族人也大都非死即走，杨辅清兄弟几人对洪秀全而言并不构成威胁，至少在洪秀全眼里，其威胁远远不如让石达开在天京根据地旁边的浙闽地区站稳脚跟那么大。

洪秀全用高官显位收买杨辅清，暗中拆石达开的台，并非孤立事件。许多事实表明，洪秀全的“小动作”从石达开离京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比如，一面“争取”石达开回天京，一面将谏言“仍重用翼王”的李秀成革职，使朝臣此后不敢再为石达开讲话；又如，除杨辅清外，不久后脱离石达开的石镇吉据说也是受了天王的“争取”；再如，不敢公开贬斥石达开，却暗中对天京文书中所列朝臣衔号做手脚，将其宗教徽号从与杨秀清平等的“圣神电”降为“电师”，又取消了军民共上的“义王”封号，改回“翼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建五军主将制之举。过去人们常把此举说成洪秀全提拔后起之秀，重组领导班子的英明政策，其实五军主将中的陈玉成，李秀成，韦俊，杨辅清四人早在石达开主政时期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领了，且洪秀全此前早已分封正副“掌率”，使其统兵有名，将“掌率”改成“主将”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真要说此举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那就是借此巧妙地把石达开这个“通军主将”给架空了----我们知道，天京事变以后，洪秀全为挽回危局，封石达开为全军主将，因避洪秀全讳改“全”为“通”；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碍于他在军民中的崇高威望，始终不敢公开贬斥，因此他仍然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太平天国部队，即使陈玉成李

秀成等人成为正副“掌率”，也并不能就此抹煞“通军主将”的地位。洪秀全一方面深感不安，一方面又不便公然撤销这一封号，于是想出了变“掌率”为“主将”的伎俩。如此一来，既已有了新的“中军主将”，旧的“通军主将”自然也就失去意义，不可能再以此名义干涉天京方面军队活动了。等到了1859年洪仁(王干)陈玉成封王，事过境迁之时，再正式把“通军主将”从石达开的头衔中去掉，也就不会再引起多少注意了。(耐人寻味的是，取代“通军主将”地位，成为新“五军主将”之首的“中军主将”一职先是授给了洪秀全的宠臣蒙得恩，后是转授给脱离石达开返回的杨辅清，却没有授于功勋卓著敌我闻名的宿将韦俊或陈玉成，亦显示出“重建五军主将制”作为政治手段的性质远超过军事需要)

石达开原本的计划是“分金陵之势”，也就是将天京解围分为内外两线，减轻内线单独作战的压力。如果石达开进攻浙江期间，洪秀全命令各部在内线予以响应，将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浙江与天京战场都可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局面。遗憾的是，洪秀全计不及此，不但在浙江太平军为配合天京解围而战时无动于衷，没有积极在天京战场予以配合，迫使其单独承受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还处心积虑对其进行内部的分化瓦解，终至太平军入浙后一度出现的大好形势成为昙花一现，辉煌战果最终付诸东流。

总之，石达开的“东进浙闽”战略由大有可为演变为前功尽弃，主要原因不在战场之上，而是内部矛盾----确切地说就是洪秀全的拆台行为拖了后腿，由此也可再度看到其“争取”石达开的虚伪----石达开已经远离了天京，把龙盘虎踞的天京城和经营多年的“地盘”都让出来，洪秀全还是不能放心，唯恐其在浙闽站稳脚跟后难以摆脱，其猜忌之深，真正到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地步。似乎对他而言，毗邻天京根据地的浙闽地区由清廷控制还仅仅是肘腋之患，由石达开控制反而会成心腹之患。洪秀全这种非把石达开逼到远走高飞不能心安的心理，通过杨辅清一事为石达开所洞悉，恐怕也是他断然放弃在经略浙江的计划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 入浙战役的意义

评价一次战役的意义最重要的着眼点自然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战略目的？本篇第一部份谈到，石达开东进浙江的目的有二，一是打乱清军部署，减轻天京战场压力，二是开拓浙闽根据地。在后一点上，太平军在浙闽二省一度曾经颇有作为，但最终随着入浙战役的半途而废尽弃前功。那么，在前一点上，效果又是如何呢？----应该说是不错的。

早在西安将军福兴探知石达开“直下苏杭”意图之初，就曾咨请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军赴常州、玉山布防，何桂清奏说清军正在加紧合围天京，并称金陵城大地广，欲图合围，尚虑兵单，无力援应。清廷的指示是先顾石达开，乃令何桂清依福兴所请派军前赴常山、玉山。及石达开兵逼广信，胡林翼急奏福兴不足当石达开一击，请调李元度赴浙，后李元度所部湘军平江勇至玉山，常山一带，与石达开留在常山开化地区的拒援部队周旋。

尽管清廷调兵遣将，福兴，明安泰，周天培，周天受，江长贵，田应科，饶廷选，李定太，田兴恕等人先后赴援，仍然无法改变浙江战场损兵失地的被动局面，石达开部入浙后一个多月内连克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多处重要城镇，全浙震动，严重扰乱了天京城下江南江北大本营的战略后方，何桂清在5月31日的奏章中指出：

“若再相持一两月，即使杭州幸保无虞，而有兵无饷，江、浙、皖南同归束手，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也。”

截至6月初，仅江南大营就抽调兵勇5000人赴援浙江(1860年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攻破江南大营时，大营实际调出兵力也仅为8000人)，大营原有总兵五人，除一人专办翼长营及临时带兵策应外，剩余四人中二人赴浙，顿觉将领匮乏；加上从江西、安徽等省赴援的清军，石达开部在入浙不到两个月内就已牵制敌军多达数万。又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所有大营军饷入夏以后，因来源阻塞，筹划倍难。”很显然地，新开辟的浙江战场打乱了清廷的全局部署，削弱了天京战场上清军的力量，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及周围战场的战斗，为太平军在天京战场上布置反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应付不利局面，清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作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以“丁父忧”回籍守制后，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清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清廷上下的普遍判断。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清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清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咸丰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清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的决策时间是1858年7月)。

以曾国藩的“复出援浙”为标志，清廷已经彻底推翻了当初认为攻破天京指日可期的判断。而从清廷在短时间内向浙江增兵的力度和起复曾国藩的决定中，不难看出石达开入浙作战对清廷形成的巨大威胁及对其他战场，尤其是天京战场的成功支援。

不仅如此，石达开进军浙江是太平军第一次用进军清廷的经济命脉来缓解天京战场压力，以外线扯动配合内线解围的尝试。尽管内部矛盾的激化使石达开未能将这一尝试继续下去，但次此用兵却启发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浙江在战略上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地位，看到了清军惶急之中暴露的致命弱点。一年半后，李秀成，李世贤等正是沿袭并发展了石达开的故智，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取得了二破大营的得辉煌胜利(“围魏救赵”是常见

的战术，但攻击点的恰当选择往往是成败关键)，当时，李秀成与李世贤采取了以皖南兵团的机动配合入浙兵团迅速深入腹地的战略，收到了奇效，这一战略，同时汲取了太平军在一解京围时经略皖南和前次入浙“分金陵之势”的经验并予以发展，可以看出太平军对于苏浙战场对天京战场之影响的认识和把握是在逐步深化中，从1856到1858再到1860，前中后战略思想的发展实际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外，石达开部的入浙也为后来太平军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摸索出了一条进军路线，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后来李世贤进军浙江之初，基本上就是沿着石达开部队当年走过的道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了。

## 五 结语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石达开东进浙江不是搞分裂，更不是盲目流窜，而是为了配合天京解围，并且有意在与天京根据地毗邻之处建立长期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互为应援。假如石达开和杨辅清能够同心协力将这一计划进行到底，假如洪秀全对石达开不是暗中拆台，而是出于大局主动有所配合，石达开是不愿远离太平天国辖区的。他最终决定远走高飞，实在是洪秀全苦苦相逼之下情非得已的选择。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清廷和洪秀全的高下之分：清廷虽然也对曾国藩猜忌很深，但为了江山社稷的大局考虑，必要之时不但肯于授予重权，甚至还愿为之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援保障；而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却竟到了“视股肱如寇仇”的地步，其人目光短浅至此，手段卑劣至此，竟还有人迄今指责石达开不愿受制于彼是“负气”“闹分裂”“野心作祟”“个人英雄主义”，能不令人嗟叹！

半年以后，石达开终于如洪秀全所愿，越走越远了；天王安心之余，尝到了以高官显位收买人心、分人权柄的甜头，不免沾沾自喜，以为得计，此后每每用作挽救危机和牵制手下大將的“法宝”，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创下了封王二千七的吉尼斯纪录，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三)南安决策

### (一)转战福建

从浙江撤离后，石达开有两种进军方向的选择，或重回江西，或移师福建。清方认为石达开在江西拥有很高的声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曾国藩曾谓“西路久陷于贼，谣言宏大，裹挟众多)，判断他将反攻江西，但石达开最终却做了后一种选择。其实这不难理解：江西方面，湘军主力重兵集结，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刘长佑诸军严阵以待，其时湘军主帅复出，又于不久前刚刚攻陷了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士气高涨，正准备入浙追击太平军，若此时太平军折返江西，湘军便可以逸待劳，正中下怀；反观太平军，入浙作战三四个月，部队已经有些疲惫，被迫放弃大好局面和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根据地，对士气的打击更加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形下与敌人正面决战乃是下策，在浙江所向披靡的石镇吉一度企图独立向江西发展，结果刚到江西新城就被湘军所败，不得已又折回福建就是很好的证明。敌我状况的对比应是石达开选择福建为进军方向的主要原因，而此外石达开这一决定还有可能受了两个次要因素影响：一是江西建昌，宁都地区正在流行严重的瘟疫，二是杨辅清正由福建撤入江西，石达开不欲与之正面相遇，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后，军事上还算顺利，连续攻克了政和，崇安，建阳，泰宁，建宁，宁化，汀州等府县，但是这些地方比较贫瘠，连年灾荒，粮草供应困难，士兵又水土不服，多有

病倒者，如曾国藩所言“贼之死于无食 死于地气者， 动以千计，沿途狼藉”，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大，不宜长期停留，因而石达开在十月十七日攻克汀州后不久即分兵三路进入赣南的地区。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总共两个月时间，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究其原因，一是进入福建本身只是杨辅清部脱离后的应变之举，二是粮草缺乏，水土不服，战略意图不明确都影响了部队士气，难以谋求长期在闽立足，三是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即实际上以“中军主将”取代了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与其他友军的关系又再次变得极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年多仍保持“通军主将”名义与各部联络及配合作战的石达开多少有些进退失据。较之于曾国藩夸张地说石达开“钝于浙，钝于闽”来，骆秉章说石达开所部“由浙窜闽以后”才“气势顿衰”，较为符合实情，不过这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受挫，而是非战斗减员和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造成士气不振。（清方奏报中某些所谓“克复”太平军占领地的说法严过其词，夸功成份很大，石达开在福建的各据点旋占旋失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军根本无心固守，往往稍触即退，故而入闽期间罕有激烈战斗，各据点多是占也轻松失也随意）。石达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率军进入清军力量较弱的赣南地区，显然是为了让部队得到休整，并借休整之机拟定下一步今后的战略。

## (二) 曾国藩的一些说词

曾国藩评价石达开远征的言论中有几段话常被论者引用，作为石达开远征以后江河日下的依据，一是“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之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二是“在衢州数月，而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三是“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四是“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石达开部)亦无害”，五是“此次贼由南赣窜湖南，足下于去年十月曾经虑及，仆不甚以为虑”。

现在，我们要问，曾国藩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首先必须承认，石达开转战福建的两个多月确实其军事生涯中的一个低潮期太平军在福建的活动战略目标不明，进退失据，士气低落，有流寇之象，曾国藩谓其“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贼无悍志，无远略”，仅就这一时期而言确属实情。后来入湘“钝于宝庆”也是事实。

但是，除此之外，就言过其实，甚至是故意抹煞事实了。“钝于浙”“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的说法在前一章已有反驳，“钝于闽”“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的原因上文已有简单解释，“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亦无害”“仆不甚以为虑”两说曾国藩后来自己曾经推翻，本章后节将会涉及，“钝于永，祁”及“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两说则将分别在下两章(宝庆会战，回师广西)中予以反驳，至于“或竟不能入川”之说，已经被后来的事实证明错误，石达开不仅有能力攻入四川，而且险些袭取了成都，这都是后话了。

曾国藩发出以上不合事实的评论，大抵有两种原因，一是判断失误，后来自己承认了错误，二是旨在拖延和推卸入川截击石达开的任务。前者下文在论，后者发生在石达开进军湖南，有意取道入川之时，清廷命曾国藩移师夔门以拒之，于是曾国藩便发表了许多力诋石达开远征军的言论，如“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挟之人愿从者渐少……或竟不能入川”等等，就是不愿意赴任，理由是没必要去。至于曾国藩为什么不愿意去，原因也不外有二，一来是不满于清廷的吝啬----早在湘军首次攻克武昌后，清廷便曾欲授



曾国藩湖北巡抚职，然终因防范猜忌之心而未果，前次为阻石达开部于浙闽而令曾国藩复出，仍是功而不赏，此次欲调曾国藩入川，虽经胡林翼等奏请，仍不肯授曾国藩四川总督职，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入川得不到总督的位置，又要交出对长江中下游湘军的指挥权，自然心有不甘，不愿赴任，想留在中下游等待更好的进身时机。二来，追击石达开部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就算骆秉章最后能依靠“河神助顺”而“生擒石逆”，又怎比得上曾氏兄弟克复金陵的不世奇功？曾国藩要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剿灭金陵上，特别是石达开离开后，洪秀全猜忌异姓，任人唯亲，竟致三军无帅，其亡国之因已种，曾国藩又怎么甘心放过这建立奇功的大好机会而到大西南去和石达开部做胜负难料的周旋呢？

如果我们不看纸面上的只言片语，而切实去考察曾国藩及湘军的动向，就很容易发现曾国藩的心口不一。

前文提到，清廷为阻止石达开部深入浙江，除了调动各路兵马赴援外，急令回籍奔丧的曾国藩赴浙。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命骆秉章传旨，此时曾国藩的旧部有数万人在江西，随时可以入浙，他们接到曾国藩的命令后均至江西铅山候命。而曾国藩十三日正式接旨，十七日离家，却没有直接去铅山，而是二十二日至长沙与骆秉章和左宗棠“商谈军务”，八月三日武昌和官文胡林翼“商谈军务”，八月二十九日到南昌。而后才由南昌前往铅山。而此时距石达开部队陆续撤离浙江已有一个半月，石达开部入闽也已经有半个月了。结果曾国藩在前往铅山与部队会合的途中又接到命令而改援福建，但石达开部在福建转战两个多月，并没有遭遇到湘军的阻击，等曾国藩将部队集结于分水岭准备进军福建崇安的时候，石达开已经准备撤离福建了。这样，从曾国藩奉旨援浙到石达开移师江西为止，前后三个月时间，被“急掉”赴援“浙闽”的曾国藩却始终未与转战浙闽的石达开部主力接上仗，由此可见，曾国藩虽对复出大喜过望，却丝毫没有操之过急，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追击石达开的任务实在是慎之又慎的。

事实上，石达开部入闽期间既已采取流动战术，行踪便一直十分飘忽，曾国藩往往无法确切把握其踪迹，“咸丰八年七月底石达开在建阳邵武一带时，曾国藩倒是知其踪迹的：“迭据探报，伪以为石达开尚屯踞崇安县境之星村，黎源一带地方及建邵各属。”曾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奏稿中又称：“惟石逆是否在闽境未得确报。”其实石部在攻延平府之洋口，在福建境内。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石达开踪迹不明片“中称：“九月间又闻该逆回甯新城”，其实石部在汀州，宁化。又称：“入冬以来……又据擒获贼探及贼中逃人所供，贼目只有石国宗，敦天燕，何先锋，付检点，罗都督，卢检点等各色，无有知石逆所在者。”“前此顺昌，洋口咸称石逆在内，今日瑞金信丰亦称石逆在内，皆系谣传悄恍之词。”而恰恰相反，八月石达开确在顺昌洋口，十月底在瑞金信丰也确有其事“(邓亦武《湘军的情报工作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咸丰八年~九年湘军围剿石达开部时期》)。曾国藩连这一时期石达开部在福建的行踪都无法确切掌握，试问他如何胜任追击任务，他对石达开部在福建的表现又有多大发言权？

奉命入浙闽的曾国藩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都没和石达开接上火，好容易他派去对付石达开的部队主力终于在江西和石达开正面碰上了，结果是湘军吃了大败仗。(下章再做详细介绍)是石达开的情况真像曾国藩说的那么不堪，又如何解释宝庆会战以前湘军主力与石达开部唯一一次正面交战中的惨败？他这样贬低石达开部，将置自己的湘军于何地？

曾国藩这番论调的目的很快就显现了，宝庆会战后，湖广总督官文给朝廷上了折子要求让他暂缓入川，留驻湖口。而朝廷的回复是“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无虞，即可暂驻湖口，俟调回湖南各军，为分兵进剿皖省之计。设湖南败匪，尚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从缓着量办理”。曾国藩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清廷在全局上的优先考虑是显而易见的，同意曾国藩暂缓入川的前提是“川境可保无虞”。其后，曾国藩又再度要求调出在湖南和广西与石达开作战的几支清军，分四路进攻江南太平军，由以上种种不难窥见曾国藩想要把精力集中于江南战局，不

愿意去西南和石达开周旋而将“不世奇功”让给别人，甚至不愿意清廷从江南战场抽走其他兵力的想法，他一再贬低远征战场的重要性，无非是出于这个目的，不能只依据他以其特定的立场所发表的只言片语来判定石达开远征的情况和远征战场的价值。

### (三)清廷在石达开入闽期间的部署

对于曾国藩，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然而仅仅关注曾国藩是不够的，清廷的整体部署比曾国藩的个人言论更具实际意义。此外，天京方面，新授重任的前军主将陈玉成和后军主将李秀成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充分利用石达开转战浙闽造就的有利形势发动反攻，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曾国藩“奉旨移师福建”一个星期后，太平军取得了浦口大捷，第二次歼灭江北大营，这时，脱离石达开而返回的杨辅清部也转至皖南，与天京战场声势呼应，太平军乘胜克复天京附近重要据点溧水，江南大营告急，天京战场在石达开脱离以后一度出现的危机得到初步化解，这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所谓的“二解京围”。

石达开的被迫远征，使太平天国的战略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如果说石达开的活动对于天京方面有利有弊，那么关键要看其将领能否充分发挥其有利的一面。而这一次解围战的胜利，便标志着天京方面已经渡过了石达开离开后因客观兵力削弱造成的暂时性的困难期，开始不失时机地利用石达开远征造成的有利环境去弥补其不利影响，化被动为主动。

在这方面，赵三军先生曾撰《石达开远征意在挽救天京危局辨》一文中作过非常详实的考证和认真的分析，本文不拟重复前人的工作，特将赵先生的考证原文摘录于下：

“石达开在浙江的用兵，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浙江的势力。清帝以周天受调度乖桀，屡失事机，将其革去提管衔，令李定太为江南大营帮办，总统浙江军务。接着命曾国藩以援浙之师改援摄福建，周天受、李定太均归其调度。这样，石达开在浙江打乱清军进攻天京的部署后，挥师入闽，又紧紧牵着曾国藩及浙闽敌军，使其更加远离天京战场，使清军的战线拉的更长，兵力更分散。当时，曾国荃正会同水陆各军围攻吉安，周天受督周天培正由浙进援福建，曾国藩抵河口镇疏称，即日亲督兵勇，宣扬崇安。即令张运兰赴河口镇会师。署督庆瑞驻扎延平。耆龄遣刘长佑移驻新城。邓在富等进驻泸溪，并疏称：“江西自广信府属广丰，至赣州府属长宁，沿边十二县，计程千余里，均与闽界毗连，必须筹拨锐师，与闽兵合力攻击，以遏回窜，兼靖邻氛。”石达开移师福建使得浙闽、江南各处兵力更趋紧张，为天京及其周围战场创造了一个歼敌良机。

陈玉成、李世贤抓住战机攻克庐州，清帝得报，急令李续宾、都兴阿分军赴援。但是江南无兵可调，李续宾一军除留防各地外，仅剩 8 千余人，都兴阿马队能战之士不足千人，无力分兵。官文疏复：“李续宾进攻太湖。都兴阿进攻宿松，遽改援庐，缓不济急。惟有趣李续宾迅克太湖，乘势扫荡桐、舒，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庶不致顾此失彼。”把救庐州的希望寄托在李续宾速克太湖、潜山、桐城等处后的幻想上。陈玉成、李秀成乘敌兵力紧张之机联合捻军汇合江浦，连营数十里。德兴阿告急于江南大营，和春虽遣冯于材应援，但无济于事，陈、李联军大破江北大营于浦口，尽覆其军，并乘机扩大战果。

当李秀成部攻陷扬州后，和春、何桂清咨浙江巡抚胡兴仁，要求援浙对付石达开的周天培军回援江北。胡兴仁以周天培远在福建与石达开作战为由不予答应，让宁国郑魁士募勇赴援。和春等又连连奏咨，江北事急，速调援浙闽各军回援。当时福建战事正紧。石镇吉、石镇常率部占领连城县，王懿德令饶廷选往攻，饶廷选托病不出。被奏革职。王懿德正为福建战事发愁

时，连得江北调兵命令，于是奏咨曾国藩分军策应江北。曾国藩正与进入江西泸溪、新城的石达开作战。当时，建昌、宁化大疫，曾国藩的军士染疾，被围在江西，一派狼狈状。可是清帝命曾国藩遣军赴洋口，与石达开作战，令周天培回援扬州。王懿德先是奏留周天培剿延平、洋口之石达开，缓赴江北，未经允许。于是王懿德再次上奏说：“汀州、连城、宁化，逆势猖獗，周天培一军，正由顺昌、将乐乘胜进攻，可助迅速聚歼。若稍涉松劲，攻败垂成，以后补救为难。且周天培即令折还，江宁进途纡远，诚恐缓不济急。”要求汲云南楚雄协副将张腾蛟赴援，仍要求曾国藩酌拨劲旅，一赴赴援。清帝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俟曾国藩入闽后，即饬周天培驰回江南，交和春调度。结果，曾国藩、周天培谁也没调回江北，都留在赣闽对付石达开。

就在敌人各处兵力紧张，为调兵援江北而互相扯皮时，太平军将六合之敌团团围困。敌乞援于江、皖各营，德兴阿等节节退避。不遑回顾。李续宾奋力苦战攻陷舒城后。为攻庐州扑向三河镇。由于长期苦战，损兵折将，已不满5千人，渐成强弩之末。正当李续宾孤军深入时，前军主将陈玉成统大军进至三河镇南30里的金牛镇，包抄了李续宾军的后路，并急檄庐州守将吴如孝派兵截击舒、桐援敌。于是李续宾四面受围。后军主将李秀成挥师又至，陈、李两军以及张洛行之捻军奋力猛击，大败李续宾部于三河镇。李续宾自缢而死，阵斩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元戎参佐文武400余员及入犯湘军全军覆没。陈、李又乘胜收复舒、桐、潜、太等地，使湘军“元气丧尽，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长城顿失”，“全军皆寒”，“不可复战”。逼迫敌人退守鄂东，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之势，对稳定天京及整个太平天国的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洪秀全正是利用了石达开创造的形势，才能够腾出手来，整肃内部，编练军伍，重新形成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骨干的军事核心。浦口、三河两次战役的转机，使太平天国一度中兴。

天京的一度中兴，是由于陈玉成、李秀成密切合作，捻军有力配合，广大将士用命取得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石达开转战赣、浙、闽，牵制大量清军，才使得清军无处调兵，使得李续宾孤军深入，使得陈玉成、李秀成、张洛行以及吴如孝各路大军无后顾之忧，运动自如，一举歼敌。因此，石达开的艰苦转战，也是天京一度中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四) 石达开回师江西

一八五八年秋冬，石达开部先后攻克江西瑞金，连城，南安。部队在这里休整。

一八五九年一月，杨辅清部正在景德镇与清军进行激战，石达开看准这一时机，派出两路军队分别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和信丰，牵制清军，以配合杨辅清部的作战，并有进攻赣州，进一步与杨部联合收复江西的意向。结果，在石达开撤离福建后已经把注意力转移至对付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势力的曾国藩调萧启江部前往应战付石达开，造成了对杨部作战时兵力上的分散。

这一次用兵，是否如某些史学家所说，仅仅是“客观上”与杨部形成了相互配合的效果呢？《骆秉章奏议》中的这段话很说明问题：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囑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由此可见，石达开部的行动是应杨辅清的要求而与之配合，其对清兵的牵制和对杨部的支援是有意为之，而不是无心插柳。值得一提的是，杨辅清是从石达开的部下脱离出来的，而且正因为他的突然脱离，才导致石达开开辟浙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而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后，又被封为中军主将，其实是取代石达开的“通军主将”成为太平军全军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犹能不计前嫌，与之商议军事，配合作战，可见石达开是不计个人得失而顾全大局的。

石达开部进入赣南之时，曾国藩曾对赣省军事作出如下分析：

“赣州居江西之极南，景德镇居江西之极北，相距千有余里，臣驻建昌，距两军各五六百里，调度不灵，转运不便，且两处皆孤军深入……今日详加体察，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与其悬心两地，不若专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抚臣耆龄，请其别调劲军，以剿南，赣，兼办团练，以散胁从。臣即专办北路，调回萧启江一军，归并饶州，彭泽等处，在江西则臣管北边，耆龄管南边……”

而《平定粤匪纪略》对这段历史做了如下记载：

“景德镇陷后，官军失利于（鱼严）鱼山，复陷东流，扬言欲窜湖口、九江等处，及闽贼回窜，出瑞全、会昌径入信丰，抵南安界，警报日急。张运兰奉檄调自闽赴建昌。曾侍郎谓曰：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亦无害，所以调至者，图商景德镇耳。若东犯广信，西踞湖口，则九江危矣。即日拨带劲旅，倍道驰抵景德镇……”

很多学者引这两段记载，尤其是《平定粤匪纪略》中“闽事不足虑”一语，以及咸丰九年曾氏致书吴国佐“此次贼由南赣窜湖南，足下于去年十月曾经虑及，仆不甚以为虑”之言，结合之曾国藩称石达开部“”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的评论，得出此时石达开部的行动已对敌人无甚威胁的结论。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对战局的把握是相当精准的，石达开回师江西后，杨辅清写信给他，“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窥皖鄂。”可见石达开部北进赣州是对杨辅清的一种回应。联系“扬言欲窜湖口、九江等处”“以窥皖鄂”来看，九江才是当时太平军与湘军较量的焦点。杨、石欲从江西“窥皖鄂”，位于江西，安徽，湖北交界处的九江无疑是要“窥”的。石达开部的行动虽在赣南，用意却非攻城略地，他做出北进姿态，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实际是欲将湘军的一部份注意力从赣北转移到千里以外的赣南，也就是造成湘军“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的局面，以此来声援景德镇杨辅清部，减轻杨部的压力，乃至为其进一步进逼湖口九江创造条件。因此，曾国藩所作出的“信丰、南安贼亦无害……若东犯广信，西踞湖口，则九江危矣”的判断，是抓住了战局要害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却是，曾国藩尽管看出了赣北战事是重点，却终于只调了张运兰一部去景德镇，而人数犹在张运兰部之上的萧启江部却留在了赣南继续与石达开部对峙。曾国藩明知道“与其悬心两地，不若专力一方”，却还是形成了这种“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的局面。但这也不能说是种失策，因为石达开的北进姿态虽然在后来看其实是“虚”，但倘若湘军对其不屑一顾，全力争夺赣北，石达开随时可以“虚者实之”，按杨辅清提议的那样“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窥皖鄂”，萧启江部尚不足以阻挡石达开部入湘，赣南那些团练武装就更不足以阻止石达开部长驱北进了，而石杨二部“合势以窥皖鄂”无疑是曾国藩最不希望发生的状况之一。所以，明知是计，却又不能不中，终于将萧启江部留在赣南。《平定粤匪纪略》

又记：“贼初踞景德镇，势焰熏炽，江右要冲之区，肆行无阻，及南安既复，信丰解围，大为官军所惩创”，可见石达开部在南安和信丰的活动的确有力牵制了湘军，是杨辅清部在赣北“势焰熏炽”“肆行无阻”的重要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太平军在江西虽未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与湘军的对峙中是把握了战局主动权的，杨辅清部在景德镇一度占据过优势，其声势甚至对湖口九江造成威胁，延缓了湘军对安庆的进攻，石达开部在赣南从容休整了一个冬天后，突然进入湖南，一路长驱直进。湘军路兼顾，却两边都没能经营好，这是石杨二部相互声援，相互牵制敌军的结果。(待续)

## (五)南安决策

湘军分兵两路制敌，虽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地，却也使太平军两路都难以迅速取得突破，石达开看到杨辅清部无力继续挺进湖口九江，而赣南的萧启江也不可能让他轻易北上与杨辅清部会合，乃改变策略，致书杨辅清，谓“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欲先“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由此实现“窥皖鄂”的目的。

显然，石达开和曾国藩对全局影响不大的赣南战事的兴趣都很有有限，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

然而，到此时，内部矛盾和外部局势的演化，都使得石达开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军队在全局中的定位。

在内部，此前，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使原来的“通军主将”石达开失去了在太平天国辖区指挥作战的名义，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而洪秀全加封从石达开部脱离的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不仅证实了他是“石杨矛盾”的幕后策划者，更再次明确表现出其对石达开的态度。

此外，石镇吉部福建汀州与石达开部分开后，就自领一军，开始进入攻江西，被湘军刘长佑部挡回福建，不久后石达开部进入江西，他们却没有前往会合，反而长驱入粤，此后虽然和石达开部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但始终未再回复本军。从石达开部在此前后的行动来看，石镇吉部的行动不像是出于石达开的部署，而更像是独立行动。

是不是如某些清方将领推测的，是因为镇吉“与达开疏”，也就是有史学家说的，石镇吉与石达开有私人矛盾，造成石镇吉部脱离呢？应该不是。据记载，后来石镇吉进军桂林期间，石镇吉还曾接受石达开的委托，到广西贵县寻访留在那里的石姓眷属。两人在分军行动后还能如此，可见他们的私人感情不但不坏，甚至还相当好。不仅如此，据石镇吉在被俘后的自述中说，他在溃不成军以后还想去投奔石达开，如果说石镇吉因为和石达开有个人矛盾而带队叛离，在几乎全军覆灭以后竟还想重归其麾下，未免不可思议。既然不是私人关系造成分道扬镳，也不是因为怀才不遇得不到重用，那只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石镇吉在被俘后留下的口供中说，他是奉“天王诏令”“前来两广招军及兵马”的。可见，石镇吉之所以脱离石达开，和杨辅清一样，也是出于洪秀全的拉拢分化。总之，洪秀全在背后不断地施小动作，使石达开防不胜防。

在外部，太平军虽然取得了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的局部胜利，不利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的被动。九江失守以后，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壁垒安庆已经直接暴露在敌军兵锋之下，而湘军也已对安庆虎视眈眈。加上天京方面一向以来划地为牢的军事思想，使战局的主动权一直被把持在清军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于这年春节在大会所部诸将于南安，商议下一部的行止，近年来，很多论者都将这次会议视为石达开远征的转折点，认为石达开在这次会议中采纳了军略萧发胜提出的经由两湖之地进取四川的建议，从而确立起远征四川战略的，并这一决策称为“南安决策”。

南安决策是石达开远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一年半时间中，石达开的转战一直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其附近，他并没有远征的打算。这次决策之后，他才长驱入湘，在湖南腹地发动“宝庆会战”，从此远离了天京战场。

这种变化从清军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石达开部刚进入南安时，清军的记载是“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贼首则据池江。”前文提到的石达开的作战部署，也显示他此时的确考虑过重回江西战场，这个计划应该是先打下赣州，牵制敌军于赣南，为赣北的太平军减轻压力，如果有机会，即从赣州北上收复吉安，临江，并与赣北太平军共谋收复九江。

但是，石达开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其主要原因估计有二：

其一，石达开离京以来，一直把大量精力花在应付与友军及太平军旧将关系方面的精力，从他在安庆长达五个月的徘徊，到苦心布置的三路援救天京的计划，到在福建两个月的徘徊，皆是如此。而最明显的就是在石镇吉部眼看就要攻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金华的时候，由于杨辅清的脱离而被迫后撤，全盘打乱了半年来苦心经营的入浙之计。而在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之后，处理这方面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困难，棘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手足相残，甚至亲痛仇快的局面。

其二，过去一年多的作战，除抢渡赣江的失利外，多数时间军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这和内讧前太平军打过不少胜仗，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顾此失彼一样，根本上讲还是“划地为牢”的战略思想导致的后果。对于这种战略思想，石达开本来就不怎么以为然，他深知如果一味死守天京，必定处处陷于被动，最终导致失败（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而主张争取上游，以取得全面胜利。因此，现在既然已经可以独立行动了，而留在天京附近又举步为艰，不如趁此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思想，在不受牵制的情况下去开辟新的战场，争取以此令全局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对于南安决策的具体内容，史学界迄今尚有很大争议。

前文曾数次提到《骆秉章奏议》中的一段向来为人忽略的文字：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囑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从这段文字看，石达开进军湖南宝庆，目标似乎不在进军四川，而是他与江西太平军商议的“合势”，“以窜皖鄂”“取上游之势”的一部份。湘军东窥安庆，远离后方，补员和给养方面都暴露出困难，如果石达开能够攻下宝庆，从占领湖南腹地，而后回师湖北，就可以逼湘军回撤，既利“皖”（解安庆之围），又图鄂（从湖南和江西夹击湖北，收复武汉），这样一来，通过“取上游之势”，太平军就可以一举扭转天京附近战场的被动局面，造高屋建瓴之势，既解除了清军对安庆的威胁，又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骆秉章不可能凭空伪造石达开信函，这段记载中当属可信的。而且，它可以解释一个历来的史学家和军事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石达开兵逼宝庆以后，会一反入湘之初那种“电骤飏驰，昼夜奔蹕”的灵活机动，不抓紧时间回师之前问道入川，却执著于对于入川并非必要的宝庆一城之得失。因为难以解释，论者们只好笼统归结于石达开远征本身的错误甚至所谓的“阶级局限性”，但这样的解释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而如果假定石达开入湘的目的是占据宝庆为据点，取上游之势，与江西安徽太平军合力恢复武汉，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另据广西大成国起义平南王谢乐言被俘后的供词称，石达开在发动宝庆会战期间曾派人联络大成国陈开等人出兵，“嘱陈大哥同小的兄弟来攻永州，破东安、新宁，即从五峰铺入宝庆，石大哥就统郴州得胜的众兄弟破祁阳入宝庆，约在宝庆与陈大哥相会，再行定议破衡州，以围长沙省的话”，虽然石达开是否确有围攻长沙的决定不能据此而定，或许仅是其想法之一，但此供也同样证明石达开“南安决策”的战略方向是两湖地区。

还有一份材料可作为侧面补充参考：一八五九年春夏之交，洪仁干被委任主理国事之初，石达开即遣使团道贺，并且提出今后一切上给天王的奏章均由请干王代转。石达开这么做本身并不出意外，但他在宝庆会战全面展开的时候却还注意着天京方面的一举一动，反应如此迅速，这就不寻常了。如果他的战略本身与天京方面相关，则他即使在大战当前时还随时注意天京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主政人的变化，就非常可以理解了。

那么，石达开的“南安决策”中不包含进军四川的意图吗？这却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左宗棠等人是从太平军俘虏口中得知石达开的入川企图的，太平军的俘虏虽不无可能说谎，但却不太可能异想天开地编造石达开意图入川的企图。（现存所谓石达开在出广西时就有入川想法的记载都是后来人的说词，且与《李秀成自述》相矛盾，显系附会，不足为信）

两种说法都不似虚言，那“合势皖鄂”与“进取四川”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很可能第一选择（取湖北）和第二选择（入川）的关系。只要攻下宝庆，主动权就在石达开的手里。他既可以入川，也可以回师湖北，如果兵力充足，他甚至可以兵分两路，一路打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开辟西南战场，抢夺“天府之国”这个清廷围剿的大后方，另一路入湖北，与江西的太平军两线夹击，收复武汉三镇。

## （六）“南安决策”再析

战略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适当的调整，一个高明的战略，可以预先包含对于各种形势变化的应变，“南安决策”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战略。

从当时情形看，如果石达开夺取宝庆，极大的可能曾国藩移师夔门，以阻石达开入川，当时清廷的战略将“保蜀”置于最高战略考量，后来同意曾国藩留在江南也是以“川境可确保无虞”为前提的。一清廷调曾国藩及重兵入川，安庆之围不战而解，石达开更可自上游与江西，安徽等地太平军共趋鄂省，光复武汉。何况太平军深入湖南腹地，势必牵动湘军全线军心动摇，收事半功倍之效。正如朱偕汉先生在《石达开在南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决策》一文中分析的：“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远离后方，暴露了湘军在补员、给养方面的困难。也造成了湘军将士对太平军突袭湖南畏惧。倘若太平军避实就虚，迂回赣南湘南，进攻湖南腹地，从而推向湖北，必将动摇湘军军心，迫使湘军回救湖南。这不仅可解安庆之围，且太平军也可再造高屋建瓴之势。很可能石达开就是根据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决定第四次进兵湖广的。且可能又考虑到

太平军在赣浙新挫，士气尚低，补给亦难，石达开采取由浙而闽，经江西南安直插湖南腹地、推进湖北的行动路线。”--这就是南安决策“取上游之势”的首选方案。

而如果清廷仍将重兵留在东线，坚持以保卫武汉，围困安庆为第一考量，而天京方面又不肯给予有力配合，下趋鄂省的目的不易实现，那么挥师入川便不失为一种避实击虚的选择，且仍不失“取上游之势”的目标。

众所周知，益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必争之地”，自春秋，秦汉，三国，直到清朝(三藩之乱)的历史都反复证明着这一点，这由地理和经济两方面条件造成的。

以太平天国当时的局面而言，石达开攻蜀地，首先是危及清廷的经济命脉。由于南京被太平军占领，两江之地战火连天，江南粮仓清政府财政三分之一的所出已经失去依靠。而两湖之地同样战火连天，这种情况下，无论盐，粮，钱，蜀地都是清政府的依靠之地。

先说盐，由于江南之战事使得“两淮盐不得上行”，尤其两湖之地奇缺盐，对策便是以川盐运抵两湖。盐不仅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到军饷所出，军无饷，不战自败，对团练武装尤其如此。而胡林翼就说过，“蜀之盐斤百货厘税，亦军饷所出。”由于两江两湖地区的战事，使得蜀地成了清廷经济命脉，所谓“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是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除了盐，钱，蜀地更是“粮”的来源。“西北故寒瘠，东南兵兴”只有“蜀犹完富”，当时湘军楚军，之所以能与江南太平军反复周旋于安徽湖北战场，依靠的正是蜀地之粮的支援。所以当时有说“若四川不支，则楚与秦均不安矣。”“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虑。”

一言蔽之，在失去南京，两江两湖战火连年的情况下，蜀地成了清政府“盐粮钱”的所出之重地，是全国唯一的“完善之地”，是剿灭起义的“协济省”，是个丢不起的地方，如果丢了，两湖军队的粮草，军饷，食盐，立即大部失去着落，战局不败自败。

蜀地又一度是清统治区中军政势力都比较弱的，四川总督在咸丰登基后，平均每年一换，其中有多位甚至根本未上任，由成度将军临时代理。这个省乱到一半时间没有最高军政长官。一方面是川军“疲玩已久，毫不足恃”，一方面则是川，滇南，黔，陕等地反清力量空前壮大，是年秋天李蓝义军进入四川后迅速扩充到了几十万人，势如破竹地席卷半个川省，后来骆秉章入川后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基本把起义力量镇压下去，石达开部论素质，论实力，论指挥能力都远胜李蓝义军，倘若清廷不肯从江南抽调重兵入川，要夺取整个四川并非难事。

因此，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大致可分三个部份：一是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抢夺作为敌人后勤保障的“完善之区”，为争取全面胜利做准备，二是分散敌人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三是团结西南各路义军争取上游，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从根本上改变全国反清的战略形势。第一点非常明显，不需多言，第二点在“进军浙闽”中就有体现，在后面的战役中还会不断体现，第三点则可从石达开与杨辅清的通信及他选择进攻宝庆作为入川的途径中看出。从后来的历史看，如果石达开攻占了宝庆，洪秀全方面仍旧无意与之配合，清军不肯放松对江南的围剿而李蓝义军又在四川声势浩大，他很有可能转入四川与当地义军配合，夺取全川，再以之为基地收复湖广，或者出关中谋取中原。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一个既顾天京，又谋全局的高瞻远瞩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置天京生死于不顾分裂行为，更不是因为想“独树一帜”“自立一国”。



这一年的冬天，石达开在赣南策划入湘，在湘赣边界积蓄力量，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干扰，进展尤为顺利，一八五八年春夏，石达开部长驱入湘，发动宝庆会战，令曾国藩哀叹“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张并力南路，不令凯章(张运兰)图景德镇也。”

曾国藩在事实面前自悔失策，承认低估了石达开远征军的威胁而造成被动，这是比其他任何分析都更有力的反驳。他急于解决景德镇的太平军，无非是因为肃清景德镇后，才能实施他和胡林翼商定的分兵三路围剿安庆的计划。同对安庆长期觊觎，这本不错，但石达开部在江西大败萧启江部，萧部遂无力阻止太平军入湘，石达开部入湘后连战连捷，一路长驱直入，到后来宝庆围城，外省湘军军心全面动摇。原定三路围剿安庆的军队，第一路以荆州将军都兴阿统多隆阿，鲍超等部马步兵勇为一路，已经进抵安徽太湖，却因后顾之忧而不敢再行深入，乃至坐观陈玉成、李秀成合力进攻浦口而无所行动。其时胜保攻击湘军按兵不动，胡林翼回奏指出“胜保不知湖南近日情形，不知湖北南路空虚。因此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第二路李续宜部原已整装待发，却改援宝庆。第三路即景德镇张运兰部湘军，拟于景德镇得手后即由曾国藩亲自统领转攻安庆，然而在景德镇得手后却步但没有乘胜进逼安庆，却将这支军队调去了宝庆，这当然不是曾国藩不想继续攻安庆，而是因为张云兰部多湘乡人，湘乡距宝庆仅百里之遥，“军心已摇，只得因势利导，令其回援。”最终这一次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

石达开自从避祸离京后，行动不再受天京制约，很明显，他不愿与清军多进行局部的拉锯战，而一直在寻找战局的突破口，第一次是试图从赣西切入江西战场，第二次是试图在浙闽建立根据地并分天京之势，第三次是从赣南作出北进姿态，第四次就是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但曾国藩对石达开“取上游之势”的行动却估计不足，致使石达开入湘后一度占得先机，其深入湖南彻底打乱了曾胡围剿安庆的计划，景德镇湘军虽然得胜，却已无力进逼安庆，反而被迫回援湖南，因此曾国藩才会说出“早日如此……”一番话来。其实他的失误不在于没有专意赣南，而在于没有及时把战略重点从进攻赣北转移到当时于全局影响更大的阻止石达开部入湘上来。他所哀叹，毋宁说是因为对石达开部的战略和威胁估计不足，以致围剿安庆的计划欲速则不达吧。尽管这只是句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后诸葛亮，却可从中看出这一时期石达开部在赣湘的转战一度给湘军造成的被动处境。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四)宝庆会战

### (一)战略转移

太平军在南安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整部署，平安渡过了远征以来第一个低潮期，也逐渐重拾了撤离浙江后一度失去的战争主动权。阴历春节后不久，奉曾国藩命攻击石达开的萧启江率部来到赣南，除他本部湘军以外，还纠集了四万“田勇”配合作战。

萧启江在清知府刘狱昭和参将胡中和、梁万贵的配合下，进攻南安附近的新城墟。萧启江认为，对付这支太平军“可以智胜，难以力取”，于是命以田勇出队，而湘军主力设伏以待。2月20日战斗开始后，田勇很快在太平军陈亨容、李隆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由于田勇战斗力本就远在太平军之下，陈亨容、李隆遇不疑有诈，一路穷追不舍至七八里外。是时清军鸣炮为号，伏兵立即将太平军后路截断，而主力分三路杀出。此战湘军大胜，一举攻克新城墟，兵锋直指石达开的大本营----池江。

石达开得报新城墟失守后，随即制定了应变措施。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湘军赖以诱太平军中计的这些田勇来部署反击。

于是，太平军没有向新城墟发动反攻，反将主力秘密撤出池江阵地，埋伏在距新城墟十余里的麻布陇一带。2月22日，萧启江部仍以田勇为前队，进攻池江太平军大本营。清方谍报探得池江太平军甚少，“田勇”遂放胆深入，当萧启江怀疑有诈、传令收队时，为时已晚。太平军枪炮齐放，伏兵尽起，他们不以歼灭包围圈中的田勇为目的，而是反复冲击，令其溃败。缺乏训练的田勇们被太平军打得惊惶失措，蜂拥返奔，数万溃勇很快把湘军正规部队的阵脚冲得大乱，这时石达开才命部队就势掩杀过去，太平军越战越勇，反败为胜，并击毙都司龙复胜，把总洪复胜等人。

二天以后，萧启江收拾残兵，再攻池江，先设伏于麻布陇一带，再诱石达开出战。石达开识破是计，传令坚守不出，仅派数百人对付前来“诱敌”的清军。26日，萧启江再次布置伏兵后进攻池江，太平军仍不假理会，反公然将大队撤出池江，向南安城靠拢。萧启江因四天前的大败心有余悸，竟不敢追击，眼睁睁看着太平军从容退向南安，直到数日之后才追向南安。

池江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而萧启江不敢尾追的事实则显示江西湘军气焰受挫，石达开决定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加速实施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石达开一面指挥部队向湖南转移，一面在南安布下诱敌之计，拖住湘军，掩护大队。3月4日，湘军追到南安城下，但见城中烟焰迷天，随即听说太平军发生“内乱”，守军弃城而走，急派营官朱桂秋、黎得胜、胡中和、刘岳昭、梁万贵等会同练勇攻领东门和北门，营官毛冶祺、秦华祝、唐星照、戴龄等会同田勇进攻城外各村“贼垒”“贼馆”，是时南安南北二城的太平军主动西撤，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而后杀回马枪，痛击追兵。接着，各村号角四起，萧启江急忙传令收队，不敢再向已是空城的南安迈进一步。守军见湘军受到震慑，不敢再进，遂安然返城。其后三日间，湘军未敢再攻南安，直到3月7日始复来，这时太平军大队早已转入湖南，留守的小股部队不再多与湘军纠缠，兵分两路撤退。

就在萧启江部湘军被拖在南安的十余日间，石达开所部江西太平军已全面挺进湖南。池江大捷四天后即1859年2月28日，奉命自江西崇义进军的太平军赖裕新、傅忠信部进抵湖南桂阳热水岭，遭到清军刘培元、彭定太的阻击，打响入湘之战。在太平军猛烈进攻下，清军仅数小时即“全军覆没”，桂阳赶来的援军急忙逃回城内。太平军将清军营垒尽予摧毁，并于3月2日攻克桂阳县城，取得在湖南的第一个据点。3月11日，太平军以骑兵开路，冲进驻扎桂阳、宜章分界处文明司的清军营地，清军溃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采用了过去少见的骑兵冲锋战术，桂阳、宜章、宝庆的战斗中都有相关记载，此后直到到四川仍有关于赖裕新部“骑兵”的记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12日，又大破驻扎官渡的清军营盘，并以骑兵追击，乘胜直下宜章。13日，由秀流河上下游同时发动抢渡，击溃扼守秀流河的清军，击毙敌将段万彩刘祥信等人，攻克兴宁。至此，湘东南三大军事重镇在半月之内接连为太平军所据，郴州府门户洞开。太平军在入湘第一阶段中牢牢把握主动，顺利实现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 （二）挺进湖南

湖南本是湘军的老巢，但“官绅招勇筹纳，百计外援，物力已薄”，加之当时两广和湖南交界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声势愈壮，骆秉章、左宗棠担心石达开的乘虚而入全线动摇各省湘军的军心，进而影响整个战局，“湖南频年内固封守，外援四邻，财力既殫，人才亦耗……兹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荼毒，即

绅民之出演援剿者，皆不免有内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于是一面由左宗堂全权负责“筹饷募兵”，飞檄各郡搜集兵将、编制队伍，飭留籍湘军头目火速招集旧部，集结在籍湘军官兵四万余人，一面急从各省抽调步兵、水师、炮舰、马队入湘助剿。

湘东南三大战略要隘失守后，清军退守宜章至郴州和兴宁至郴州两条路线。因兴宁以西为东江所隔，石达开命部队从宜章进军。3月15日，赖裕新等自宜章出发，间道趋郴州府属之外岭、良田，迅即攻克，击毙清巡检卢铨，乘胜夺取郴州，跟着分兵两路进攻桂阳州，17日轻取桂阳州，全歼守敌，仅知州张济远一人仓惶逃命。

郴州失守后，左宗堂判断太平军将北进常宁以窥湘江枢纽衡州，以衡州为中心部署了防御反击体系。石达开见敌军把战略重点放在控制通往衡州的水陆交通线上，对常宁防守尤为严密，遂再一次将计就计，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以少量兵力佯攻衡州以南的常宁，牵制湘军主力，而太平军主力向西迂回，拟从西南方绕过衡阳，取道祁阳直捣湖南中部重镇宝庆。在那里休整并补充粮草后，既可作为经略两湖，下趋衡州、武汉，或进取长沙的据点，又可向西出辰溪、沅陵，到达四川的秀山、酉阳，或北出常德、澧县、荆州、宜昌，溯江入川。与此同时，石达开还派人与如火如荼的广西大成国起义军取得联络，约其一同向湖南发展。大成国对此极为重视，特派其“四王”之一的平南王谢乐言亲往湖南探查军情。

当湘军以为可以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严密的防御体系阻挡太平军于衡州防线时，太平军主力已趋向嘉禾，3月19日攻克嘉禾后，继续向西迂回，以小股佯攻北面的新田和临武，迷惑敌人，主力则趁机进入宁远县，3月31日，先头部队向祁阳发动进攻。至此，太平军在入湘第二阶段中继续掌握了主动，长驱直入，绕开敌人的重兵防御，顺利将战线推进到地处衡州、永州之间，西北界接宝庆，“正居中用奇之地，又为大军后路(骆秉章语)”的祁阳一线。

### (三)分兵作战

左宗堂得知石达开已突入宁远，又从俘虏口中获悉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是自祁阳进攻宝庆后，急忙调整部署。当太平军扫荡了祁阳城外守隘清军，准备攻城时，刘长佑部湘军于4月4日率先赶到祁阳增援。这时，祁阳城下的太平军突然调转兵锋，改攻永州，与刘长佑、江忠义、席宝田部展开连日激战。清军援军续至，永州城外的太平军四面受敌，难以抵挡，被迫放弃攻城。

石达开获悉先头部队攻打永州遭到重兵拦截，意识到清军已经察觉了太平军的军事意图，遂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为避免单线作战容易遭受多方包围的不利情形，决定分兵渡过湘江，开辟西路战场。4月11-15日，太平军主力陆续自宁远进入祁阳境，这时，杨载福已派湘军水师副统领王明山从衡州赶往祁阳，企图利用水师严密封索湘江，防止太平军渡江。4月15日，太平军在祁阳下游十里的观音滩公然编造船筏，进行渡江准备。清军驰赴观音滩对岸阻击，太平军随即退却。16日，清军过江进剿，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清军收队进入祁阳。当夜，太平军出人意料地再次从观音滩驾筏渡江，终于偷渡湘江成功。

渡过湘江的太平军由赖裕新、傅忠信率领，进军与广西全州和宝庆府属之新宁接壤的东安县，4月22日破城，全歼守军，知县李右文等毙命。这一分兵战略再次出乎清军意料之外，直到太平军兵临东安城下，清军才急调刘长佑赴援，军未至而城已破。

此后，太平军弃守东安，由赖裕新担任诱敌任务，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调动敌军，傅忠信则率精锐伺机而动。赖裕新先佯攻新宁，又故意折回，作出直捣广西全州的态势，并派人联

络当地天地会义军，准备会合，吸引敌人追赶。湘军刘长佑与刘坤一部果然率军向全州方向追堵而去。

敌人一被调动，驻扎在东安附近的傅忠信部立即挥师新宁，兵锋直逼宝庆，刘长佑与刘坤一闻讯后，急忙调头赶回新宁。回师新宁的湘军被占尽地利、以逸待劳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营垒全部被踏平，辎重悉数被缴获。傅忠信部乘胜离开新宁北上，直趋宝庆府。

而担任诱敌任务的赖裕新部这时已经联合上了广西全州天地会义军，在他们的配合下，从容回师，折反湖南，分兵进攻武冈、新宁，以牵制刘长佑增援宝庆的部队，并于5月下旬师抵宝庆。

在此期间，石达开派出一些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活动，张大声势，干扰敌人的判断与部署，他本人则仍拟取道祁阳赴宝庆，祁阳战役就此展开。

4月22日，湘军知府刘坤一、王勋、副将余星元、杨恒升分三路进攻祁阳太平军，拔营垒11座，太平军旋于清军追击途中杀出伏兵，反败为胜。此时西路战事打响，刘坤一率军西援，祁阳清军实力锐减。24日，两军激战于过水坪、双桥一带，太平军追斩千总罗士荣，外委张友元及清军数百人。其后数日，湘军援军云集祁阳：肖翰庆统带水师营沿江巡截；廖洪顺的长胜军，陈缙的吉字营，阳安臣的阳字营，黄三清的清字营分据城外各险要；何绍彩的何字营以及刘岳昭九个营分驻熊黑岭灵官殿一带，企图围困太平军。5月3日，新任永镇总兵周宽世驰援祁阳，太平军乔装清军往迎，对周部进行突袭，周军伤亡惨重，骆秉章又飞调魏喻义的质字营，赵焕联的和字营进援熊黑岭。

太平军与湘军在熊黑岭地区展开会战，互有胜负，5月中旬，傅忠信、赖裕新两军已按计划回师，石达开决定速战速决，尽快前往宝庆，遂于5月17日分兵十路向熊黑岭发动总攻。双方激战十小时，太平军佯退引清军追赶，另以一军迂回侧袭；清军大乱，弃甲倒戈而逃；太平军一路切断清军退路，一路直捣清军大本营；清军弃守熊黑岭，退据宝庆44里外之洪桥，沿途死伤甚众。

太平军取得熊黑岭会战胜利后，随即向宝庆移师，清军留何绍彩、黄三清两个营守洪桥，以刘岳昭的九个营驰援宝庆，太平军乘洪桥兵力虚弱，于5月21日杀回马枪，一举摧毁清军营垒，又于24日和26日分别击败拦截和追赶的敌军，从而冲破清军的尾追堵截，达成了与赖裕新、傅忠信部会师于宝庆城下的战略目标。

到宝庆后，石达开命赖裕新驻扎城西，傅忠信驻扎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太平军5五月底起连续发动攻势，城外援军也多次对围城太平军实施攻击，但始终未能对太平军造成实质性打击，到6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6月17日，太平军完成了对宝庆的四面合围。

由以上经过可见，永州受挫，只是一次孤立的失利，并未影响太平军向宝庆进军的总体战略；祁阳战役虽未破城，但太平军取得了熊黑岭会战的胜利，歼敌甚众，更摆脱围困追堵，成功移师宝庆，当属小占上风----至多算是平手。纵观太平军由永州至宝庆这一阶段的进军，虽遭多方阻击而不似前两阶段所至披靡，但仍旧把握住了战局的主动权，实现了全军会师于宝庆城下的目标。就连一向讳败扬胜的官文在宝庆即将合围之即也不得不承认：“湖南征发能战之卒，水陆几五万人，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足见前章引曾国藩称太平军“钝于永，钝于祁”的贬词，实属小题大做。

事实是，从南安到宝庆的四个月，石达开远征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时常采用暴风骤雨式的急行军冲破敌人的阻拦，战术灵活多变，几支部队时分时合，多方牵制，使得敌人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成功的战略部署和巧妙的战术一再干扰了敌人的判断，在大范围运动中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既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的，确保了全军顺利抵达宝庆，进而完成合围，又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军在江西、湖北和天京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援了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作战，是一段极为精彩的战斗历程。

#### (四) 清方对策

太平军到达宝庆之初，左宗棠等即令坚壁清野，将宝庆城外的民房街市庙宇全部焚毁，以使太平军不能以之作为进攻的屏障与掩护。

然而，清方将帅对于湖南会战重要性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湘系集团的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一开始就主张全力应对，湖广集团的官文、都兴阿、多隆阿、舒保等则不甚以为然。他们认为，安徽的陈玉成部一直对湖北虎视眈眈，以湖北现有兵力与陈玉成相抗，鄂东防御已经可虞，何况按照既定计划，此时湘军正当分兵三路进图安庆，尤须厚结兵力。因此，对胡林翼从湖北调兵增援湖南的意图相当不满，认为是“不援皖而唯湘是图”，“湘人以空虚而致贼，鄂人奈何效尤？”

针对湖北官吏的埋怨，胡林翼指出，陈玉成于三河大捷后在安徽二郎河遭受重挫，损失严重，非经休整蓄锐，无力发动凌厉攻势。而石达开即使不打永州、衡州、宝庆，也未始不能重施咸丰二年太平军东进之故伎，绕过三郡直导湖北。一但“湖南不能追”，则“湖北势不能堵”，由是石达开不止将“由西路窥伺巴蜀”，而且“附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间”。湖南不支，则“湖北御此大股，必须再添两万人。饷力固不能任，将才又不能多”，彼时湖南“非全境肃清三、五月后”必不能援鄂，所以为湖北计，“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

在胡林翼的再三陈说利弊下，湘鄂集团终于统一了思想。先由官文俱折呈奏保蜀之困难性及必要性——“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蜀中承平日久，额兵多半调拨他省，猝欲御此强悍之寇，深恐力不能支”“查蜀中富庶为时下财赋之区，中外皆资其力。若贼得肆志入蜀，其(氏鸟)陷张必数倍于湖南，不特贻患于两楚，防无虚日；并恐蚁附蜂屯，西出关中，为秦晋之大害。历观史书所载，蜀之安危，关系中原大局。盖土沃民众，能善用之，则可御外侮；不善用之，亦足借寇兵也。查天下之势，西北足以控东南，东南不足抗西北。故贼踞江皖，而楚省尚可复完备，因得上游之势”，继而要求“飭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至于江西太平军“不过万余，或请飭李定泰守饶州，饶廷选守抚州，彭玉麟守九江，自能保固疆圉。俟南省肃清，蜀事果定，则楚军得以专意东征，即江西余孽，亦不难殄灭矣。”十日后又由官文和胡林翼会奏，更加明确地提出“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全局战略，湖北带头做出榜样，尽管本省“马步水师各营，既以全力规画院江南北，更复西顾荆州，北防商固，而粤匪捻匪窥伺多端，水师马步各军应接不暇”，仍“以湖南异常紧急，于万难筹拨之个，勉力抽调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补疮，移缓就急”，抽调援兵一万五千人，而且用饷全由湖北负担，不烦湖南，确是全力支援。

这样，清军投入宝庆会战的兵力，包括在籍湘军官兵士兵四万人和从皖赣鄂等省陆续调集的约三万人在内，总数不下七万。其中除前文提到的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及祁阳城下各路援军外，先后还有曾国藩调萧启江、张运兰部往援；骆秉章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军往援；官

文、胡林翼调马队二百，总兵王明山、陈金鳌、知府萧翰庆、副将孙昌凯率水师四营携炮船一百余号往援；续调安庆水师参将杨明万、游击曾绍霖、副将刘国斌携炮船九十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二十八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往援，又续调荆宜施道李续宜自黄州、武昌往援。此外，还令攻皖的都兴阿、多隆阿、鲍超部停止深入安徽，作为援湘预备队随时待命。

对于宝庆会战，湘鄂集团中有一个人的态度却始终暧昧----他就是湘军主帅曾国藩。按理说，作为湘系集团的一员，他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该“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况后来连湖广集团都转为支持湘系集团的战略。曾国藩的暧昧显然与他肚子里的小九九不无关系----关于这点，前面章节也有分析，此处再补一旁证：一年以后，石达开于广西再次意图起兵入川，曾国藩力主左宗棠暂缓离湘赴鄂，强调“(胡林翼)来示全军心而后能保楚，保楚而后能图吴，吾谓固湘而后能全军心也”。其实这一次清廷上下判断石达开的意图是取道贵州入川，对于湖南并无直接威胁，曾国藩尚如此紧张，宁不令左宗棠赴下游以有备无患，然则对比宝庆会战时期曾国藩态度之消极，能无自相矛盾乎？可见，由于曾国藩不愿在未得川督实权的情况远离长江中下游战场和旧部前往四川，他在宝庆前后的许多言论是明显夹杂了私意的。其实曾国藩本人在石达开进军湖南后发出的“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张并力南路(石达开部)，不令凯章(张运兰)图景德镇(杨辅清部)也”的自悔之词，亦已承认了在未消除石达开部威胁前进攻安庆是不明智的。(曾国藩急于攻打景德镇，是为围剿安庆做准备)因此，某些论者置整个湘鄂集团“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方针于不顾，仅对曾国藩的言论断章取义用以评估宝庆会战，显然是片面的。

#### (五)宝庆失军

宝庆会战自五月底拉开帷幕，太平军在对宝庆攻坚的同时，更与城外援军展开了激烈的拒援战。以7月中旬李续宜统率的第二批湖北援军一万二千人到达宝庆战场为分界，可将会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太平军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虽然清方史料多讳败扬胜，但官文在6月中旬的奏折中称“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屡挫贼锋”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贼势不曾稍弱”却不会是对太平军的溢美。同一奏折又称“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并要求敕令曾国藩五十日内赶到四川布防，可见对取得会战的胜利缺乏信心。6月下旬，清帝下旨令曾国藩移师夔门，而官文与胡林翼会奏力陈必须“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湖南并不属于“西南”，奏章中的“西南”指的只能是四川，他们已经在以石达开突入四川为前提进行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了。由此可见，截至6月下旬，太平军对宝庆的威胁非但未曾减轻，还有愈加严重的趋势。

正面记载方面，据当时一位参战的湘军将领回忆，他在宝庆城下与太平军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中，败者六十有余。其中太平军在7月上旬向城东何绍彩部援军出击，取得“洪桥大捷”，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大大振奋了士气。之后太平军一直针对援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以遏制援军的进逼。刘长佑曾欲从东北方逼近太平军营盘，但这一动向立即被石达开察觉，太平军随即在东北方加筑营垒，同时出兵向西北方迂回包抄刘长佑的后路，使其不能造成进一步的威胁。由是直到7月中旬，太平军在宝庆城外的战斗中仍然兵势甚强，占据着主动。

然而，尽管拒援战成效显著，攻城战却并不顺利。一个半月的战斗中，太平军始终未能实现攻破宝庆的目标。援军越聚越多，特别是李续宜率领的万余湖北援军的到达，不仅刺激了城外各军的士气，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兵力的对比，清军人数从劣势方变成和太平军旗鼓相当。从此，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逆转。

李续宜军到达后，与刘长佑刘岳昭等部清军会合于宝庆东北的半边街一带，以图挫败太平军包抄刘长佑后路的计划。石达开得知后决定主动出击，遂于深夜调动大军逼近清军半边街大营，拂晓时分发动进攻。双方激战至第三天仍然难分难解，这时，李续宜以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大营，自己率军渡过资水西移，在水师和骑兵队的配合下，突然向太平军最薄弱的北路阵地发动强攻。石达开闻报，急命赖裕新驰援，但为时已晚，太平军营垒数十座，哨卡百余处被清军摧毁。接着，清军又乘胜扫荡资水西路，太平军大败之余士气严重受挫，西路阵地随之陷落。清方奏报此战共歼敌一万人，考虑到虚报夸大的成份，太平军实际阵亡亦当在数千人，可谓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到7月29日为止，西北两路阵地落入敌手，宝庆合围已完全被突破，城内外文书饷道复通，这标志着宝庆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此战过后，太平军围困线仅存东南两段，对宝庆已难以构成威胁，而无论兵力、士气、粮饷、武器方面，较于清军皆处于劣势，会战败局已无可挽回。为求保存实力，石达开决定撤入广西休整，开始部署退军。

双方休战半个月后，太平军于8月13日再度分作十几路，猛攻李续宜大营。但此战目的显已经不在进攻，只是以进为退而已---14日深夜，太平军即分兵两路南撤，18日，全师转入广西。

#### (六)会战得失

石达开转战湖南五个月，军事上曾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前四个月中掌握了湖南战场的主动权，但在宝庆城下与清军相持二月不能得手，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被湘军挤出湖南战场，被迫放弃了以湘军老巢为据点，上窥西蜀，下逼武汉的宏大战略。导致这一失利的的原因，一直为论者们所关注。

笔者的意见是，截止到宝庆会战第一阶段为止，战局的发展是双方实力的客观反映，而会战第二阶段的失利则不得不归咎于指挥上的责任。

对于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兵力，一向以来多有夸大，如二十万，三十万之说，曾国藩也在两封信中采用“三十万”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太平军为虚张声势而故意夸大其词而已。按太平军为了张大声势在自报兵力时有“以一作四”的传统，因此“号称三十万”，实际人数通常约为四分之一，即七八万。曾国藩在《复官中堂》中说，“贼之自浙闽入楚者，不过六七万，益以赣，彬之众，贺县另股之斐，不过惟十余万”，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也说石达开离开江西时兵力是“六七万”，这应该还是比较贴近的估计。考虑到在进入湖南后，将领何名标率部从桂阳脱离，则石达开进攻宝庆的总兵力应该在七八万，与上述估计相符。至于“号称二十万”，则可能是剔除随军家属之后的兵力，即青壮战员约五六万人。

宝庆围城开始的时候，城内外清军总数约三万人，太平军在人数上是明显占优的，至6月下旬，清军总人数为五万人，已与太平军青壮战员的人数相当。但考虑太平军中的老幼妇孺必要时也会投入战斗，如祁阳战役中即有童子兵参战的记载，因此太平军在人数上仍然居于优势。而到了7月下旬，李续宜部赶到后，清军投入宝庆战场的人数已不下七万，双方在兵力上已经持平了。

以上是仅从人数上进行对比。如果考虑兵员素质，那么太平军的实力还要打很大折扣。曾国藩论石达开部“钝于浙”，“钝于永，祁，钝于宝庆”等语，被某些论者无限夸大施用性固然是错误的，但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太平军在衢州、永州、祁阳、宝庆的作战不利，显示

出这支部队兵员素质不佳，战斗力有限。抛开没有参加宝庆会战的石镇吉部在浙江取得的胜利不论，我们回顾太平军从回师南安开始到会师宝庆这数月之间的战斗历程，不难发现太平军之所以能够成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主要凭借的是战略战术上的技高一筹，而这应归功于将帅的素质。（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谭体元，李岚谷等虽不及林启容陈玉成吴如孝等知名，却也都是西征时期的宿将）在真刀真枪的正面作战中，太平军对一般兵勇还有优势，一旦和训练有素、具有多年战斗经验的湘军对敌，就往往处于下风了。

前文说到，太平军全军八万，约占三分之一是老幼妇孺，青壮战员只有五六万。曾国藩在分析其组成时曾指出，其中“裹挟者多，久战者少”，换言之，这五六万人中大多数是在浙闽、江西、湖南招募的新兵，真正的太平军旧部属于少数，充其量两三万人而已，这其中还有半数是属于“盟军”性质的原天地会部队--花旗军，则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不过一二万。因此，曾国藩说宝庆城下太平军的综合战斗力“不逮陈狗远甚”，即远不如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当属实情。（其实此时陈玉成部下有很大一部份正是当年跟随石达开西征的精锐之师，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即交由陈玉成节制，后来远征时并未带走，《李秀成自述》亦有提及）

固然，早在石达开出走安庆时，太平军中主动投奔到他麾下的队伍便已达“五，七万人”，后来江西又有一部份部队汇入，总人数不下十万。但投奔他或表示愿意听命于他的部队人数并不等于追随他远征的人数。如前面章节所述，石达开对部份军队或劝之返回，或留之于安庆，或命之援天京。“南安决策”后跟随石达开远离太平天国辖区的正规太平军旧部约为二万人（宝庆城下人员加上部份从湖南脱离大队的何名标部人员），而宝庆城下的太平军旧部加上花旗当为三万----这就是太平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人数。跟入湖南的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与从福建脱离的石镇吉部正规旧部总和亦不过三万人，可见所谓“石达开拉走太平军绝大多数精锐”的说法，可以再次被证明是荒谬的。

综上所述，太平军初到宝庆时的整体实力高于敌军，到了6月下旬时，精锐人数已经不如敌军，但依仗总人数优势，整体实力尚可持平。到了7月下旬，双方人数相当，太平军的整体实力就明显居于劣势了。

在整个太平天国战史中，攻城战是战术体现最不明显的一部份。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攻城方面都没多少特别手段。太平军以穴地攻城为主，云梯登城为辅，湘军更是动辄采用“长围”战术。太平军在湖南是客军，又缺少后方支援，不可能实施“长围”，因此，宝庆城下的“胜势”最终能否转化为攻城战的胜利，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以说是成败可能性各半，无论太平军利用实力上的暂时优势或战局中的主动地位攻克宝庆，或是因为不具备实力上的明显优势而攻不下宝庆，都属于正常结果。

至于7月下旬后战局的逆转，则是源由于战略战术上同时出现了失误。

战术方面，太平军在北路的布防较西南为疏，给后来的失利埋下隐患，而这一隐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宝庆北通长沙，进而东入湖北，湖北的部队南下赴援，不属意外。但太平军不仅北路阵地较为薄弱，而且对北路的敌情也疏于侦探，直到李续宜部逼近后才察觉。匆忙之中加强北路防守，已有缓不应急之势。此外，太平军放弃攻打祁阳虽是为了避免战事陷入更深僵局，不失为正确的应变，却也因此给宝庆战场埋下另一隐患----太平军缺少作为退守、进援的军事基地，只能背水一战。

战略方面，在李续宜援军抵达后，战局已经明显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之前攻克宝庆一度颇有希望，那么此时这一希望已经相当渺茫了。在实力对比已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即使不愿马上放弃攻城，也应立即着手布置退路，至少应该开辟一块后退基地，而非孤注



一掷，仍将八万大军全部屯集于城下之地，以至完全陷入敌军反包围之中。与李续宜部交战的失利，表面看是战术失误----只见眼前之敌，没有及时察觉敌军的战术变化。但石达开与所部将领都是久经战争，极富谋略和战争经验的宿将，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窃以为，实在是身处反包围中，处处陷于被动，出现失误是有一定必然性的。换言之，即使这一次太平军能够察敌军的行动，也难免不失察于下次，下下次。因此，这一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疏失，而是战略失误导致的被动。

如果太平军李续宜援军到达后能够果断放弃攻城，另谋他图，那么宝庆攻坚虽然失利，太平军却未必不能继续掌握湖南战局的主动权。跳出宝庆外围的包围圈，在湘鄂川黔战场还有很广阔的回旋空间。如果太平军在局势转为不利时及时调整战略，当不至于在人员和士气上都遭受重创，以致拱手让出战争的主动权。

以下数种针对宝庆战役的论调，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

1 认为石达开不该执著于宝庆攻坚，应该尽早间道入蜀----“宝庆会战”的战略目标本来就是要把刀尖插向湘军背后，取上游之势以经略两湖。进军四川充其量只是备选战略，这一点前文论述甚多，不再重复。

2 认为石达开将石镇吉和何名标派往远离主战场的广西地区，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从石镇吉和何名标此后的动向考察，他们明显是脱离石达开节制独自行动的，石镇吉被俘后的自述也证实他转战广西并非出自石达开的命令。

3 以曾国藩所言“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粮米掳尽，断无不去之理，可不须大胜仗也”为据，认为太平军孤军深入，补给不足，是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孤军深入，补给容易出现困难，曾国藩的话从理论上讲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宝庆战役却不尽然。湖南本是鱼米之乡，自1854年夏天以来，太平军兵锋已近5年未及该省，其生产状况无疑远远好于反复拉锯的安徽江西二省。而且湖南虽是湘军老家，却同样是农民起义和秘密会党的“沃土”，也因此太平军于1852，1854，1859，1861年四度入湘，每次都得以补充大量兵员。事实是，太平军转战湖南五个月，并无迹象显示发生过明显的后勤补给困难。当然，假如太平军没有遭遇宝庆城下的失利，不能排除其终因补给不足而撤军的可能性，绝不应以这种没能成为现实的“推测”作为评价战役得失的根据。

4 以曾国藩所言“褻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为据，认为太平军军心不稳，战斗力不强，是石达开的“分裂”错误所至----所谓“褻挟之人”，指的是新兵，与“久战者”相对，本来就是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加入的，则其“愿从者渐少”与石达开是否脱离天京政权有何关系？

前文已经论证过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成份，八万太平军中三分之一是家属，其余五六万战员中半数是过去一年中招募的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的新兵(包括广西和湖南的会党起义者)，剩下三万人中还有一半是天地会系统的“盟军”----“花旗”战斗力不弱，但成份复杂，组织性和立场性都不及其他太平军老部队，前期后期向来如此。因此，说太平军整体素质不高是事实(正规旧部仅一二万人)，说是“分裂”所至就毫无根据，甚至有颠倒黑白之嫌----如果石达开真把自己的精锐旧部都拉走，也就不至于出现宝庆城下太平军“不逮陈狗远甚”的情况了

更何况曾国藩所谓“褻胁之人愿从者渐少”完全不是事实，石达开回师广西后人数一度扩充至二三十万，1861年底再进湖南时二个多月即扩军二三十万人皆可为证。

5 认为石达开从宝庆撤围后退入广西而不肯折东返，是“坚持分裂错误”“死不回头”-- -- 我们姑且不讨论石达开“回头”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可行性(石达开在湖南孤军奋战这五个月来我们没有看到洪秀全方面给予任何配合，天京系统的将领们则正因为天王族弟无功受禄，二个月间从一介白丁火箭式上升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军政首脑而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只谈战术上可行性----要求石达开东返是否现实？

予读古龙小说，有一句话印象颇深，大意是说，只有杀人者才有权力选地方，被杀的人什么权力都没有。引申一下，笔者以为在一场重大战役之后，只有胜利者才掌握下一步行动的主动权，而失利者是被动的，原则上只能在胜利者规划好的范围内选择。如果不顾现实，强行选择，极可能在来不及完成调整时遭遇是又一次会战，而“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陈述的这一公理，当然也使用于宝庆会战后的太平军。

那么，石达开撤向广西，是敌人事先规划好的选择吗？----是的，而且是唯一选择。左宗堂对会战发展方向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逼窜南路，徐为图之”，也就是把石达开逼入广西。而胡林翼也一再叮咛李续宜：“杀尽此贼，势必不能……逼使南走，尚是善策”，“贼数过多，不能尽杀，惟有虚南路，以两粤为贼之去路。则天下之祸尚轻也”。可见整个湘系集团的认识是统一的，即以将石达开逼入广西为“善策”。因此，他们对咸丰要求派兵向广西方向追堵的旨意，总是百般推搪，虚与委蛇，名为追堵，实则只追不堵。

左宗堂胡林翼的这一战略思想，当即兵法中的“围师必阙，穷寇莫追。”在他们看来，虽然石达开在宝庆新逢大败，但短期内将其剿灭是不现实的。阻断退路，等于逼其在湖南与湘军决一死战，反而会使太平军低靡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而在置长江中下游战场于不顾，把数万湘军留在老家和石达开展开极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持久，无疑是湘系集团的将帅们最不愿见的事实。这样做，即使最终取胜，湘军也会从根本上伤到元气，一不留神，后果更不堪设想。

因此，湘系将帅们对咸丰的命令敷衍了事，甚至不惜谎报军情，真正目的就是“送贼入粤”，以便趁石达开在广西休整恢复的时机，腾出手来围剿安庆。本着这一方针，他们在东北和西路严密戒备，却让出南下之路----对于太平军而言，此实“终南捷径”。石达开对左宗堂胡林翼们的“好意”自然心领神会，却之不恭，受之无愧。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合演的一出好戏最后以左宗堂代骆秉章写给皇帝的一纸“官军虽兼程行走，终未能速到贼前，截其窜路。此则臣思虑所未到而深为惭愧者也”的“悔过书”拉下帷幕。

### (七) 战略意义

石达开脱离天京政权后的战斗是否属于主战场？传统论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而笔者以为，无论从吸引清军的数量、质量、清廷的重视程度，还是对全局的影响看，石达开部从1857年5月离京到1859年8月宝庆会战结束为止进行的战斗，均可视为主战场的战斗。回师广西以后，则逐渐退出主战场，而直到1860年秋计划入川未果，二十万部队反旆，才完全退出了主战场，下降为战略地位次于天京方面的第二战场。

宝庆会战中，湖南太平军直接和间接牵制湘军的兵力较之太平天国后期最大规模的战役-- -- 安庆争夺战亦无不及(安庆争夺战中湘军投入的兵力与宝庆会战相仿，但彼时湘军将帅关注的战略重点却分散于数处----骆秉章与部份湘军将帅在四川，左系湘军着意与江西太平军对峙)，而清方将帅将这场会战所置于的高于一切的战略地位，前文的引述和清方兵力调动事实皆足证明，不须赘言。在这样一个战场，能不算主战场？

宝庆会战虽功亏一篑，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但其对全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江西战场方面，杨辅清部攻克景德镇后，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他最担心的就是景德镇太平军的动向，因为这支军队随时威胁着湖口，万一湖口有失，九江城很可能重现回到太平军手中，势必彻底打乱进剿计划。因此，在石达开离开江西后，他“本拟调萧启江一军从浮梁”夹击景德镇，但是因为石达开的进军湖南造成“彬桂告陷”，他只得改变计划，调这支主力“回援湖南”，且命令江西其他湘军也“只得扼要严守，观势而动”，从而支持了江西战场太平军的战斗。

湖北战场方面，据胡林翼回忆说，“当湘事之告急也。。。不能不顾上游。林翼发兵后，仅领余兵二千人入黄州城守，盖兵将已全赴湘中。。。。。”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大的改观，直接导致了1861年陈玉成行“围魏救赵”策奔袭武汉时黄州与武昌兵力的异常空虚。

天京战场方面，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又与叛将李昭寿合陷浦口。李秀成独力难支，陈玉成应邀下援两浦地区。胜保指责驻扎安徽太湖的多隆阿、鲍超按兵不动，坐观陈玉成、李秀成合兵进攻江北、浦口，清帝转谕官文、胡林翼，命湘军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使陈玉成不能专心协同李秀成作战。官文、胡林翼奏复，“因石达开进入湖南，先后调去水师四营，陆师四营，马队二百，备多力分。设宝庆兵力不敷，则岳、鄂同时震动。”并称“胜保不知湖南近日情形，不知湖北南路空虚。因此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可见石达开在湖南发动的会战陈玉成下援两浦与李秀成联合行动扫除了后顾之忧。

安徽战场方面，宝庆会战前，曾国藩胡林翼正在黄州部署三路进剿安庆，却因会战之故调其中二路人马改援宝庆，另一路也停止深入安徽，作为回援湘鄂的预备队待命，最终这次精心策划且已开始进行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这在上章已有详述。“宝庆会战”迫使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进攻安徽的计划推迟了一年之久，直到1860年4月才得以重新部署对安庆的进攻。

关于宝庆会战对全局而言的战略意义，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总结道：

“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赵三军先生在《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危局辩》一文中指出：

“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退入广西，清帝令骆秉章派兵援应。骆秉章派刘长佑、萧启江等湘军头目率领一万多清军赶赴广西，“助剿”石达开。石达开又将湘军引入广西，继续配合着其他战场，但这种配合成为间接的，作用比以往要小了。石达开虽然离开宝庆，但将清帝注意力及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的影响还继续存在，被石达开打乱的清军的布署，不是一下子就能调整过来的。此前，清帝命曾国藩入川，由于没得到总督的位子，曾国藩迟迟不肯成行。直到9月清帝才答应曾国藩，如四川可保无虞，可改行图皖。于是曾国藩赶至武昌，与官文商议图皖事宜，11月商定四路入皖的计划。12月曾国藩统军到达安徽宿松驻扎。直到1860年4月曾国藩才指挥部队进逼至安庆。正当曾国藩从追击石达开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手来逼至安庆，还未将手攥成拳头打向天京战场时，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抢得石达开创造

的最后一个战机，发起天京解围战，横扫江南大营，一举摧毁敌营 50 余座，天京解围。接着李秀成乘势南下苏州，开辟苏抗根据地，使后期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最好状态。”

而王洪峻先生《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打击清军的战略弱点和重点，并与长江下游之太平军相呼应，对两湖之清军主力湘，楚军形成夹击之势，的确时非常高明的一着，效果也很明显。这是攻其比守以制敌的打法，彻底打乱了清军的部署。石达开部太平军的这一行动，也夺回了因为天京事变而被清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把清军抛到了被动的一面。”

“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清王朝把曾国藩部湘军，胡林翼部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湘军，纷纷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命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的湘军困守宝庆，胡林翼部的主力南下援湘，他们的方针是“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可见，他们的是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

“它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打乱了清军围剿天京的布置，使洪秀全得以整肃内部，编制军伍。。。。。。有力地支持了天京。”

宝庆会战，太平军固然损兵折将，清军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他们为了在宝庆外围形成对石达开部的反包围，大大打乱了原先湖北江西的兵力部署和围攻安庆的全盘计划。就宝庆战场而言，石达开是由主动方变为被动方，但就苏皖赣而言，太平军的压力却大大减轻了。宝庆战役结束后，湘军不得不重新着手进行全局部署，因此经过了半年调整的下游战场的太平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战局的主动权。

曾不止一位论者面对洪秀全的斑斑劣行承认，石达开的“错误不在于远征”，而“在于没有给予主战场有力配合”，或“意志消沉，未能有效打击清军”。笔者且籍“宝庆会战”一章收尾之机，对此提出郑重反对。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五) 回师广西

### (一)回师庆远

1859 年 8 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撤围，准备退入广西进行休整，再图后计。当时从石达开部下独立出的石镇吉正在桂林城下，因此石达开也率部前往桂林附近，他占领了兴安，灵川两县，屯兵严关，大溶江一带，北拒湖南追击之敌，西南两面则防止桂林之敌与外界清军的夹击，与石镇吉部形成互为声援的局面。而后，石达开从全州趋向西北，经义宁，龙胜听，永福，永宁，融县，直捣桂北军事重镇庆远。部将陶金汤率军攻打阳朔。石镇吉也很快撤离桂林，从永福，永安方向进入广西腹地。至此，三路人马全部顺利进入广西境内。

当时广西境内义军很多，清军力量相对较为薄弱，顾此失彼，正如清廷上谕所言，“粤西连年被贼，兵饷两绌。”而石达开在宝庆会战失利后深感部队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因此决定在广西一面整训部队，一面等待时机，再图入川。石达开原本可能想战局柳州为根据地，但太平军进入广西后柳州已被天地会义军占有，石达开不愿与友军相冲突，于是将临时根据地选在了庆远府----它与柳州相距很近，互为唇齿，柳州可为其军事屏障，自庆远向北可以进入贵州，向西可经百色至云南，向东可以出桂林入湖南，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冲，并且

对石达开而言，它还有一个特殊意义：无论经贵州，云南，还是湖南，都可以进入他的最终目的地----四川。因此，石达开选中庆远作为休整的根据地，可以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庆远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使它成为义军与清军争夺的重要目标。1857年9月，大成国起义军曾经占领这座重镇，1958年又被蒋益澧所率部湘军攻陷。石达开挥军庆远后，势如迅雷，附近清军纷纷溃败，太平军于1859年10月15日轻而易举地夺下这个桂北的重要立足点。接着，出兵廓清庆远外围，从庆远东北的罗城一直到柳城以西的落墨渡，筑连营二百里，“逐日操练士卒。”与此同时，又派军分别占领迁江，北泗，溯河，德胜，柳江，思恩等地，在各据点征集粮草，暂时保障了大军的粮草供给。

石达开回师广西之际，正是广西的抗清局势日益转向低潮之时。自1850年至1857年，广西原有清军多追击太平军北上，境内空虚，义军四起，反清局势一片兴旺。但自1858年以后，一方面清廷调湘军入粤进剿，形势出现恶化，部份首领发生动摇，出现投敌叛变。另一方面，“自一八四五年以后，广西便掀起了反清运动，天天破坏，大家都不注意生产，中间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城市既多破坏，农村则一片荒芜。”（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群众的厌战情绪日重，加之义军人员良莠不齐，一些部队纪律不严，更影响了民众对反清活动的支持。因此，到了1859年，“整个的革命局势，几乎要土崩瓦解”，而石达开的回桂，则无异于“给革命力量加了一副兴奋剂，打了一个强心针。”

石达开占领庆远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方面打击豪绅，安抚百姓，一方面将部份征集的粮食分发给贫困民众，同时，石达开远征军一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的传统。在远征军占领庆远府期间，石达开经常率部署视察民情，替百姓排忧解难，当地秩序安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直到百年后还有很多歌颂石达开爱民事迹的传说和民谣流传。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太平军人数就从十万人左右扩充到二十多万，当时整个广西反清形势处于低潮，民众厌战情绪弥漫，太平军反而得以迅速壮大，可见其深得民心。

然而，广西本来就比较贫瘠，要筹措二十多万军队的给养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随着广西境内义军四起，相应的地主团练也纷纷而起，广西境内可以说是团练遍布。这些团练虽对太平军构不成重大威胁，但他们的破坏和骚扰却严重影响太平军的获取给养，尤其是一些团练不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迁走百姓，烧毁粮食，企图以此使各义军队伍无法立足。而最为棘手的是，这些地主团练所把守得寨垒中，往往混有很多普通百姓，特别是老幼妇孺，因而使得太平军在剿平地主武装时，每每投鼠忌器，进退两难。

很多史家指石达开在广西时军队战力不济，攻打一些团练山寨还旷日持久，甚至久攻不下。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的原因绝非战斗力的问题----二十万大军，再怎么战斗力不济，也不会连几个地方团练都对付不了。“投鼠忌器”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在庆远附近的德胜，有牛岩山，独帽山，当时曾为团练据首。据当地地方志和官府所立墓碑碑文的记载，说太平军“围困一月”“连战三旬”“贼连营围之”“贼攻急”，并且说因为寨内人与太平军勾结破寨，团练被迫“率敢死先锋决围”，结果双方交兵，民众死伤惨重，两寨总共被杀戮一千二百余人。

但是，当地口碑流传却说，“太平军当时只是围困，没有攻打”，就是说，太平军只希望把敌人围得粮械俱缺，主动出降，以免杀戮。寨中有人与太平军讲和（被清军说成是“助逆”），就是因为弹尽粮绝，难以坚持的结果。“因为太平军困而不打，围而不密，所以围岩期间，不少人乘黑夜混出重围逃走了。破围之夜，也不是团练中的”敢死先锋决围”，而是一个妇女在静夜中随众人偷出营寨时，动作不慎，把铁锅盖跌落石上，发出响声，守在山下的太

平军才一涌而上，攻破营寨的。直至今日，德胜民间还广泛流传一句歇后语：“牛岩的铁锅盖----惹祸招灾。看来民间传说是可信的。”（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

另外，关于杀戮情况，地方志和县令发布的告示都说太平军杀戮盈千。但是告示所列的“遇害者家属”却只有四十九户，则被杀人数无论如何推算都应十分有限，可见是诬蔑之词。---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廷在各地散布谣言，竭力诋毁太平军。牛岩当地人原本是被太平军“攻打”和“杀戮”的对象，却流传下替太平军辩护澄清的口碑，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啊。

牛岩山的例子绝不是特例，太平军由于顾虑到团练营寨中的老弱妇孺，对这些团练的态度是“只要不捣乱，都不加攻击”，例如同样位于德胜的鸟山门，“和太平军驻地近在咫尺，寨中的地主团绅还经常造谣太平军杀人放火，吓唬群众，太平军对他们仍旧采取容忍，争取的态度。据传说，某夜，鸟门上寨发生火烛。太平军除高声报警，呼喊着从速救火外，同时声称“火是自燃，和天军无关啊！””（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上面提到的牛岩山团练，极为顽固地与太平军为敌，“时时截击，夺贼械，贼物无算，积次杀贼二，三百人。”尽管如此，太平军还是想招抚他们，但是“贼招慰之，辄不顾”，太平军忍无可忍，才对其发起攻击的。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待广西当地团练的一贯态度，也可见个别地方志和清方告示是怎样对太平军进行诬蔑的。这种忍让态度，可能导致在攻寨的战术上较为保守，意图上不够坚决，并代表太平军战斗力不济，而是石达开一贯爱民思想的体现。----因为太平军当时并无意久居广西，攻占一些山寨并无大的军事意义，所以尽量避免因为与团练武装发生冲突而殃及无辜百姓。这种思想，在石达开进入四川后所发布的一篇训谕中曾有十分清晰的阐述：“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知几者每先事而见己，必不到昧己以徇人。”

其实太平军真要与团练交战情形如何，可由广西融县的一块石碑的碑刻看出，碑文说，1859年太平军路经融县，曾攻打当地山寨，除天桥岩寨外，其他所有山岩都是“一日攻破，惧而办粮。”而这个山寨是因为地处偏僻，“避居此岩，免罹其祸。”文中记载了历次其他义军攻打山寨的经过，却完全没有提到太平军攻寨之事，可见这唯一“幸存”的山寨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打才“免罹其祸”的，而太平军所攻打的山寨，全部是“一日攻破”。

顺便提一句，据记载，在融县，地主为了筹措经费办团练，被迫低价出卖土地，而农民不怕义军，反而可以趁机买入土地。在当地，二三百文，甚至几十文铜钱，就可以买到年产稻谷千斤的田地，以致“贫富陡然易像”。自食其力者能够获取大量土地，可以说是广西境内各义军反清斗争的间接战果。

## （二）部队离散

1860年6月，石达开离开驻扎了8个月的庆远，南下忻城，宾州，武缘等地。

不久，远征军二十几万人马，在精忠大柱国朱衣点，军略彭大顺等六七十名将领的率领下，脱离石达开，东返天京。在他们后来上给洪秀全的奏章中，为其行为提出了四点理由。然而这四点理由却都经不起推敲。例如他们说自己参加远征是误信石达开奉天王密诏来广西招兵，实则石达开离京后在各地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远征缘由，这些将领都是在告示感召之下追随而来，事隔三年突然说以为石达开奉了天王密诏，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石达开退入广西是宝庆会战失利后的临时决定，如果宝庆会战胜利，石达开早已进入四川，根本不会去广西，又怎么可能在到广西两年之前就欺骗部下说要去广西招兵？又例如说石达开一回故乡便起

归林之年，如果这“故乡”指广西，但石达开返回广西后招兵买马，整饬军队，登山赋诗，豪情万丈，毫无欲图归林之迹象，如果“故乡”至老家贵县，则石达开返回贵县是在他们脱离一年以后，他们又如何预先得知石达开一回贵县必然有“归林之念”？至于说石达开压制意图回京将士，则他们所举的的两支“被压制”的“起义”队伍，在脱离石达开后都以自相残杀开始，以投敌叛变告终，根本不是什么回朝扶主的“忠义之师”，而是手足相残，投敌叛变的可耻叛徒。

六十七将领列举的“罪状”中，唯一有些依据的是说石达开更改天国官制礼文，但这些更改是早在江西之时便进行了的，六十七将领的奏章却硬说是在广西进行的，很明显是对历史进行了“乾坤大挪移”，把时间推迟了两年，否则无法解释为当时他们不立即返回近在咫尺的江南根据地，却跟着越走越远，直到两年后才突然对官制礼文的修改不满起来。其实，太平天国后期，自身也已基本放弃了原先军师卒两五的编制，如西北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部，其编制是队，有五大队五小队，以前后左右加数字排列，还有前队前、中队中等番号。既然连始终听命于天京的陈玉成尚对军制进行了如此重大的“擅改”，各方也无所异议，那么远征在外的石达开部出于实际需要，对军制进行极为有限的调整，又有何不可呢？实际上，六十七将领在返回天京后，也并没有像他们在《上天王奏》中说的那样打乱编制，重新整编，而是仍旧保留了独立编制。很多史学家都已经指出，六十七将领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怕洪秀全对于他们跟随石达开远征心怀不满，不得以提出一些含糊其辞的指责，只须澄清事实，不须深咎。

至于这些将领离开石达开的真正原因，并非如六十七将领所说，是忽然悔悟，想去勤王扶主，而是主要有三：

首先是因为粮草供给不足，及其克服困难信心不足或怀念富庶的江南根据地，想走回头路。如谢兴尧在《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中分析的：“翼王所带的部众，不过十数万人，但物资仍感缺乏。。。于是，多年相从的老干部，也不能不分散就食，结果是逃走的逃走，投降的投降。”《平桂纪略》中也说：“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朱衣点等人在广西融县曾强行向当地百姓征粮，将进贡与征粮扯在一起，这其实是违背太平军传统的----因为太平军传统的“进贡”只是要求当地人表示归顺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后来石达开部入川后，他部下几名中层军官发布的告示中都说得很清楚：“然我天朝兴师以来，念切民瘼，深悉民艰，断不籍此财贿以为富国之资”，而朱衣点等人多为太平军高级将领，却把“进贡”变成了针对平民的强行征粮，这也可从侧面看出谢先生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平桂纪略》的说法是实在的。

此外，石达开不肯自立旗帜，无法满足一些部下攀龙附凤的愿望，以及部下多为三江两湖人，离乡日久有思归之念，也都是重要因素。陶勇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杨辅清到张志公，大大小小的部将先后回朝可见一斑，这些人并非都是因为忠于天王而归的，他们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跟着一个自称天王臣下却又不受天王节制的翼王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又分析太平军将领在天京失陷后的动向受到的乡土观念影响，“籍贯是两广的来王陆顺德、祥王黄隆芸等当然也对重返两粤有兴趣，至于原本起家于两广、在南方余部中实力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花旗”即天地会旧部，则更是极力主张南下；但作为太平军黄旗部主力的汪海洋部，其本人为安徽全椒人，所部骨干胡瞎子等都是当初在全椒造反的同乡弟兄。。。。部下中两湖三江人占支配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收复三江、收复天京”比南下两粤更有吸引力，而且汪部曾从石达开远征两广后返回，同归的两广人多数中途降散，惟独这支三江人马“万里归朝”，作为久经战阵的汪海洋，不会不考虑到这些因素。事实上，从题壁看，他以收复三江为主题的动员，起到了振作士气的预期效果。”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上(文中的“花旗”和汪海洋部本来就是从翼王部下反旆的部队)

这支部队一路之上曲折甚多，途中一再发生内讧，有的自由行动，有的叛变投敌。剩下的二十万人，在童容海朱衣点的率领下，于1861年9月秋到达江西，归入李秀成麾下，达到了“万里扶主”的目的。

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先后有不少队伍脱离出去，石达开并没有阻拦过。正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所说，既然石达开“把自己看成是天京政权的一员”，那么“部将要求反旆，回到洪秀全麾下，亦当名正言顺。”来去自愿决无勉强，这是《五言告示》的精神，也是石达开对部下一直信守的承诺。“所谓“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应该是符合他的个性和为人原则的，即不忍取而代之，也不甘束手待毙，又要对部下和追随者负责”（--陶勇）。也正因为如此，那么多部将，那么多将领，离开石达开时从没有出现过想加害他的情况----而这些人在离开石达开以后，一旦发生分歧，立即就是自相残杀----正如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队伍的内讧解决方式。

除六十七将领外，其他脱离石达开的部队的情况如下：

1 石镇吉部。转战广西，曾与大成国起义军将领黄鼎凤的部下李锦贵合作，后于1860年3月攻打广西百色厅时，队伍发生内讧，石镇吉率千余兵欲前往庆远和石达开会合，遭土司截击被擒，后被凌迟处死。

很长一段时间里，石镇吉部队内讧及溃散的原因都是个谜，《百色厅志》“大举而出，尽焚贼垒。。。镇吉等丧胆狂奔”，“潘凤岗纪功碑”竟胡吹什么“二十万人，一朝力尽”，直到《石镇吉自述》发现后才揭开谜底----原来当时石镇吉接受了广西地方官岑氏父子的投降，但部将中竟有人据岑氏之妻为己有，石镇吉以军令斩杀之，军中却有一些两湖之人认为石镇吉袒护广西人，暗自结盟要杀石镇吉，石镇吉得知后连夜率千余亲兵逃出，而其部为清军所破。

石镇吉在石达开离京前籍籍无闻，相关记载中甚至连他的爵位和姓名都对不上。但在石达开离京后，却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出色将领，从浙江到福建再到广西，他能征善战，屡次建功。尽管后来与石达开分别行动(据《石镇吉自述》的说法，他是奉了洪秀全的诏旨)，但二人私人关系仍然很好，在作战中也仍然能相互配合。石镇吉部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无疑是个很大损失。

2 余忠扶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余忠扶企图压制被杀。但这些人杀死余忠扶后并没有东去天京，反而由余诚义，余明富率领折向西行。最终余诚义杀死余明富后降清。

3 张志公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却被张遂谋杀其统帅所压制。后来他们终于随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很快即独立出大队，上万人降清，8000人遣散，留精锐3000，立即掉转枪口截杀一同“起义”的同伴队伍，后又随湘军入浙江围剿。其部汪康海因拒降清，辗转与较早脱离的傅忠信，谭体元部会合。

4 何名标部。这支队伍在湖南时独立出去，后来进入广西，曾与石镇吉部联合，但很快又分开。最后全军覆没。

5 傅忠信，谭体元部，于石达开占领庆远三个月后脱离，后辗转经江西进入安徽，归入侍王李世贤麾下。



6 花旗军，原是广东天地会失败后的义军，1855年在江西投入石达开部下，因未接受正式改编，故称花旗军。该队于1860年1月脱离后进入广东，想另立旗帜。此后转战于广东，江西，湖南交界处转战，兵败后退入福建，又再退入江西，时值李秀成入赣图浙，遂归入忠王麾下。

除以上各部外，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值得一提----石达开部将陶金汤，是进入天京前就已参加起义的旧将。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认为他进攻阳朔是脱离石达开独立行动，唯一的依据是《永安州制》记载他自称“太平天国全军都督”，但该地方志中以讹传讹者甚多，何况该志说陶金汤是洪秀全取的进士，又说陶有部下“军师罗某”，这些显然都有与太平军体制不合之处。而且陶金汤部从1856年以后，1859年攻打阳朔之前，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他是石达开进广西前独立行动，不太可能没留下任何行动记录。因此至少到广西为止，陶金汤应仍隶属石达开部。他进攻阳朔后不久即与当地反清首领张高友合作，攻占了永安城。但张高友竟因贪图陶金汤军中财物而刺杀了陶金汤，还想逼其部将归顺。陶金汤的部下摆脱张高友后，在转战中被清军击溃，全军覆没。陶金汤进攻永安的行动是出于石达开授意还是独立行动，现已无法确知，但他曾被与石镇吉，赖裕新并称石达开麾下三大名将，他的被害和部署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也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 (三)出桂入川

石镇吉部败亡之后，他的部将曾广依率领部份人马，转战进入了贵州，咸丰十年的一道上谕中说：“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由泗城走西村，西隆一带，于四月间，乘夜偷渡红水江，窜拢贵州兴义府地界，复扑云南，广西府城。石逆尚踞庆远，逆党赖裕新复力扑南丹士州，欲由此分道入黔。经官军截杀，赖逆折回庆远，石遂率而南，欲绕道思恩出泗城，寻曾广依所窜原路，趋黔窃蜀。”这道上谕所说的，是当时清方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动向所作的估计：即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在曾广依的配合下进攻四川。

苏双碧先生《石达开评传》中对这种判断表示怀疑，理由是 1 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未必是受石达开的指派。2 石达开离开庆远后没有立即朝川黔方向靠近，而是一路南撤。因此他认为石达开当时并没有决心离开广西。

#### 本人的看法是

1 所谓“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是建立在苏先生“曾广依与石镇吉有矛盾，乃至内讧，被清军攻破”的猜测上的，而《石镇吉自述》说明，石镇吉逃出在先，大军被清军击溃在后，曾广依率领的是被打散后的部份军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和石镇吉有矛盾。另一方面，曾广依始终以石达开部下自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进军云贵川的时候，打的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旗号，这在脱离石达开行动的各部中是绝无仅有的----曾广依应该不是指望靠虚张声势获得什么好处，因为打翼王旗号只会把敌人的重兵引过来，使自己的行动阻力增加----后来石达开派出部队打他的旗号行动，目的都是为了吸引重兵，掩护主力。1861年石达开率部准备进入四川时，曾广依便命他的部将南下接应，后来石达开在贵州时，曾广依率全军汇入石达开本军。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曾广依一直是以翼王部将自居的。那么，他按照翼王的指示先行进入贵州，或是他因为知道翼王入川的打算，所以就近先行一步接应，又或是他行动在先，而石达开与之取得联系后决定由贵州入蜀，这都是合理的，也是可能性很大的。

2 石达开南撤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征集粮草，例如在途中命朱衣点率两万人征粮，以及后来命赖裕新到南宁采集粮草。这可以看作是进军四川的准备工作，不能作为判定石达开没有决心离开广西的依据。

3 当时无论贵州还是四川，防务都相当虚弱，就因为这样曾广依才能轻易进入贵州，甚至进入四川。这一点，清廷上下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了调谁主持四川防务的事大伤脑筋，且四处调兵遣将。那么，石达开也理应能看出这是一个进入四川的好机会。

4 当初石达开离开天京驻扎安庆时，清军对他的动向估计有五种，但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进军江西，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并非是清军能未卜先知，而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一定会有很多相关的准备工作，而敌军的暗探也多少会收集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既然清廷上下一致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入蜀，也很可能是探知了太平军的一些准备。

5 石达开虽然远征在外，但他一直都保持着和天京的联系，例如在他进军江西前曾上奏章向洪秀全汇报自己进军江西，以及之后进军浙江的军事计划。1859年春天洪仁（王干）受命主政后，石达开特意遣使团道贺，并郑重要求干王代转今后他上给天王的奏章。1860年6月，几个外国传教士在与干王会谈时，干王还提到石达开在给天王的奏章中谈到了一些他对“宗教问题”的不同看法（石达开在这之后一年内放弃了宗教迷信）。这些都说明，石达开在远征途中一直不断地在把自己的行动和计划甚至对某些问题的想法向天京方面汇报。由于奏章通过干王代转给天王，干王自然知道这些奏章的内容，而当时忠王李秀成正在苏州，他理应也会从干王处知道石达开最新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几位传教士从李秀成部将处听说的是“翼王在广西。。。。正准备攻打四川”。石达开当时在广西已经驻扎了快一年了，如果没有向天京方面报告近期内入川的计划，那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应该仍然认为他还将留在广西，而不是正准备攻打四川。

6 新发现的《三略汇编》本《石达开自述》中说，“（达开）闻李短辫在四川作乱，想到川省。”李短辫即李蓝起义军首领李永和。曾广依入贵州时正是李蓝义军日益壮大，横扫四川的时候，而此时四川清军兵力空虚，石达开趁此时机入川联合李蓝，共取四川，是合理的。很多史料显示，石达开与李蓝部的确一直保持联络，现存史料即可证明仅在曾广依部入黔前的1860年3月和其后不久的1860年9月，蓝大顺便曾两次派人与石达开联系，可见这期间两军的确联系密切，换言之，石达开很有可能正是在这段期间制定了又一次的入川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对清廷威胁无疑是很大的。《文宗实录》卷三百五十载：“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蓝（大顺）、李（永和）二逆四处纷窜，松潘番区、越西夷匪复行滋事，倘粤匪复行窜入，更难收入。”《张浏文上刘霞仙书》（注：刘仙霞即刘蓉）更坦言“（石达开）为我兵所拒，不过一江之险耳。其欲结连滇贼以渡者，夫人知之也。”“万一二寇结连，长江不足险矣”这两份史料的时间都是1862年石达开入川后，其时李蓝义军已基本被骆秉章镇压下去，余部已难有大的作为，清方尚且如此担心两军会合，可想而知，如果石达开在两年前李蓝义军军威正盛，骆秉章尚未及整顿川中防务时入川，会对四川造成多大威胁了，正所谓“万一二寇结连，长江不足险矣”。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双碧先生的疑惑是很容易解释的，而清廷上下的推测是非常合理的：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二十万大军脱离之事。石达开在南下征粮后就会取道云贵，进攻四川。

很遗憾的是这次机会再次错过了--这是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第二次错过进军四川的好机会。等一年后他重整旗鼓，再次准备入川时，清军已经做了整整一年的准备，他面对的不再是防务空虚的川省，而是严阵以待的精兵强将。

二十万大军脱离后，石达开的处境非常困难，当时跟随他的仅有一万多人马，太平军大將中只有赖裕新留在他身边。而广西境内的湘军，楚军，正在加强扫荡，各路义军节节败退----他们的目的是先扫清其他起义实力，再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军。而各地团练此时同样对太平军的生存形成威胁。

二十万人脱离后不久，石达开曾命赖裕新率军攻南宁，目的则主要是在南宁一带征粮。关于赖裕新所率人数，有说两万的，也有竟说是二十万的，实则当时石达开全军也不到两万人，这些记载对赖裕新所率人数显然有所夸大。赖裕新与敌相持一月后撤军，当地有地方志说，某次赖裕新兵营被清炮打中，竟误以为清军在进攻，于是溃败，说得神乎其神。而广西巡抚刘长佑在奏报中则是另一番说词，如何“激励兵勇，大集团练”，如何“内外夹攻，纵火焚寨”，又如何“歼贼匪千余名”，说得活灵活现。不过，《平桂纪略》中对赖裕新撤军的记载却是：“赖以野无所掠，解围去。”《平桂纪略》也是站在清廷立场叙事的，只是比清方将领的说词要客观一些。这段关于赖裕新撤军的记录，可说是明明白白戳穿了刘长佑有声有色地虚报战功的行为。（这不是唯一一次，下文再叙）。这不由让人想起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说，清军谎报战功，各省军报莫不如此。广西远在华南，清廷不易辨明虚实，更给谎报战功者以可乘之机。有此再次可见，只凭清将自己单方面的叙述推测战况是相当不可靠的。

在当时，石达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广西立足，暂时谈不上实现什么战略。石达开回师广西时，就与当地义军多有联系，这时，他更加强了与友军的合作。各义军大都十分景仰石达开，所以当石达开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时，都表现得比较友好。如宾州的谢必魁，宣化的李青靛，上林的李锦贵等率领的天地会义军，都在一段时期内与石达开相互合作。此外大成国的首领陈开，名将黄鼎凤也都对太平军非常友好，如后来石达开进入贵县时，原驻军贵县的黄鼎凤特地撤出其原先驻地，以对太平军表示礼让。

但是，由于天地会义军大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组织和信仰，也由于当时石达开仍然坚持太平天国要求所有部众都接受统一的组织和信仰的原则，太平军与这些义军只能暂时合作而难以长久。1861年6月，李锦贵病逝，其部众散亡。李青靛谢必魁先后降清，李青靛甚至企图诱擒赖裕新作为自己投降的献礼。在这种情形下，石达开的处境更加危险和困难，于是他率军撤出宾州，回到自己的故乡贵县。在贵县，他曾与当地龙山天地会义军首领李福猷配合作战，不久后李福猷率部加入太平军，从此成为石达开麾下仅次于赖裕新的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

1861年8月，湘军攻陷了大成国的国都秀京，首领陈开率部突围后准备前往贵县与石达开会合，途中被俘。他的余部中有三万人加入了太平军，其余则大都汇集至大成国将领黄鼎凤旗下。大成国的沦丧使太平军的处境更加孤立，如不迅速冲出广西，则很可能重蹈大成国覆辙。于是，石达开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新加入的3万人马的整编，于9月上旬率4万余人西出横州后兼程北上。在这前后，石达开远征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拜上帝教的宗教迷信。

在离开贵县前，石达开将他的部下，礼部大中丞周竹歧推荐给黄鼎凤当军师，想来因为黄鼎凤已成为当时广西义军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因此希望周竹歧能助黄鼎凤一臂之力，支撑住广西的反清大局。周竹歧深得黄鼎凤的信赖于倚重，他被黄鼎凤委任为“军师”，负责整顿军务，处理民政。黄鼎凤后来在他的辖区内颁行了《约法十二章》，使得连年征战的这些地区难得地出现了“境内约束严明，几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的祥和景象。1863年，又发布了北伐檄文，宣扬挥师长江，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根据口碑流传，无论是《约法十二章》和《北伐檄文》的颁布，还是出江与东南太平军呼应的军事计划，都是以军师周竹歧为主导的。而《约法》中所表现的政治经济政策及《檄文》所体现的思想，与太平天国天国相关政策的精神颇为一致。而以上种种，都是黄鼎凤自1852年举旗起义到1861年底的十年中所没有表现出

来的特征。由此可见，周竹歧的确对这支太平军离开后广西境内影响最大的义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随着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大渡河覆败，苏福省的失陷，西南和东南的抗清局势都出现了重大逆转，使得清军开始得以集中兵力肃清两广义军。尽管如此，这支义军还是一直坚持到了1864年4月，其时清军攻义军天平寨屡攻不克，后湘军主帅广西巡抚刘长佑扣押了黄鼎凤的母亲令其劝降，黄鼎凤终于走进清营，义军遂覆。

石达开离开横州后，取道昆仑关，一路沿桂黔边界的捷径北上，经思陇泽，上林，忻城，庆远，洛东，罗城至融县，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估计一是为了和清军抢时间，二是考虑到两省交界地带防务通常比较空虚。在融县，他们突破了湘军名将刘坤一的截击，10月中，经怀远的板纜小道直插湘桂边境的青林界，至此，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重阻拦，冲出桂北，进入湖南，直趋四川。

#### (四)：疑点探析

##### 第一个疑点：石达开与石镇吉的关系

在石达开初回广西，兵锋逼近桂林时，石镇吉也正在桂林城下，当时桂林之内清军并不多，石达开石镇吉如欲攻下省城桂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苏双碧先生在《石达开评传》中推测说，因为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石达开刻意避开石镇吉，才错失了攻克桂林的机会。他的依据是《临贵县志》中记载：“镇吉又与达开疏，达开欲杀之，惜其材武。镇吉亦阴知之，常为一军，不欲与达开合”，苏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说法虽未必完全如是，但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却是事实”，苏先生甚至还进而推测说“大约石镇吉等人对石达开重用张遂谋等人不满，而不愿意留在石达开军中受制于人。”

苏先生仅仅依据一条地方志的推测，就断定“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是事实”，已觉草率，而还能进而推论出是因为石达开重要张遂谋，就未免武断了。

且看当石镇吉因察觉部下兵变企图，率少数军队逃里后，是想往哪里去的呢？《石镇吉自述》中说“欲回广(西)庆(远)府，与翼王合兵。”说是合军，石镇吉这时候已毫无资本可言，当初是他背翼王而去，这时候才回来寻求庇护，若说二人不合，甚至闹到石镇吉认为石达开要杀他才独立出来，此时他居然还敢找上门去？

据石达开家乡贵县一带的口碑说，就在石达开还在围攻宝庆而石镇吉已进入广西之时，石镇吉曾经受石达开的委托，前往贵县寻访留在贵县的翼王亲族的下落，石镇吉派去的人显然十分进心，因此当地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如果说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以至大敌当前为了回避宁可错失战机，甚至如《临贵县志》所说的石镇吉察觉石达开有杀他之意才脱离，石达开还会委托石镇吉帮他私人的忙吗？

再看石达开是否有意避开石镇吉呢？《石镇吉自述》说：“翼王。。。前来广西随镇吉，随(遂)窜义宁地方。”讲得很清楚，石达开选择桂林附近作为回师的途径，正是因为石镇吉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利用一下客观形势，而是事先已经和石镇吉有所联络，石镇吉也知道翼王会率军到桂林附近。换言之，石达开不但不是刻意避开石镇吉，相反恰恰是在与石镇吉取得联络后才回师广西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石镇吉与石达开部客观上相互牵制清军，因而都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广西境内。

综上所述，认为石达开和石镇吉不合的推测是缺乏依据的，在石镇吉脱离之后，两人还能保持在私事上仍有所往来，在行军上也仍有配合，石镇吉失军后还想去投奔石达开，这一切都恰恰证明两人私人关系相当不错。至于石镇吉为什么会脱离石达开，他在自述中有段话说得很明白，“八年，镇吉封为提军务。。。六月，破浙江处州，仍回江西锦得镇度岁。。。后天王诏令镇吉统兵六万，前来广西招兵买马。”石镇吉并没有说他此前一年半中跟随石达开的行动是受天王的诏令，这里说的回江西度岁已是 1858 年冬天之事，正是在这之后，石镇吉部脱离石达开独自行动，在时间上，与自述中“天王诏令”的时间完全吻合。由此可见，石镇吉是接受了天王的“拉拢”(或云：争取)才脱离石达开部独立行动的，和杨辅清之脱离石达开如出一辙，而不是因为什么与石达开不合，更不是因为石达开想杀他。

至于两军为什么没有会合攻桂林，恐怕双方都没有对桂林抱必得之心。石达开的目的在四川，回广西是为了休整，如果攻占桂林，等于引清军前来纠缠，哪里还能休整。石镇吉既然是奉诏回广西招兵的，也没必要非攻下桂林不可。双方围困桂林主要只是取道回师广西而已。

## 第二个疑点 桂林城下战况

清将在一份战报中这样报告桂林城下的战况：“。。。督率在城文武，挑选精锐，或轻师出袭，或左右环攻，夜乘大风抛掷火箭，喷筒，延烧贼巢，水陆均设伏兵，以备夹击。又出示宣谕，悬重赏以购逆首。萧启江苏凤文等督军长驱直进，分途围杀，列营北门，逼近城屯之后。参将萧荣方等自柳州管带(火赤)勇来剿，在石门洞大破贼兵。九月初四，萧启江所部由南门，文昌门分投进剿，与蒋益澧等水陆兜击，擒杀无数，贼众遁回西路，初十日，全由南路溃散，城围已解。首逆石达开，拥众溷逃，釜底游魂，难稽显戮。”

真是绘声绘色，精彩万分，这一场“桂林解围战”，真是部署得力，上下用命，人人奋勇，个个立功啊！

然而，

《平桂纪略》的记载是：“石达开陷据义宁。记名按察使刘长佑营灵川以备之。贼知楚军踵至，悉遁走。九月初十，贼目陶金汤窜阳朔，石镇吉窜永福，石达开由永宁走融县，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临贵县志》的记载是，“(七月)二十九日，(石镇吉)由兴安犯省城。。。荣芳远在柳州阻于贼，益澧以八月二日至，省勇多疲病，人皆震恐。。。受火伤归营者，沿途号呼，伤心惨目。时方黎明，贼不知所为，疑不进，城之不破，亦天幸也。九月初二日，石镇吉解围走。。。石达开恐失镇吉，从之驻义宁。按察使刘长佑屯灵川以遏之。镇吉见楚军大集，又闻达开至，遂拔营窜永福，石达开亦由义宁窜融县。”

其实无论《平桂纪略》还是《临贵县志》，都是站在清廷立场所写，也都有故意夸大清军的胜利，贬低诬蔑太平军或故意混淆是非之处，例如《临贵县志》说石达开欲杀石镇吉，而石镇吉是因为害怕石达开才率军撤离等等。但地方志的记载通常比清将的奏章要更接近事实一些。这两份地方志都记载着，石达开和石镇吉是自动撤离，分兵进入广西境内的，清廷勒令阻止石达开进入广西的布署落了空，“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石镇吉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这次“解围战”，我们都知道，所谓自述，是石镇吉在广西被俘后受审的口供，如果真有如此一战，则主审者不太可能不问及，白白失去一次为自己表功的机会。只有根本没有这么一战，自述中全无涉及才合理。

地方志中说石达开石镇吉是惧怕湘军(即文中之“楚军”)才撤离,也不确。其实此前骆秉章早派萧启江,刘长佑的队伍赴援,但“于兴安,灵川一带为贼所阻,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入”(《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兴安,灵川两地都是石达开的部将在驻守,他们任务就是截断湘军的援军。正十他们使得驰援桂林的湘军多次冲锋都无法突破防线,怎能说石达开是因为惧怕湘军重兵来援才撤离的?显然是石达开主动撤军,准备进入广西腹地后,湘军才得以来到桂林城的。地方志的说法是因果倒置。而清方官员竟能捏造出如此一番活灵活现的战况,讲得若有其事,实在是撒谎邀功成习惯了。如果根据这样的“战报”说石达开曾大败于桂林城下,实谬矣!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其实是一次十分顺利地突破拦截,实现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

### 第三个疑点 融县浮石圩的战况

清咸丰 11 年 8 月,石达开率部北上时,在融县的浮石圩遇到湘军名将刘坤一所部以及当地团练的阻截。对于这次阻截,刘长佑在向皇帝奏报时说,这一战中击毙贼千人,石达开受伤落马,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被石达开亲兵击毙。(《浔州陈逆就石逆上窜堵截获胜折《清穆宗毅皇帝实录》)

但是这个奏报却十分令人怀疑。第一大疑点就是擒杀太平军的人数。清军奏报夸战果和太平军败绩是惯例,如石达开在宝庆时全军不过十万,而清军竟说有三十万人,广西巡抚刘长佑犹擅如此,赖裕新率部进攻南宁时,石达开全军才一万多人,照说赖裕新所率的分支部队应该不会超过半数,即数千人才对,刘长佑却说赖拥兵两万。如前文所举的赖裕新在南宁及石达开在桂林城下的例子,都是他无中生有地捏造战功,说杀死多少敌人。可以说此人一贯是数倍地夸大战功的,一仗没打,他都敢说“擒杀无数”。就算他说杀戮万人,实际也可能只有一两千。而这次他竟然说只杀死了千名贼兵,照此推算,太平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应该不会超过五百,甚至可能只有两三百,或者更少。

此战是两军亮明阵势正面交锋,死伤应该很大才对,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这不是很蹊跷吗?

通常如此多的人参战,却死伤如此之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战一方迅速溃败。照刘长佑的说法,清军是大胜,这就怪了,清军设防的目的是拦阻太平军出粤,如今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就败逃了,简直是被打得望风而逃,可怎么这石浮圩防线却被太平军通过了呢?不但通过,而且长驱直至广西边境,不到一个月就进了湖南,这怎么解释呢?

石达开身边应该是护卫环绕的,刘长佑奏章的重点显然不是说他受伤,而是“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这句话被后世很多史学家翻译成了“险些被擒”,这种翻译想必正是刘长佑奏章想要暗示的,即清军取得如此大胜,乃至差点把石达开生擒了。其实,太平军才死了几百人,清将居然可以差点生擒石达开?不是太平军全体将士都因为死了这几百人而吓得四散奔逃,就是这个都司实在不知死活---果然,他被石达开的亲兵“毙之”了。

石达开究竟有没有受伤,我们并不知道,刘长佑是不是因为没拦住太平军,反而损兵折将,于是像三河大战后清将捏造李续宾英勇战死那样,掩饰自己未能阻止太平军北上的无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姑且算石达开真的受伤了吧,但对于常年征战于炮火间的将领应当并不稀奇,并不能证明刘长佑打了大胜仗,更加不能推出“险些生擒石达开”的结论(这完全是后

世史学家的翻译)，因为受伤，可能是被火炮所伤，可能是为流矢所中，也可能有其、他原因，而“险些生擒”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击溃太平军。如此正面交锋，别说只死伤了几百人，就算伤亡几千人，也不见得就是败仗，更远远不足以“险些生擒”石达开。

其实，关于这一战，地方志也是有记载的

《平桂纪略》说“石达开窜庆远，楚军扼之于浮石，败窜怀远，入湖南境。”

《浔州府志》说，“九月，复窜怀远，楚军扼之，败入湖南境。”

地方志立场是都是偏袒清军的，如《永福县志》竟说石达开入桂经永福时“率众百万”，实则石达开当时总兵力不过十万。至于上面两份资料，从用词就可以看出其倾向：太平军只要没有驻扎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记载为“败窜”。如“败窜怀远”“败入湖南”，湘军扼守浮石是为了阻止太平军北上，阻止太平军出广西，而怀远在浮石以北。太平军如果是“败窜”，应该南窜，怎么“败窜”到浮石北面去了？如果是“败入”，应该“败”回广西，怎么“败”进湘军老家湖南去了？（而且没多久就“窜”进了四川。）假如这一战真的如刘长佑所说（或说：暗示）的，清军大胜，甚至险些生擒石达开，则很难想象这些地方志竟会如此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融县志》也完全没有记载楚军的这一辉煌战绩，它的记载是：“十一年。。。。。。复入县境，多所杀戮。据故老云：九年到此，奉令封刀，现奉令开刀也。”

所谓“九年到此，奉令封刀”，指的是1859年太平军第一次经过融县时，没有交战，而对百姓秋毫无犯，所谓“奉令封刀”，就是不准伤杀人。而现在“奉令开刀”，针对的也同样不是百姓（没有任何太平军在此次经过融县时杀戮平民的记录），而是扼守在这里的清军。所谓“杀戮甚多”，也就表明清军死伤很大。

地方志清一色的是夸大清军战绩，而绝无故意夸大伤亡的。由此可见，这一战太平军的死伤很小，而清军的死伤却“甚多”，而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突破的浮石防线。

清廷一直在严令将太平军阻击在广西境内，连曾国藩想调一支湘军回救被困告急的祈门大营都不准。而太平军从广西最南端的横州北上，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付出了死伤几百人的代价，就冲出了重围，从接近广西最南端的怀远边境进入了湖南。可以说，太平军的出桂入湘，和当年的由湘入桂一样，都是非常顺利而成功的军事行动。

## (五)全局意义

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不久，几名外国传教士在那里拜会了干王洪仁（王干）和忠王李秀成。以下是他们后来对此次苏州之行进行的部份追述：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北华捷报》第519期 1860/7/7

##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

报告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联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华北捷报》第 527 期，1860/9/1

这两份文献所阐述的事实，也正是《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中反复用事实强调着的，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湖南，石达开的作战始终属于太平天国全局战略的一部份。从江西到浙江再到福建，他的作战一直有力地支持着天京战场。南安决策之后，尽管夺取四川为根据地成为他石达开远征的主要目的，但在西南战场牵制清军，减小长江中下游战场的压力，同样是他“谋蜀”战略的一部份，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并且反复被事实证明是行得通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对天京战场起到的支持作用。

### (一)回师之初

1859 年 6 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 月，石达开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 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安徽，但却始终未能贯彻实现，清廷“并两楚之地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全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的全局决定了他不可能无视石达开所开辟的西南战场去全力进攻安徽。

石达开回师广西之初，原在东南战场的刘长佑，刘坤一即统率湘军由湖南跟随入粤。石达开取道桂林，令清廷深感威胁，“桂林一城，关系全省大局，设令贼踪阑入，剿办更难措手。”湘军的另一支劲旅萧启江部，则就在“四路图皖”计划制定后不久，被由湖南急调入广西，原因就是石达开部威胁到广西省城桂林的安危。直到石达开从桂林撤围，骆秉章才命萧启江补充兵力后前往安徽，但终于未赴安徽，而是率军入黔，川，加强四川防务去了。萧启江到四川后，水土不服，一病不起，就此死在四川。英王陈玉成回师皖西，与湘军楚勇大战于潜山，太湖之时，曾国藩请掉张运兰一军赴皖，但因张运兰一军当时正在湘粤边境作战，未能如愿。此外，骆秉章还应贵州巡抚所请，调湘军田兴恕一军前往湘西驻扎，“相机抵御”，后来田兴恕又率军至贵州，再入四川。另原广西巡抚曹树钟，回四川原籍守制，广西巡抚由刘长佑接任。曹守制期满后，本已奉调由川入湘再入湖北，但因石达开一军回桂后边境黔桂边界，曹中途又折反川黔边界，以防石达开由黔入川。。。。。

“石逆袭陷广西庆远时，逼近黔省都匀，欲图由黔入川。该省合江叙永泸州南川一带，均与黔省毗连，设其窜入，不唯川省完善地方，遭其蹂躏，即陕西湖北，亦将震动，于大局甚有关系。”石达开于 1859 年 8 月进逼桂林，10 月克庆远，而后一直活动在靠近贵州边界的桂西一带，清廷唯恐他假到贵州入川，所以才不断调兵遣将，这直接扰乱了清军在鄂皖一带，特别是在安徽的用兵计划。

### (二)二十万大军脱离之前

1860 年 5 月间，石镇吉部将曾广依率军转战入贵州。这支军队是否受石达开指派，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曾广依后来兵入贵州和四川，以及接应石达开入川的作为看，他的这一行



动至少是受到了石达开“谋蜀”战略的影响，而且他本人也一直以翼王部将自居。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在此其间大举部署四川防务，目标仍是防备石达开率大军进入四川。

以下是这年7月--8月间，清廷的几道上谕。

“川东一带，与黔省地方在毗连，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难图。前调萧启江一军赴川，本为防剿石逆而设。嗣萧启江抵川病故，曾谕令官文等于湖南湖北两省中，拣派得力大员前往管带。。。。左宗棠现在襄办曾国藩军务，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筹商，该员是否能独当一面，令其赴川督办军务。。。。川省防务毫无起色，滇匪既未能除，石逆又将窜扰，该省踞两湖上游，设或糜烂，楚省亦有西顾之忧。。。。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四川滇匪尚未剿除，所有该省兵勇，均赴天全，井岩两处剿办，未暇分顾川南边防，若令石逆乘闲阑入，必致滋蔓难图。著刘源灏，田兴恕酌量缓急，通盘筹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前因四川军务紧要，拟令左宗棠前往督办。。。。左宗棠既不能独当一面，即毋庸赴川，仍襄曾国藩军务。广西省现在防剿正当吃紧，刘长佑未便遽离该省。湖南地方尚称安静，著骆秉章即驰赴四川督办军务。该抚于湖南绅士素为熟悉，择其晓畅军务者，酌量带往，并添湖南练勇，以资剿办。湖北军营中曾经仗阵得力之员，籍隶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数员，交骆秉章差委。石达开窥伺川疆，滇匪尚未扑灭，其势岌岌可虞。东纯现署川督未谙军务，该抚即迅速启程，由便道入川，毋稍迟疑。萧启江所带之勇。。。。军归该抚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石逆遂率而南绕思恩出泗城，寻曾广依所窜原路，趋黔窥蜀。请飭四川，云贵各督府沿边夹击。。。。石逆诡譎异常，凡经过之处必分其党为数路。每路复分为数起，使官军不暇兼顾，得以肆行奔突，若非合力兜剿，不免有逼此窜彼之虞。著张亮基，刘源灏，田兴恕激励各军将窜入黔滇各股，会合粤省兵勇悉数歼除，勿留余孽。并著遴选劲旅，于沿边一带地方实力截击，毋令余匪窜入。四川西，秀，叙永一带，尤为黔，滇入蜀要隘，即著崇实严飭防剿各军，认识巡探。。。。毋使扰及完善之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另外，《平定粤匪纪略》记：“陈玉成于(咸丰十年)二月内陷德安，随州，……初，省城戒严，官大臣奏请飭调湖南骆巡抚入蜀之师，移缓就急，迅援湖北。”可见由于石达开对四川的威胁，使清廷不得不将原作镇压江南太平军之用的湘军骆秉章所部进援四川，为陈玉成部太平军造成一个在湖北活动的有利时机，但当陈玉成部威逼湖北省垣，因伤‘省城戒严’叶。不得不将进援四川的湘军之果后营再回师增援湖北，双方相互牵制，使湘军疲于奔命的效果，此为一实例。

例子不多举，石达开远征军的作战在全局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清廷的威胁如何，相信由这几道六百里加急的上谕不难看出。

### (三)二十万大军脱离之后

遗憾的是，由于二十几万大军和数十名将领的东归，石达开于宝庆会战后，第二次失去了入川良机。从1860年秋到1861年秋，石达开的部众仅余万余人，跟随的将领中当时只有赖裕新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名将，而广西境内从楚军到团练，可谓强敌环绕。只看曾拥有几十万军

队的大成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即告覆灭就不难知悉。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已“自顾不暇”的情势下，这支军队仍然使清廷深感威胁，仍然有力地牵制了清军，支持了东南战场的作战。

1861年1月，有一道上谕是这样说的：

“前据曾国藩请调粤军助剿，当以该大臣北援之举业已停止，无虑兵但，已已谕令毋议。兹据刘长佑奏，蒋益澧一军，仍请留粤等语。自系曾国藩尚未知照该抚。现在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所有蒋益澧一军着即留粤剿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里所说的是大约在1860年秋冬曾国藩上的一道请求调湘军蒋益澧一军离开广西，前往东南战场的奏章。由这道上谕可知，曾国藩非常着急调蒋军回师，他甚至不惜扣压皇帝命蒋军留驻广西的旨意，想等蒋军离月后给他来的既成事实，以致刘长佑等不到上谕，以为皇帝不准，又再次上书陈奏。

到底曾国藩为什么这么急着掉蒋军回师，甚至不惜截留皇帝的旨意呢？

看看同一时期东南战场的局面，答案既可知其答案。

1860年9月下旬，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救援安庆，即按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方针，进军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具体部署是分兵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

1860年9月底，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进入皖北活动。

1860年10月，李世贤攻占皖南徽州，切断驻扎祁门的曾国藩部与浙江之联系

1860年12月，太平军开始了在皖南发动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攻势---祁门之战。后李世贤部又先后进占了东流，建德，使祁门与安庆湘军气脉不通，次年3月，左宗棠离开景德，至波阳疏通粮道。4月太平军攻占景德，中旬，左宗棠两攻徽州不下，使皖南湘军一度断炊之虞。

由此可见，从1860年9月底开始，太平军“安庆保卫战”逐渐进入最激烈的高潮。曾国藩于此时急掉蒋益澧回师，其直接目的可能在于援救祁门老营，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围攻安庆计划的顺利实施。表面看，曾国藩的确很镇定，写了遗嘱，不肯从安庆调兵回救，不过，这种镇定的前提是祁门大营的还没有到岌岌可危的地步。真到了朝不保暮的时候，他还能如此镇定吗？只要我们回忆一下1956年石达开兵逼南昌时，他是如何“呼救无从”“梦魂屡惊”，飞调各路回援，不但令九江之围不战而解，武昌之围顿缓，甚至还因此导致湘军名将罗泽南丢了性命的，就不难推知了。他不惜截留皇帝的旨意，千里迢迢急调蒋益澧回师，证明在他眼里这支军队对祁门和整个安庆战局而言极为重要。然而朝廷终于不准，理由是“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所以五百里加急谕令“蒋益澧一军着即留粤剿办。”当然，太平军最终还是未能在祁门对曾国藩形成毁灭性打击，也未能利用敌人兵力的空虚攻下武昌，而蒋益澧一军也并没有和石达开正面交战，但这些都不能遮掩石达开一军对清军所起的牵制作用和对安庆保卫战的有力支持。清廷留蒋益澧在广

西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石达开，这不但可以从相关上谕中看出，也可从石达开入川后不久该军即被调往浙江看出。1862年，蒋益澧任浙江布政使，1863年，陷汤溪，富阳，1864年陷杭州。这些都可从侧面正面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对东南战场的支持作用。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石达开远征军对东南战场的直接支持作用，即兵力上的牵制外，石达开的回师广西还对天京方面起到了许多间接的支持作用。首先，他的回桂从精神上有力地支持了广西和云贵众多反清义军的战斗，他离开广西前将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转荐给黄鼎凤当军师，对于黄鼎凤部后来三年中的坚持作战起到了很大作用，该部甚至曾计划出江与东南太平军配合作战。正如谢兴尧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广西的抗清活动》一书所说，广西的反清“在精神上是以翼王为中心，形成反清革命军的主流，至1861年翼王离开后，广西大的反清力量，因首领们相互猜忌，残杀，失去人民的同情，逐渐被清军收买，消灭。。。。。。广西的反清火焰，一直到1870年还没有熄灭，又延长了十年，实有绝大关系。”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其次，石达开远征时带走的太平军旧部不过两三万人，而先后脱离石达开，最后归入江南太平军的兵力，加起来恐怕不下25万人，已经十倍于他所带走的兵力，而跟随他的战将，多数也已返回东南战场，在客观上，简直就是石达开领着这些将领去招了一圈兵带回来，就算他真欠天京方面点什么，到这时候也已经十倍偿清了。这支军队中至少有一万多人是太平军百战精锐，另有一两万是跟随石达开转战多年，当初曾在江西多次把湘军打得大败的“花旗军”，还有两三万人是参加过石达开在入赣入浙战役的部队，此外另二十万人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在广西接受了近一年的系统训练，也并非乌合之众。这些部队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李秀成部的声势，也加强了该部的实力，这可以从1861年秋以后一段时间里李秀成部的作战情况中窥出端倪。总之，就算不考虑西南战场对东南战局的支持作用，到这时还把“削弱长江中下游革命力量”的罪名加在石达开头上，也未免太过。

石达开回师广西两年期间，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然而远征军的存在本身的威胁和他意图谋蜀的军事意图，却令清廷始终不敢稍怠。在他回师广西期间，太平军先后取得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及在苏浙皖南的许多胜利，这些依靠的当然江南太平军统帅的出色谋略和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但则石达开远征军将大量清军牵制于川黔桂一带，极大地削弱了清军在东南战场的兵力，无疑也是对胜利的一种重要支持。陈玉成攻克黄州，进逼武昌时，湖北省兵力异常空虚，这更不能说与清廷为防石达开入川而进行的“于湖南湖北两省中，拣派得力大员前往管带”“湖北军营中曾经仗阵得力之员，籍隶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数员，交骆秉章差委”的部署无关。（不知道天京当局在做出“围魏救赵”决策时是否也把这一点考虑了进去？因为从两湖调兵入川，造成湖北空虚，如果陈玉成能够攻取武汉的话，反过来也将减轻两湖清军对石达开入川造成的阻力，可惜这种相互配合的局面最终未能形成）。左宗棠最后没有被调到四川去，是因为朝廷认为他不足以独当一面，言外之意要选更得力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派去四川。至于石达开的入川是否如某些史学家所说的是“根本行不通的”，或“对长江中下游战场毫无意义”，我想清廷几道六百里加急的谕旨中已经把石达开图蜀成功的可能性和一旦成功后对全局的影响说得十分清楚，此不赘述。即使到了二十万大军东归，石达开身边仅剩一万多人马的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石达开一军在西南的存在，也仍然对东南战场起着有力的支持----假如这一万多人不是在西南，而是摆在东南战场，作用恐怕极为有限，正因为它是在西南，才能如此令人不可忽视。

上文着重分析的是石达开一军对东南战场的支持作用，因为这是容易被忽略的。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单方面的----正因为有太平军在东南战场的英勇作战，石达开才可能在广西暂时避开清军锋芒，进行休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需多花笔墨。且看前文所述，石达开回桂之初，清军几路人马调来调去，何止手忙脚乱，简直疲于奔命，正显示了东南与西南战场在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援，相互牵制敌军，乃至令清军首尾不能相顾。而这，不也正显示出石达开谋蜀战略的高明之处吗？种种事实都表明，天京战场与远征军的作战，表面各自为战，实则密

切相关，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它们是一体----这一点，从文章开篇处所引述的传教士访问苏州的所见所闻也可看出。

综上所述，石达开回师广西期间，一如在湖南般，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长江中下游的作战，使清军方面一再出现兵源和将领方面的捉襟见肘，和调度上的首尾不能兼顾。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石达开“谋蜀”决策的战略眼光和开辟西南战场的重要战略意义。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六) 长驱入川

说明：史式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太平天国史专家，在对石达开远征军作战，尤其是进入四川以后的的作战方面的研究很有心得，曾经多次走访古战场，二进大凉山，三访大渡河，四到涪陵，以考查石达开远征军的行军，作战，查阅地方史料，收集口碑传说。从本节开始，笔者将以史式先生所著的《太平军在四川》为叙述主线，再辅以相关史料和考证作为补充说明。凡引文均加特别注明，引文中间以()加“引者注”的为笔者的补充。

### (一)北上入川（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翼王坪录入）

太平天国前期，太平军主要活动地区是长江中下游。清王朝为了镇压革命，把号称天府之国的富庶的四川定为协济省，尽量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接济战区各省。太平天国后期，由翼王石达开所率领的一支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终于远征到了四川。当时，太平军万里长征，志在必得；清王朝为了保住这块最重要的后勤基地，势在必守。于是双方就在四川境内沿江各地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从1861年秋天到1863年夏天，先后进入四川省境活动的各支太平军，全都是石达开的部下。1859年底，特驻军广西庆远时，遇到天灾，军粮供应不上，部队分散就食，造成离散现象。其中有一支队伍有宰制曾广依率领，进入贵州省境活动。当时贵州的清军兵力空虚，他们得以顺利进军，在一年多时间里，从贵州南部一直发展到西北部。1861年8月，曾广依命令他的部下傅丞相与李检点率领一支队伍由贵州进入四川綦江县。这就是最先进入四川的一支太平军。在刚进入四川省境之时，这支队伍不过数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攻克黔江之后，已经发展到三万余人。

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翼王石达开已经率领本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准备奇袭四川，军行急如风雨。傅丞相与李检点决定前往迎接，就于1861年10月16日下令全军撤离黔江，分兵两路，进入湖北省境，连克咸丰，来凤等县，一面进行休整，一面等到石达开的大军到来。

这个消息是不错的。翼王石达开亲率本军四万余人离开广西进入湖南之后，就严格执行军令，计时赶路，风雨无阻；遇到清军，尽量回避，绝不恋战；遇到险地，抛弃辎重，轻装前行。队伍首尾相距数十里，但是全军上下一心，都想早日打到天府之国的四川去。经过两个多月的急行军，他们于1862年1月下旬感到湖南省西北边境的龙山，随即渡过湘鄂边界的北河，在前来迎接的兄弟队伍热烈欢迎之下，进驻湖北来凤县城。

1862年1月31日，两支兄弟队伍在来凤城内大摆筵席，欢庆会师。附近虽有清军驻防，但都畏惧太平军势大，不敢正眼相看。太平军就在这里高高兴兴渡过天历新年。两支队伍中的

老兄弟久别重逢，畅叙离情。新兄弟则是在湖南各地，或是在贵州，四川各地参加的，互不相识，这时也通过介绍，成为亲如手足的一家人。石达开本军离开广西时有四万余人，沿途招收了不少新兄弟，这时总数也已有六七万人。前来迎接的兄弟队伍也有三万多人。为了以后进入四川时每一支队伍里都有熟悉四川情况的兄弟作为向导，两支大军在来凤休整的时候全部改编，混合编组，全军人数超过十万。

在来凤休整了一个月之后，全军欢欣鼓舞地向四川进军。沿途经过咸丰，宣恩，绕出黑洞卡，避开敌人的堵截，直趋利川。利川是鄂西进入四川的门户，石达开命令全军以急行军的速度，由小道直趋四川。于1862年2月17日胜利进入四川省境。石达开扬鞭跃马登上了两省分界的水岭，富饶的四川已在眼前。这时既已进入了四川的大门，可以不必再偃旗息鼓，而是大张旗鼓地向着川边的第一座城---石(石主)厅前进。

就在十万太平军豪情满怀地进入四川之时，四川的局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简言之，这种变化对他们是不利的。两年前，四川的地方官都是些无能之辈，而且兵力空虚，不堪一击。1859年冬，李永和蓝朝鼎所率领的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一呼百应，所向披靡。起义军的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大到二三十万人，成都岌岌可危。太平军如果这时入川，不难席卷全省。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个好机会。1861年曾广依的部下首先入川，清廷误以为石达开本军到来，大为震动，急调老奸巨滑的骆秉章入川布防，不久就提升他为四川总督。骆秉章得到清廷倚重，极为卖力，他先镇压李蓝起义，使出反革命的两手，又剿又抚，各个击破，不久就击败了起义军的主力，腾出手来沿着长江北岸布防，以等待太平军。因此，当十万太平军进入四川之时，等待他们的已不是遍地的起义烽火，而是严阵以待的敌人。

## (二) 围攻涪州 (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一书, 翼王坪录入)

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进入四川境内，即分兵三路前进。由人台左宰辅李福猷领前军，经蚕溪、大中坝等地径攻石(石主)厅。石达开自领中军继进。又天台左宰辅赖裕新领后军，经悦来场、鱼池坝等地直抵长江南岸，然后沿江而上，打听渡口情况，相机渡江。如果得不到渡江的机会，就前往涪州(今涪陵)会师，共同围攻涪州。(引者注：胡林翼曾分析万一太平军占领涪州后的军事形势指出，万一太平军“入涪州，则大江之险必失。大江之险失，则湖北必无安枕之日。此异常之大变。贼计果逞，必于近一二年内闭关不出，自谋巢穴。一年之后，乃图四口。十年、二十年之内，鄂不得安，而关中亦必危矣。古今谋吴楚必争上游，盖取高屋建瓴之势也。千里金陵，一日可至。王睿、杨素之造州于蜀也。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以出口关。贼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在此为大。湖南之辰永等府，不能阻遏于前，而从后尾追，是送贼于蜀也。”)

李福猷军锋甚锐，2月19日在中坝全歼敌方团练三百余人，次日乘胜攻克石(石主)厅城，驻军四日，城乡贫苦人民参军者数千人。24日，他们放弃石(石主)，向涪州前进。赖裕新率领后军进至丰都的高家镇，击溃当地的团练，屯营于高家镇、王家渡一带，准备抢渡长江。因为骆秉章早已下令把江中的船只全部集中北岸，所以无法抢渡，只好到涪州来会师。

涪州地处长江南岸，乌江于城东汇入长江，枕江依山，形势险要，下通云阳和夔州，上通重庆，是川东重镇。在石达开部队到达以前，敌人已经加固城墙，并封索了长江，将所有船只收泊于城下。

1862年3月下旬，太平军在涪州附近会师，沿乌江东岸连营二百余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竖太平天国大黄旗于插旗山，涪州城中抬头可见。全军人数十余万，号称二十万，声势

之大，军容之盛，是涪州城里敌人生平所仅见。涪州知州姚宝铭写血书向成都告急，全川震动。当时李蓝起义军余部周绍涌等人在川东大竹、垫江一带活动。他们听到太平军大举入川的消息，欢欣鼓舞，要想前来会师，就一直打到涪州对江的鹤游坪，与太平军营地相距不过百里，隔江相望。可惜清军严密封锁长江，双方始终未能会师。（引者注：清方自己也承认，“万一二寇结连，长江不足险矣”）

骆秉章收到涪州的告急文书，急派道员章源率湘军军千余人，水师炮船数十艘，赶来布防。另调皋司刘岳昭之湘军，副将唐友耕，已革知府唐炯之川军增援，并从贵州增调清兵入川作战。这时太平军已在眼前，清军援兵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远水不救近火，姚宝铭急得手足无措。恰巧当时清军参将徐邦道回籍探亲，姚宝铭就央求他出来主持防务。徐邦道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财产，愿意效力。为了便于守城，他不顾城外居民的死活，下令放火，把城外的民房一起烧光，用这些民房的砖石修墙筑垒，负隅顽抗。

石达开挑选识水性的战士，采用奇袭的方式，于4月1日夜半，在涪州上游朱家嘴一带突破乌江，随即在江上扎起浮桥，大队人马陆续过江，清军兵勇闻风溃逃，沿乌江西岸二百余里的防线顷刻瓦解。（引者注：《涪州志》记载石达开部渡乌江，“三月初三夜将半，忽闻山顶大呼云：贼从上游彭水界渡江矣！守者惊扰，纷纷奔溃，二百余里江防，顷刻瓦解”，而剩余之部，只知“以其兵船泊于水域之内，毫无纪律，居民出避他处者，必要截其财物、妇女”）

次日，太平军占领涪州城南的高山，遍地扎营。（引者注：据记载，太平军“以南门外黄泥坡为中心，东折，过石嘴，仰天窝、下火炮铺、半边街、盐店嘴抵涪陵江；西折，经二郎街、演武厅、远北至龙王嘴，抵蜀江，贼所踞黄泥坡、仰天窝，皆高瞰涪城，相距不过数十丈，时以铳轰击城中。”）

4月5日，石达开把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亲临城下，指挥攻城。这时清军焚烧城外民房的大火还未熄灭，居民呼天抢地，惨不忍睹。石达开对此十分痛恨，立刻写了训谕射入城中，痛斥地方官的残暴，号召涪州城内四民起来反抗清朝官兵，投向太平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四民谕》训谕中说：“无心失火，为官者尚奔救恐迟；有意延烧，抚民者何凶残至此！伤心惨目，我见犹怜；饮泣吞声，人孰无恨！”“尔四民等痛无家之可归，愧有仇而不报，诚能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当妥为安抚，不致一枝无栖。”这份告示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不少无家可归的人投入了革命队伍。

4月5日石达开亲临前敌，指挥攻城，当天即获大胜，涪州城外敌垒被一举扫平，负责涪州防务的清军参将徐邦道几乎被活捉。但从第二天起，连日大雨，不能进兵。太平军就潜挖地道，准备用火药炸城。他们在黄泥坡大营附近的草屋中大打锣鼓，通宵达旦，以掩盖挖掘地道的响声。城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演戏，只有狡猾的徐邦道识破了他们的计策，在城内挖壕灌水加以阻拦，以致潜挖地道一直未能成功。

四天以后，雨住天晴，由唐友耕、唐炯所率领的敌人援兵已经到达。唐友耕原是李蓝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叛投清军之后，残杀旧日的兄弟极为卖力，所以不断升官。这时来到涪州，一心想立功。唐炯原是知府，在与李蓝起义军作战时，因战败而革职。这时自告奋勇来援涪州，是想立功恢复原官。他们于4月10日到达涪州，12日就商量出城反攻太平军的策略。当时太平军在城外的主要阵地共有三处，即黄泥坡、龙王咀与仰天窝。唐友耕、唐炯与徐邦道用拈阄的办法决定各攻一处。结果唐友耕拈得龙王咀，唐炯拈得黄泥坡，徐邦道拈得仰天窝。（引者注：湘军果后军刘岳昭的五营人马，较两唐晚一天，且是驻军于江对岸之北山坪。

唐炯对于湘军奉命远道赴援却不与石达开交战十分不满，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楚军(即湘军)畏之(指石达开)如虎。自(石达开)窜蜀来，无敢撻其锋者。而刘某(岳昭)庸劣，贼在南岸。辄引军向北岸行，或偶到南岸，闻贼至急逐去。”当两唐匆匆赶到涪州后，迫于军令，不得不向太平军发动攻击。但他们和徐邦道谁都不敢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因此只得最后采取拈阄之法来决定，可谓千古奇谈。由此可见，对于石达开，当时并非单单是湘军刘岳昭一人“畏之如虎”，两唐、一徐也彼此彼此。)

4月12日黎明，涪州清军分为三路出击。黄泥坡地势甚高，唐炯驱兵仰攻，伤亡颇多，屡攻不动。他突然发现坡下一些草屋已经无人驻守，前几天在这里敲锣打鼓的太平军都已回到大营中去，就想出一条毒计，派人蛇行而上，纵火焚烧草屋。久雨草湿，草屋被焚后烟焰蔽天，加上当时正刮东北风，浓烟都吹到太平军阵地上，大家睁不开眼，清军就乘机爬上山坡，攻入大营。由于这里地势险要，守军大都是新兄弟，久经战阵的老兄弟不多，清军攻入，军心已乱，唐友耕乘势猛攻，就夺取了太平军好几处阵地。在这一次战役中，凶残好杀的唐友耕大砍大杀太平军，自身也多处受伤，回城之时，浑身血污，几乎成了一个血人。

石达开这次围攻涪州，并非为了争城夺地，是想占领此城作为基地，大举渡江。这时见到敌人死守城池，急切难以攻下；长江中又有敌人的炮船来往巡逻，暂时无法渡江。如果贪攻这个弹丸之地，反而耽搁了另觅渡口抢渡长江的时间，于是下令撤围，全军西进。

太平军进入巴县县境时，因为清军都已撤走，去防守长江北岸，所以并未发生战事。老百姓知道太平军军纪良好，并不逃跑。队伍进入巴县一品场时，老百姓赶场做生意的照样做生意，演戏的照样演戏，真是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太平军将士们看了都很高兴。一品场从此改称为仁义场。这件事情一直流传至今。

太平军既入巴县县境，与重庆隔江相望，本有进取重庆的想法。但是派人侦察之后，知道湘军刘岳昭部已到重庆，长江中的船只已停靠北岸，之后放弃这个想法，西去江津。石达开自入四川围攻涪州不克之后，就一直沿着长江南岸向上游进军，随时准备寻觅适当的渡口，抢渡长江。清军则沿长江北岸向上游移动，时时进行堵截。双方好像是在隔着长江竞走。石达开行军一向急如风雨，如果是在陆上行军，清军绝不是他的对手。可惜当时长江中的船只都在清军的控制之下，太平军在陆上行军，清军却能乘船来往，因此太平军行军的速度就常常落在敌人的后面。四川的清军能够阻拦太平军渡江，全靠长江天险。石达开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总想出奇制胜，能够绕到敌人的前面去抢渡擦和长江。石达开从进入四川开始，一直到大渡河覆军为止，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渡江，而清军一切的活动，都是为了防江。可以说两军在四川境内的激烈斗争，就是抢渡和反抢渡的斗争。

### (三) 太平军自涪州撤军原因考

(节选自史式《石达开自涪州，綦江撤军原因考》，翼王坪录入)

4月12日，两军在城南，城西各地激战一天。清军付出伤亡千余人的代价，攻下了黄泥坡阵地后，发现太平军已开始后撤，不久，涪州解围。解围后，姚宝铭，唐炯，唐友耕，徐邦道等人皆升官受赏，骆秉章在奏章中说：“是役共计杀死稍毙并生擒之贼八九千名，夺获牛马器械旗帜无算，城围立解。”好象太平军是被他们击退的。事实上，地方志上已有记载，是役也，太平军因占地利，伤亡较清军为少。(引者注：据《续修涪州志》记载，“贼凭高而我仰攻是以难也。”)当时围城太平军在十万以上，清方包括城内兵勇，民团以及长江上的水师，一共也不及万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4月12日一次战斗，伤亡不过千人，不论胜负，

都不影响大局，而且据《南川县志》记载，在涪州城外那次战斗之前，石达开本人早已离开。太平军的撤军并非旗靡辙乱，而是有计划的甩掉追兵，整师而退。石达开从涪州城下撤军的原因是什么？一直是一个谜。

1987年，编者为了筹备召开“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机会寻访当时的古战场及查阅有关史料，逐渐找出了石达开自涪州撤军的真正原因，现提供给同志们作为参考。

这首先要从石达开进军四川的战略说起，石达开是太平军中的名将，1853年春自武昌东攻南京，28天行军600里，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举攻下六朝古都南京的光辉战绩，胜利的取得，当时除了大气候对他有利之外，还离不开以下两个条件：

- 一 是水师在自己手中，渡江容易。
- 二 是顺流而下，大军可以上岸步行，也可以乘船休息，能够以逸待劳。

与上述情况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石达开进军四川的困难。石达开进军四川时，已是太平天国走下坡路的时候，他自己又是孤军深入，独立无援，大气候是不利于太平军的。加之存在以下

两个不利条件：

- 一 是水师在对方手中，处处受到封索，渡江困难。
- 二 是逆流而上，山地行军，极为疲劳，而对方可以程船来往，以逸待劳。

石达开明知道形势于己不利，但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远大计划，夺取成都，在四川天府之国建立一巩固的根据地，再争取在全国的胜利，不得不冒险犯难，向四川进军。从湖北进入川东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渡江北上，进取成都，而不是攻城掠地。渡江的时间越快越好，迟则夜长梦多。他第一次进攻涪州，是为了取得涪州为基地北渡长江，第二次进攻长宁，是为了在江安渡江，第三次攻占横江，是为了以横江为基地抢渡金沙江，这三次都受到清军的阻拦而失败，只有第四次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才甩开了清军顺利渡江，只可惜又在大渡河受阻而全军覆没。

他大张旗鼓地进军涪州，是想先声夺人，把沿路清军吓退，然后以涪州为基地渡江北上。目的是渡江而不是攻城，攻城只是为了渡江，如果渡江不成，攻城也就失去了意义。他在进军涪州之时，已知李蓝义军有部份队伍赶到对岸不远的鹤游坪迎接，如果两支友军分别从南北两岸向长江靠近，会师作战，渡江自然会很顺利。可惜事与愿违，李蓝义军的队伍当时冲不破清军与地方团练的阻隔，无法前来会师；因为大雨的耽搁进攻，让对方的援兵从容到达，清方水师已严密封索长江，即使打下涪州，渡江已经无望，徒然造成大量军民的伤亡，一向爱民的石达开是不愿意这样做的。这就是石达开从涪州城下退兵的真正原因

在清方援兵反攻之前，天已经得到李蓝义军难以来会师的消息，得到了清军水师封索江面的消息，决定绕道西上再觅适当的渡江地点，所以秘密下令退兵，经南川向綦江前进。因为是有计划的后撤，所以才能从容地整师而退。

（引者注：胡汉生先生在《李蓝起义史稿》中曾认为：。。。。。。据《续修涪州志》：“先是，邦道见贼渡江，即令城中人除妇孺外，皆登堞守垛。一人右垒砖瓦，左集灰罐。十垛为一牌。正副二人，侧安行灶，置釜，煎便溺防城。城口呼交令、接令，上下应和，不容停止。近东南城垛，守者隐垛下，避贼锐；入夜则燃草纸由洞掷出，令十垛以外人探头下视，恐



贼簿城也。”此时石达开若下令攻击，城上百姓，死伤必大。以“宁捐身以救民”的石达开只能有引退一法。”但笔者以为，战争之中，平民伤亡在所难免，兵法有云“慈不掌兵”，石达开自然深谙。避免军民无谓伤亡可能是促使石达开撤军的重要原因，但不会是根本原因，史式先生的论断，是具有说服力的)

#### (四) 补充说明

1 1987年四月，在涪州城外发现了一块残碑，据史学家考证后确认是当时参与抗击太平军的地主团练所留，记载了参加抵挡当太平军攻涪州的简单经过。碑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太平军败退的记载，可见清将是虚报战攻。

2 太平军在攻涪州前后留下不少爱民事迹，如前所述之仁义场，又如有一次，太平军见一农民负老妇人逃难，问所负何人，答说是老母，今已92岁，太平军即对他说，“愿尔寿如母寿。”这个故事表现出战乱之间，太平军对百姓的真诚祝愿，因而一直在当地流传。另外，石达开射入城中的训谕，是一份研究太平天国非常重要的文献。训谕中陈述了太平军恢复华夏，吊民伐罪的宗旨，痛斥地方官的残暴与无能，号召百姓起来共抗暴政。除了充分体现了石达开的爱民思想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涉及宗教，全文不带天父天兄字样。这是它与其他太平天国同类文书的一个重大不同点。正如台湾学者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全史》中下评语，它“全篇革命大义与爱民精神充分表露，不作宗教宣传之语，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是可传也。”该告示在当地人民中引起极大共鸣，许多百姓都响应训谕号召而投身于太平军。而告示原件也被当地百姓冒死保存了下来，世代相传，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交给新政府，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七) 巧渡金沙

#### (一) 围攻綦江的过程和撤军原因

(节选自史式《石达开自涪州，綦江撤军原因考》《太平军在四川》，翼王坪录入)

在向西进军的途中，石达开和部将们商议了一个新的进军计划，即虚攻江津，实攻綦江。江津在长江边上，为清军所注目，即使拿下此城，清军已把船只收到北岸，还是无法渡江，不如先攻綦河上游的綦江县城，这里是内地，不为清军所注意。如果攻下此城，可以征用綦河的船只，改装成炮船，顺流而下，进攻重庆。计划既定，分兵前进，以一支队伍虚弓江津，大军则长驱南下，进围綦江。分攻江津的队伍因为敌人有备而退回，会师同攻綦江。

进攻之前，本已约定城内的税朝南作为内应，可惜他们围攻的第一天，内应一事就被对方破获，税朝南遇害，敌军知道理太平军的进军计划，围攻就增加了困难。

4月25日，石达开到达綦江城外，全军陆续到达，在城周连营百里，四面围攻，数日不下。5月1日唐炯带兵来援，因见太平军事大，离城十里扎营，不敢靠近。此时《綦江县志》也有记载：“统领安定军补用知府唐炯带兵自南川来，扎营距城十里之乐生坪，因贼众不敢轻进。”足见石达开围攻綦江声势是很大的。

5月9日凌晨，太平军在綦江南门挖成地道，石达开下令炸城。轰然一声，火焰迷空，城墙炸塌十余丈。但是清军事先有所察觉，早已修好一道内城，又据内城顽抗。石达开张黄绸伞盖，亲自骑马督战，仍未能进城。此次战后不久，石达开即下令撤兵，全军西去。

太平军攻綦江，声势仍然不小，攻城之战虽然不是很顺利，也不能说是战败。为什么又突然撤军西去？其实和自涪州撤军是同一个原因：既然达不到渡江目的，就没有把城攻下的必要。

綦江不靠长江，距离江边还有一百多里，这样的内陆城，即使攻下来，对于渡江又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很多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綦江虽然只是内地小县城，且城滨綦河。綦河里有不少船只，必要时刻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如果攻下綦江，就可以征用綦河中的一切船只，改装成炮船，顺流进军，进占重庆。清军水师可以把长江里的一切船只一律驱靠北岸，但是无法控制长江两岸许多支流里的船只，顺流而下袭取重庆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内应被对方截获，消息难免走漏。在激烈的交战中，双方都缴获了对方一些辎重，敌人从太平军的辎重中截获了一批封条告示，例如封粮仓，封当铺以备设立各自机构的封条，安民告示，招贤告示等等。在綦江一个小县城里，是用不了几张这种告示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打算用于重庆。这样一来，太平军企图以綦江作为基地，水陆配合进攻重庆的计划就完全暴露，敌人可以采取种种措施予以破获，如在綦江攻城激战之时，清方扣留綦河中的船只，封索了沿途水路。石达开得到消息，知道即使打下綦江，也难以按预定计划行军，又何必旷日持久地攻城，虚靡时日。因此迅速决定撤军。

## (二) 进取长宁

(下文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翼王坪录入)。

石达开连续攻涪州，綦江，都不顺利，深感部下新兵太多，不能得力，必须选择一处适宜的地方，进行整训，加紧训练，才能提高战斗力。因此下令给先锋赖裕新，要他选择一块人烟稠密可以驻扎队伍的地方，”以便铺派各队置备军需，宣讲道理，训练兵士。一经军规整肃，再议进取机宜。”这时候，却连续传来两个令人高兴的好消息。一个消息是：李蓝起义军这时正在叙府八角寨活动，已经派人前来联络，希望配合作战。另一个消息是，南溪地方起义队伍首领张四皇帝正在江安，兴文一带活动，也派人来欢迎太平军。石达开觉得能和他们配合作战，就有希望从叙府一带打过长江，机不可失，于是决定全军南下，通过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县)的山间小道，先向永宁进军。命部下瑞天豫傅佐廷等人为先锋，昼夜兼程前进。(引者注：张四皇帝，即张正洲部，是李蓝起义军的一支，石达开入川之初便奉李永和之命率部接应，但当时未能接头，此次会师后即全旅加入太平军)

当时叙永有东西两座城。傅佐廷等人率领前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东城，李永和得到消息，以为石达开本人已到叙永，就派人送信来表示祝贺，还说自己即将率领队伍前来迎接。傅佐廷等人怕大军往来会惊扰百姓，不敢擅自同意，只好先写了一封回信，说明翼王还未到，双方合作的军机大事，要等翼王亲自到来，再做答复。可惜后来因受清军阻隔，两军未能会师。

太平军已入叙永东城，但是西城为下。为了号召西城和附件乡镇的人马归向天朝，傅佐廷等人又联名出了一个安民告示。告示中说：“我真圣主天王起义粤西，建都江南，金陵定鼎，

创亿万年有道之基，铁甲平胡，吐二百载不平之气。无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由是耕者耕而读者读，毋容迁徙而远遁，商者商而贾者贾，尽可乐业以如常。”这篇文告也和石达开给涪州四民的训谕相似，主要内容是对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民族大义，及太平军的爱民作风，对于太平天国所崇拜的上帝教教义一字不提，从这一点就可看出远征四川的太平军不作宗教宣传，和长江下游各地太平军经常大搞宗教宣传的情形截然不同。

石达开到达叙永之时，张四皇帝又来迎接。石达开很想依靠这支熟悉地形的本地起义队伍，合兵抢渡长江，所以立即挥军西进。1862年5月26日全军离开叙永，两天后，先锋赖裕新到达兴文城外，才知道此城已被张四皇帝攻占。张四皇帝见太平军到来，立即开城，请太平军进驻城中，自己却率部下退出城外。石达开到达后，就由张四皇帝引路，合兵进取长宁。6月1日开始围攻，至12日以火药炸开城垣，进驻长宁。这里距长江只有五十里，完全可以作为渡江的根据地。为了保固这块地方，石达开分兵四出略地，一时，兴文，古宋，叙永，庆符，高县，洪县一带，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活动。

石达开入川四个多月，转战一千余里，一直在想抢渡长江，进取成都。但因敌人严密封锁长江，未能如愿。这段时间里，两军战局起了很大变化。清军攻下安庆之后，逼近天京。天京被困，形势严峻。天京以下，清军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合组新式军队，使用洋枪洋炮，向苏南一带富庶之地的疯狂反扑，天京以上，由于青年英雄陈玉成被叛徒出卖，被俘后不屈殉国，形势迅速恶化。总之，太平军在中下游各地战场上处处失利。清军就得以腾出手来，抽调更多兵力对付四川境内的太平军。

老奸巨滑的骆秉章知道石达开一心保固长宁，是想以此作为渡江的根据地。也知道太平军一旦渡江，成都就岌岌可危。为了先发制人，他调集了四川境内所有的湘军和许多川军合力围攻长宁。除了从涪州尾随而来的湘军刘岳昭部，川军唐友耕部，唐炯部之外，又调来了湘军道员增传理部，川军总兵熊焕章部，反复环攻，志在必得。一时双方战况激烈，双方死伤均重。清军悍将唐友耕虽然多次负伤，仍然死战不退。

石达开见到清军云集，长宁江面封锁甚严，觉得在这一带渡江无望，不如暂时撤离，保存有生力量，就在7月12日主动放弃长宁，径叙永向川黔边界转移，休整部队，并且伺机出击，另觅抢渡的渡口。8月7日，李福猷率军在合江西南三十里的先市场大败湘军刘岳昭部，全军士气大振。但是石达开派人侦察的结果是合江以下，重庆以上，清军处处防江，无隙可乘。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决定绕道黔滇，向叙府以上的金沙江，也就是长江上游寻觅渡口。因为那一带地方山高水深，人烟稀少，清军难于处处设防，奇袭成功的希望要大得多。

9月底，太平军全部集中于川黔边界，作好入黔准备。石达开设大营于綦江县属的东溪镇，在这里，他召集诸将，商定了一个绕道进军奇袭成都的长期作战计划。即分兵三路，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分别由黔入滇，绕道上游，设法抢渡金沙江，石达开自领一路，仍从叙府以南地区进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会合，共取成都。以后，远征四川的这支太平军长期分兵作战，由赖裕新率领中旗队伍为先锋，李福猷率领后队，石达开自领中军也可以成为本军，就是在这时决定的。

1862年10月1日，石达开率领全军进入贵州，甩掉了集结在川南长江沿线的清军主力，乘虚蹈险，分攻桐梓，遵义，仁怀，绥阳，黔西，大定等府，正如事先所预计的，这一带清军甚少，没遇到什么阻挡，连著名的天险大娄山的娄山关都无人把守。全军到达大定时，两年前离开广西的曾广依正在附近活动，听说翼王亲自到来，十分高兴，率领部下前来归队。石达开与赖裕新，李福猷早已商定了分兵作战的计划，这时有了熟悉贵州情况的曾广依作为向导，就决定立即执行。全军暂分两路，一路是石达开的本军，西趋毕节，镇雄，重入叙永以南地区活

动。另一路由赖裕新与李福猷部，由曾广依作向导，南趋水城，郎岱，暂时合兵作战，到了适当的时候，再分兵前进，抢渡金沙江，然后前往叙永以西的木川司，三路会合，再延泯江而上，袭取成都。这样分路进步兵，可以迷惑敌人，使其不知道太平军的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赖裕新与李福猷深入贵州，一直打到郎岱，安南，永宁，11月下旬，分兵西进，以分敌势，这就是所谓郎岱分兵。李福猷进入云南后，经宣威向昭通迂回，12月中旬抵达金沙江边的副官村，准备从这里抢渡金沙江，进取四川屏山县。他们击败了扼守的清军，但由于找不到船只，无法渡江。不久接到石达开的命令，前往横江与本军会合。赖裕新部进入云南后，经沾益，平彝，直趋东川。赖裕新与石达开另一支由云南镇雄向东川迂回的中旗部队会合后，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按石达开事先的部署进入了四川凉山宁远府。之后与石达开本军失去联系。

石达开本军离开大定，经过毕节，于10月27日进入云南镇雄县境。这里是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没有什么清军驻防，太平军在这里从容休整，补充，并张贴募兵告示，号召贫苦人民，反清志士与地方起义队伍踊跃参加。告示中说：“主将匡扶真主，诛满夷之僭窃，整中华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拯英雄之困顿。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人原无告，共乐从戎。。。。。。本主将大开军门，广罗武士，收纳不拒万千，招募无论什佰。先教以止齐之节，复列于戎行之间。待之同如手足，用之以作干城。”这一告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了无数衣食无着艰难贫苦的人，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人，闯荡江湖漂泊无依靠的人。他们深信石达开“待之如同手足，用之以作干城”的诺言，纷纷参加。经过补充，仅石达开本军就扩大到十万余人。

### (三)横江大战

(下文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翼王坪录入)。

1862年11月15日，石达开率领本军由镇雄出发，分兵数路入川，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其中一路在东川附近与赖裕新部会合。石达开这次迂回行军，绕了一个大圈子，于11月下旬出其不意地击败了驻守川南的湘军，进占筠连，高县，前锋直指横江镇。不久就占领了横江镇以及附近的双龙场，玉皇楼等地，夹横江两岸为营，纵横数十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

横江是金沙江南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贵州威宁，经云南大关流出川境，至安边汇入金沙江。横江全江虽然只有五六百里，沿途支流颇多，水量不小，可以行船。横江注入金沙江时，水流甚急。涨水期间，如果从横江驾船而下，可以利用流水的冲力一直冲到北岸，瞬息可达，敌人虽有炮船，也无法阻拦。石达开进驻横江后，亲自到降口视察，认为这个计划可以实现，就决定长期驻扎，固守阵地，征集船只，作好抢渡准备。

当时部队已经征集了几十只小船，石达开立即组织人马，从11月24日至29日，多次进行试探性抢渡，都未成功。因为横江河道不宽，险滩甚多。船只虽是顺流而下，为了避让险滩，行船不能太快，再加上部队缺少远程大炮，没有充足的火力进行掩护，在敌人的炮船轰击和北岸清军利用拦船铁索，滚木垒石的重重阻扼下，难以成功。石达开和部将们都认为，从这里抢渡的设想是正确的，不过冬季水浅，行船难以充分利用水流的冲力。明年春节涨水，横江和金沙江水位升高，险滩都被淹没，船只顺流直冲而下，瞬息即到，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决定在这里坚守到明春涨水。在这段时间里，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尽力征集改造各种船只，训练水战人员，取土熬销，熔铸炮子，补充弹药，并且在横江上建搭浮桥，使两岸人马通行无阻。全军挖壕筑垒，作久守打算。

在新附众之间，必有不少船夫水手。石达开下令层层传达，公开征求能够从事水战的人员，命令中说，“誓必渡此金河，凡有能水战者，即到统兵大将处报名。果能渡此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予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赏水师。兵士之有功者，赏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赏侯爵豫爵。许多能够驾船洒水的人，修船造船的人，都踊跃前来报名。各个营地上都在打造船只，修整器械，训练人员，忙得热火朝天。

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屯聚横江，“誓必渡此金河”时，大为恐慌。他知道石达开大军一旦渡过金沙江，势必席卷川西，拿下成都。为了在这一场生死搏斗中取胜，他不惜孤注一掷，调集了四川境内一切可以调动的队伍来和太平军决战，一定要抢在春水涨发之前，拔除横江阵这个据点，以消灭心腹之患。他先后调来川军唐友耕部，熊浣章部，滇军杨发贵部扼守金沙江北岸，湘军臬司刘岳昭部，提督胡中和部，总部萧庆高，萧庆泗，刘景春，唐应聘，何胜必部集中于横江附近，四面围攻太平军的大营。

石达开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场大战，他立即回收兵力，将在高县，筠连和川黔边境活动的队伍调回大营，并把李福猷部也从云南副官村召回横江，集中了优势兵力，严阵以待，准备同前来争夺横江的敌人进行决战。

1862年12月上旬，各路清军先后抵达横江附近。横江上空，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次大战，清军方面势在必攻，不夺取横江这一块渡江基地，他们就不能安枕，太平军方面势在必守，如果失掉了横江这一渡江基地，抢渡金沙江的计划就会落空。

1863年1月8日，横江大战的序幕正式拉开。大战不是由清军进攻开始的，是由石达开派出部队分兵三路主动出击逼近双龙场大营的清军开始的。当时，太平军大队驻守横江两岸，石达开本人则驻守距江岸二十余里的双龙场。湘军提督胡中和，总兵萧庆高，何必胜等都逼近太平军营垒而扎营。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当天一早，石达开亲自指挥双龙常德太平军猛扑胡中和的营盘，其他各路太平军也纷纷出动。清军处处应战，大战全面展开。

石达开知道敌人已经全面进攻，就下令各部坚守营垒，以逸待劳，大量杀伤敌人。清军被遏制在太平军阵地以北，寸步难进，双方连日激战，相持不下。当时的情况，清军火器上占了很大优势，石达开部则占据了有利地形，太平军在横江阵，双龙场两处营垒森立，卡坚路险，清军仰面进攻，不断被炮，石击中，伤亡惨重。石达开又命部队在双龙场大营外增筑20多座营垒，下令各部坚守阵地，以逸待劳，彻底挫败敌人的进攻。

此役石达开部准备充分，作战异常英勇，清游击胡万浦，涂振南，胡得元，都司胡东山，卜修明，秦龙麟，守备李正才，罗辉四，匡惟喜等众多将领均被击毙。激战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天，太平军营垒巍然不动，清军大量伤亡，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情况，清军将无功而返。这意外情况是：一 胡中和打听到了可通往太平军大营的小道，第二，太平军内部出现了被收买的叛徒。

1月30日拂晓，清军倾巢出动，从北面向太平军阵地猛扑，太平军沉着应战，据垒回击。激战中，胡中和率领湘军沿小道而至，对太平军营垒进行夹击。敌人的火药射入太平军营房，引起冲天大火，战士们在烈火中坚守不退，有的部队弹药在火药用完后，拿起铁锅和石头砸向敌人，有的操起刀矛，同敌人肉搏鏖战，表现得极为顽强。湘军三个营攻打太平军的一处街垒，整整围攻了半天都打不下来。

正在这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叛徒郭益集与冯百年率其部下 3000 人突然哗变，在双龙场纵火内应。双龙场是石达开部队的大营所在，是太平军的总指挥部，一旦出事，军心动摇。石达开在激战中，不得不分出一部份兵力前去镇压叛变，削弱了正面防御力量，使刘岳昭部湘军得以乘虚而入。石达开看到大营已经被敌人攻陷，部队腹背受敌，无法继续坚守，被迫将部队从横江一带全部撤走。第二天，石达开率军由燕子滩渡过横江，全军退入云南境内

这次横江大战，太平军坚守 22 日，敌人伤亡惨重，束手无策，但在关键时刻，竟然败于叛徒之手，使得抢渡金沙江的计划落空，令人惋惜。1 月 30 日最后一仗中，部队伤亡上万，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石达开在镇雄一带招兵是，来者不拒，以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既招来了成千上万的好兄弟，也混进了一些投机份子。叛徒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石达开接受了这个惨痛的教训，以后在进军途中，不再像先前那样大招新兵，对于新接受的兄弟，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因此，这样的事以后就不再发生。

石达开进入云南后，活动于永善，镇雄，昭通，东川一带，这时他找到了赖裕新部的一些伤员，从他们口中得知了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部队的消息。这支部队于 1962 年 12 月中旬到达东川，年底于米粮坝顺利渡过金沙江，深入四川宁远地区。他立即集结部队，决定跟踪前进，渡江入川。

为了迷惑敌人，不使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去向，石达开采取了声东击西的部署，命令李福猷率领三万余人的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贵州进军，经威宁，水城，平远。大定，遵义，仁怀，桐梓，绥阳，直趋四川，造成反攻川东和东趋湖南的声势。敌人果然中计，一时都把李福猷部误认为是石达开的本军，各部清军纷纷追赶。等到敌人弄清楚时，石达开早已率主力四万多人几乎未遇阻拦的情况下渡过金沙江，朝着成都进军了。

至此，石达开终于突破了清军苦心经营了一年半的长江防线，在他第四次进入四川之时，未动一刀一枪，便顺利渡过金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成都而去。

#### (四) 补充

1 攻克叙永的石达开先锋傅佐廷人未敢作主同意让李永和率部前来迎接的理由是怕大军经过“惊扰百姓”，有学者认为，这几名中层军官缺乏魄力，使石达开白白失去了一支熟悉四川情况的颇有实力的友军汇合的机会。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即罗尔纲先生所说的，“害怕惊扰百姓而不让对方前来迎接，由此又可看出太平军对人民的爱护了。”

2 傅佐廷等五人联名发布于叙永的告人民谕，表现了太平军一贯的爱民精神，它的特别之处，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石达开远征军的思想情况。它的最大特点，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言，“论中首尊天王，而后及翼王石达开，又称石达开为五千岁，这是杨韦内讧前的旧制，我们从石达开部下对天王的尊崇与对石达开依旧制对石达开的称呼，与石达开训谕涪州人民仍用天王封授他的职衔互相参证，也可以看出石达开没有自树一帜的表现。”

发布本文的五个人，事迹来历全不可靠。而发布此谕的时候，远征军全军十万人中，属于石达开远征到广西之前加入的不过一万多人，考虑到这一万多人中还有不少是石达开离开天京后新招募的，则实际全军将士中属于内讧前参加起义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他们又长年转战于西南地区，和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相隔万里，在这种情形下，极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石达

开本人可能仍然以太平天国“翼王”自居”，将自己的行动视太平天国的一个战场，但他的部队中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视自己为天国的一份子，只是想跟着翼王为帝图皇。

正因如此，在距远征军最后覆灭仅一年的时候，由几位来历甚至姓名都不可考的中层将领所发布的告人民谕，就成为考察远征军思想状况的重要依据。文章一开篇就说“我真圣主天王起义粤西，建都江南，金陵定鼎，创亿万有道之基，铁甲平胡，吐二百载不平之气。无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重兴复汉室于维新者也”，将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委陈述得清清楚楚，文中又多次提到“我天。。。。。”，足见石达开的部下仍然非常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太平天国的一份子，而不以为自己是一支独立的队伍。

正如苏双碧先生所言，这份文告可以说明“石达开并没有当着他的部下对洪秀全有所非议，而是教育全军秉承太平天国的革命宗旨”“正因如此，石达开所部其成员虽多有更换，军纪却始终没有败坏。”

3 石达开在川黔滇各地所贴出的召兵告示，是一份带有宣扬意味的告示，对了解石达开远征军的信仰宗旨等有很大帮助。

告示首先阐明了太平军的宗旨是“整中华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前者是推翻满族统治，后者是救民于水火。文章的用词十分考究，“诛满夷之僭窃”，说明太平军针对的是满族人“窃华夏神器而自居”的行为，而不是满族人这个群体。

文章前半部分所针对是贫苦百姓和有志之士，后半部分则是针对各地义军。文中指出，人民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是阶级压迫(如“又有替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民族压迫(如“英雄以事夷而羞，甘屈志于泉石；豪杰因勤王不遇，犹隐逸于蓬门”)，因此号召生活无依的贫困百姓，隐身林泉的有志之士，以及胸无大志的各路义军，共同参加到太平军“整中华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的事业中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洋洋洒洒，对立国用兵的宗旨及招募人才的标准说得面面俱到，又张贴于三省各地的告示，全文无一处涉及“上帝”“天父天兄”等宗教用语，因而与《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一样，可以作为石达开远征军后期已完全放弃宗教迷信，转以“驱逐鞑虏，解民倒悬”为宗旨及号召的重要佐证。

另一个可从告示中看出的是，石达开部在远征后期仍基本坚持了“募兵制”，和江南太平军后期大量掳人为兵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正因如此，入川远征军在数量上尽管远远不及江南太平军，战斗力较之早期太平军亦有下降，但内部比较团结，虽然作战条件远较江南艰苦，但到1863年6月石达开就义为止，极少发生投敌叛变之事，与江南太平军动着数万，甚至十几万人投敌的情形迥然有异。

5 石达开率军经过贵州大定(又说是川黔边界的雪山关)时，曾留下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即当地有众多苗民聚居，因感于太平军的军纪严明，和对百姓的帮助爱护，遂以待传统的贵宾之礼款待石达开及太平军将士----他们起美酒于地下，插以吸管，置于中央；升起篝火，载歌载舞，欢迎翼王。石达开为感谢苗族同胞的深情厚意，打破太平军禁止饮酒的惯例出席宴会，并即兴赋诗一首：“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八) 浴血渡江

### (一) 抢渡大渡河

以下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翼王坪整理录入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亲率本军四万余人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因为这一带的清军都被李福猷部太平军所吸引，无人前来阻拦，渡江十分顺利，过江之后，沿会理侧上德昌。一路上也没有见到清军，只有地方团练略作抵抗，一击即溃。5月1日，他们攻克宁远所属的河西重镇，驻军樟木箐，营地纵横二十余里，5月3日，宁远清军数千人来攻，石达开设伏于安宁河畔，将清军杀得片甲不回。

石达开驻军樟木箐时，有当地居民赖由诚来献策。石达开接见了。他说，北上成都，必须先渡过大渡河。去大渡河的道路有二，一是大路，经越西，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二是小路，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大路略远，小路略近；大路较平，小路较险。上次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军与彝兵必有防备。小路虽然险窄，全未设防。这次进军，以小路为宜。石达开接受了他的意见，把他留在军中作为向导，下令从小路进军。

石达开和他部下的一些老兄弟，长征万里，身经百战，曾经越过无数高山大水，突破无数险隘雄关。但是在宁远的山间小道上进军时，却不得不为这一带山水的奇险所惊叹。尤其在铁宰宰，高山峭壁之间，只有一线可通行人。人马鱼贯而行，全无回旋余地。十多天中，数万人马有如一条长蛇，在古来荒无人烟的万山丛中蜿蜒前进。

石达开在向紫打地进军之前，打听到这一带地方彝族很多。这些彝族居于高山，生活艰苦，性格强悍，只受土司管辖，与汉人很少来往。为了避免发生磨蹭，石达开在进军之前，向沿途各土司发文告，说明太平军的来意。文告中说，“满清异族，荼毒中华已极，天王拔举义师，大张挾伐。天兵纪律之师，望所到之处，约束所属百姓，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这样，沿途多数土司都能听从他的劝告，双方相安无事。主要少数土司受清军利用，想来截夺太平军的辎重，发动袭击，但是都被击退。

5月14日清晨，太平军前锋到达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大渡河古称峨江，又称银河，发源于青海，两岸雪山绵亘，到了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既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能泅渡。两岸之间交通只靠少数渡口和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太平军当时所到之处，是大渡河南岸番族(即今藏族)土司王应元所管辖的紫打地，这里北濒大渡河，西濒松林小河，东南两方都是崇山峻岭，是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场。得到太平军将来的消息后，土司采取坚壁清野，强迫居民走避，粮食也都运走或烧掉，太平军到时，只剩下几个老弱居民。

石达开亲自来到大渡河边，观察地形。横亘在他面前的大渡河虽然乱石磋峨，波涛翻滚，但他还是很放心，因为眺望对岸，完全不见清军的影子。几个月来虽然没有接到赖裕新的报告，途中也还能听到一些消息，知道中旗部队已经顺利从大树堡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这就会吸引敌军跟踪追击，使得自己所率领的本军可以乘虚而入，奇袭成都。



他下令征集当地仅有的几只木船，立即运送几百名骑兵到北岸去，侦察沿河上下数十里内有无清军踪迹，限定当晚回营。这些骑兵回来报告说，对岸全无清军。大家这才放心。

番族土司王应元已经受清军收买，所以对太平军抱着敌对的态度，他把松林小河的索桥上的木板撤了据河扼守。在太平军到达之时，他命令士兵用劈山炮轰击太平军。石达开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只因自己的队伍尚未到齐，而且地形不熟，所以不和他一般见识，隔着松林小河打了一阵枪炮也就算了，并不主动出击。

当天夜里，天气突然变化，大雨滂沱。直到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不停。石达开带着赖由诚等向导多人，冒雨来到河边观察水清。只见河水逐渐上涨，到了傍晚，居然上涨数丈，不仅大渡河中波涛排山倒海，白浪滔天，连松林小河也翻翻滚滚，犹如沸水。涨水的消息传遍全军，大军都很忧虑。但据向导说，现在还未到涨水季节，只是山洪爆发，一两天就会退的。大渡河真正的涨水，还在一个月后。大家这才放心。

因为在山路上长途行军，人马都很疲乏，石达开下令休息三天，并派人征集船只，编造竹筏，作好渡河准备。5月17日，天气放晴，水势稍稳，太平军把船筏拉到河边，准备出发。但却隐约见到对岸清兵旗帜。石达开立刻下令把渡河的队伍重新编组，作好敌前抢渡的准备。

当天下午，石达开派出精锐千人，分驾船筏，沿河抢渡。清军唐友耕部刚刚到达，不明情况，为了给自己壮胆，拼命施放枪炮。大渡河河面很宽，子弹射程不远，纷纷落水，很少命中。敌人的子弹根本不足畏，可惜水流过急，船筏到了河心，控制不住，难以前进。为了避免无谓损失，石达开下令收兵，准备在水势平稳的时候，集中兵力，大举渡河。

石达开率领本军轻装急进，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还不到一个月，这是完全出乎骆秉章意料之外的。太平军到达紫打地的当天夜里如果没有涨水，第二天他们就将大举渡河，直捣成都，骆秉章也许就会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可惜涨水阻碍了太平军的进军，这就给骆秉章造成了布置反攻的好机会，他和刘蓉共同商定了一个计划：

一 派川军重庆总兵唐友耕，雅州知府蔡步钟率领兵勇八千防守大渡河北岸，阻止太平军渡河北上。

二 命番族土司王应元带番汉兵勇扼守松林小河，截断太平军前往泸定的道路。并以提督胡中和率领湘军三千人进驻化林坪，都司谢国泰部进驻猛虎岗，作为王应元的后援。

三 派南字营都司王松林率兵把手箫箕湾，擦罗一带，切断太平军向南退往宁远的道路。

四 派越西同知周歧源，参将杨应刚，都司庆吉带来土司岭承恩与彝汉兵勇从竹马岗北上，堵住太平军东进得道路。

骆秉章尽管布置得面面俱到，但是想要击败太平军，必须守住大渡河，如果太平军抢渡成功，不仅包围计划成为泡影，成都也将岌岌可危。他深知石达开是个极有谋略的军事家，是个不易对付的敌手，因此调兵遣将之后，仍然昼夜担心。

在大举渡河之前，石达开一再布置疑兵，迷惑敌人。他派出一些小队伍沿河上下到处流动，白天多张旌旗，夜里多大火把。清军从对岸眺望，只见太平军不断移动，既不知道主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队伍要到何处去，常常自相惊扰，调整兵力，变换防地，闹得人困马乏。

5月21日，雨过天晴，江山如画，大渡河水位已经下落。石达开选定了这一天，激励将士，大举渡河。上午，除在营地担任警戒的队伍之外，全军将士都开到河边助威。经过再三挑选的五千精锐，陆续登上几十只木船与几时只竹筏。他们以盾牌护身，腰配利刃，手握钢矛，在一片呼啸声中破浪而去。岸上将士摇旗呼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惊天动地。

这些破浪而来的太平军将士，都是经过万里长征身经百战的勇士，只要登上河岸，谁也挡不住他们的去路。清军不断施放枪炮，太平军虽有伤亡，毫不气馁，仍在波涛起伏的河心奋勇前进。渡河眼见就要成功了，在岸边呐喊助威的太平军将士忍不住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想不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河水突然暴涨。在滚滚而来的洪峰冲击下，木船打翻，竹筏冲散，将士纷纷落水，没有打翻的船筏，也被急流冲走，不知去向。这次抢渡，太平军百战精锐五千人，无一生还。

大渡河水暴涨，石达开为怕旷日持久，陷于被动，决定转移进攻方向，抢渡松林小河，准备沿大渡河南岸向泸定进军。次日即亲自督战，挥军抢渡松林小河。

松林河河面虽宽，水量不大，枯水季节，行人可以涉浅过河，这时涨水，水石相激，一片浪花。既不能涉浅，又不能行船，只靠一座铁索桥维持。河对面就是番族土司王应元的驻地。他听说太平军金银无数，一心发财，所以死心塌地充当清军走狗，下令所管束四十八寨居民坚壁清野，不留一粒粮食，并强集士兵和地方团练扼守。5月22日，太平军抢渡松林河那天，王应元已经调集各族兵勇二千余人，在河西岸三十里处处设防。

石达开见对方人数不多，就决定在河口上下几里路内处处抢渡，使敌人防不胜防。这时满河都是急水流涡，想涉水过河，简直无法下脚。将士们就手握长竹竿，三五人，七八人联在一起，互相支持，共同涉水。但是河心有道深沟，水急如箭，难以跨越，一人跌倒，相联的几人也都站立不稳。跌下深沟，撞上乱石，立刻粉身碎骨。在急流之前，就是平时渡河也危险万分，更何况是敌前抢渡。因此十之七八都冲不过那条深沟，少数过了沟的，冲到对岸已筋疲力尽，都被敌人刺倒。这一天，从早血战到晚，依然过不了河。

5月23日，石达开移兵至河口以上十里的磨坊沟抢渡，这里河床较深，河面较窄，没有乱石险滩，可以泅渡。他挑选了善于泅水的将士数百人，口衔利刃，同时泅渡。对岸防守敌人不多，只要泅渡过去的人能够抢占一段河岸，抢渡就能成功。看着泅水的将士在河中迅速前进，大家都抱着极大希望。可是河水乃雪山水汇入，冰寒彻骨，游了一段时间，手脚麻木不灵，转眼间就被急流冲走。即使费尽力气，爬上对岸，也因手脚僵硬，行动不便，立即遭到敌人的毒手。石达开又命人赶早了几只大船，于夜间放入河道，首尾用铁环扣住，作为浮桥，以此来突破敌人的河防。但河道崎岖，船只上下颠簸，铁环被冲断。抢渡仍然失败。

石达开率领大军向紫打地进军时，知道这一带粮草难筹，所以对全军需要的粮草是带够了的。他们到达紫打地时，见到王应元的土兵据险抵抗，估计抢渡时要发生战斗，就不把粮草带到紫打地，而保存于紫打地东南五里的马鞍山大营。当太平军全力抢渡大小两河时，土司岭承恩却领兵偷偷来袭击大营。

这个岭承恩从来就是太平军的敌人，当赖裕新率领中旗部队北上时，恣为了发财，拦路抢劫，在白沙沟设下埋伏，用滚木擂石打死了不少太平军。他既和太平军解下了难解的仇恨，也就只好一心为清王朝效劳。当石达开全军通过铁宰宰北上后，他就率兵用巨大木石堵塞山间小径，阻断太平军的退路。

太平军初到紫打地时，军锋锐不可当，岭承恩不敢来惹是生非。直到这时太平军抢渡连续失败，兵力锐减，他才大胆来抄后路。为了发财，他始终注视着太平军的马鞍山大营，因为其中存有大量军粮辎重。

5月29日夜，岭承恩倾巢出动，偷袭马鞍山大营，他们四处放火，趁火打劫。太平军将士为了保护粮草，拼命救火，无暇进行反击，陷于被动，伤亡甚重。石达开得到消息，大为震动，连忙派来援兵。大营虽然夺回，粮草已经损失，太平军从此因为缺粮而陷入困境。五六天后，存粮已经吃完，只好煮食树皮草根，甚至忍痛宰杀战马，最后连鞍辔也煮食一空。

6月3日，石达开大会将士，引咎自责，说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以致全军陷入困境。他激励大军说，“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济江湖，如履平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将士们明明看到进军不利，是为洪水所阻，这时石达开说是自己的责任，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愿意决一死战。当天深夜，分兵三路，全军出动。两路抢渡大渡河，一路抢渡松林小河，一时船筏皆出，火把齐明，人声鼎沸，山鸣谷应。

抢渡大渡河的将士们口衔利刃，手挺长貌，准备死战。当夜水势未退，河心浪涛汹涌，船筏十之三四，都被激流卷走。将士们抱着血战过河，有进无退的决心，与河心的激流勇敢搏斗，未被卷走的船筏飞速前进。北岸清军看到南岸一片火光，知道太平军又要抢渡，沿岸严加戒备。太平军船筏靠近哪里，他们就聚集到哪里拼命抵抗。既是黑夜，又在急流如箭的洪水中，哪能选择靠岸地点。船筏到了岸边，往往撞上岩石，立时破碎。少数上了岸的敌人，尽管奋力冲杀，杀伤十倍八倍的敌人，但是因为吃了几天树皮草根，体力不济，最终还是壮烈牺牲。从深夜血战到天明，抢渡仍未成功。

抢渡松林小河的情况大致相似，6月4日清晨，石达开得到消息，各路抢渡均已失败，悲痛万分。但全军将士依然斗志昂扬，顽强苦战。石达开部队被困于紫打地一隅“战守俱穷，进退失据，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阅时一月，而军心屹然不动，其得士心如此，岂田横之客所可同日而语哉？”石达开在紫打地挥毫题诗曰：“大军乏食乞谁余，纵死峨眉定不降”。表达了与全军将士同生共死，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为了让将士们死里求生，宰辅曾仕和向石达开建议，写一封信给王应元，许以重酬，请求让路。石达开本不愿向王应元低头，这时见到将士们又饿又病，心情沉痛，决定一试。第二天，即6月5日，石达开写了给王应元的训谕，拴在箭上，射入王应元营中。这时太平军粮尽援绝，抢渡无功的情况已为王应元深知，他想得到的是太平军全部的金银财物，所以一口回绝。石达开不得已，又写信表示愿意出高价买粮，仍被严词谢绝。在对王应元绝望后，石达开又写信给岭承恩，表示愿意以重金买路。岭承恩不给回信，却以加紧进攻来作回答。

船筏俱尽，抢渡无望，石达开知道长期困守紫打地不是办法，北面是大渡河，西濒松林河，南面是高山，只有向东突围，还有一线希望。突围中如果没有清军阻拦，或得以冲过，东进到上海棠的大道，就能脱离险境。

6月9日中午，石达开率领六千余人向东突围，朝小水前进。看到太平军放弃营地，突围东去，清军都司谢国泰，土司王应元等才敢发动追击。他们共同攻入空营，掠夺财物，然后付之一炬。太平军于6月9日离开紫打地，10日晚到达利济堡。在这两天中，清军与土司兵对他们只敢遥遥尾追，不敢逼近。将士们无限悲愤，他们都很明白，敌人士不足畏的，这次进军失败，主要是败于洪水，败于饥饿，而非败于敌人。

10日晚间到达利济堡时，发现拦在面前的老鸦漩也在涨水，一片汪洋。他们几天来鼓足勇气，舍命突围，是由于还有出险希望，这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树皮草根，罗掘俱尽，已经到了绝境。人人悲愤填膺，热泪长流。大家不愿意束手就擒，决定次晨与追兵决一死战，虽全军战死也在所不惜----“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计议已定，石达开就怀着满腔悲愤来与家人诀别。他的王娘马氏在紫打地突围前已服毒自尽，另几位王娘吴氏，潘氏，胡氏，为了消除他的后顾之忧，不在战败后被俘受辱，也抱着两位幼子携手投河，还有一位王娘刘氏带着石达开的儿子石定基，由两名侍卫保护，于深夜攀上逃出险境，打算去寻找李福猷，以后再兴兵报仇雪恨。将士们患病受伤难以力战的，不愿被俘受辱，也相继投河自尽。

既已下定必死决心，曾仕和就向石达开提出一概诈降的建议。他说，由利济堡南十里可到凉桥，过桥就是洗马姑场，听说那里颇有存粮。我们可以拔队先行，向那里的清兵投降，伺机抢占洗马姑，如果成功，就能转危为安，重振军威，如果失败，也不过一死而已。突围的希望此时极为渺茫，即使诈降，敌人难道就会轻易上当？但事已至此，与其待死，不如一试。石达开是个爱兵如子，义重如山的人。他觉得将士们面临这不幸的结局，全是身为主帅的罪过，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全部署的生命，哪怕以死去换取也在所不惜，于是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11日，即下令全军南行。

太平军方面，直到6月10日晚上，才提出诈降出险的策略。但在清军一方，自从太平军紫打地被困，就不断商量诱降的办法。不过他们的高级官员和下层军官又有不同想法，四川总督骆秉章，布政使刘蓉等老奸巨滑，非常世故，他们知道石达开是不可能投降等，因此只能以诈降为手段，达到诱擒而加以杀害的目的。下级军官如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等人都很佩服石达开的文才武略，很想争取他真正投降过去，既立了大功，有能交上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因此在招降中是很卖力的。

6月11日，太平军还没有派人去联系清军，杨应刚，王松林已经亲自前来招降了。当时双方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停战谈判。杨应刚，王松林知道石达开是个硬汉子，以荣华富贵来打动他是不行的，也知道他一向爱护部下，所以劝他为了保存部下的生命而牺牲一切，石达开慨然答应，双方谈判的结果是，休战后，清廷不再对太平军将士追究罪责，一律遣散归田。石达开愿意自己一身承担一切责任，只要部下能够保全性命，自己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一切具体办法，由石达开自己到洗马姑军营和周歧源当面商定。谈定后，太平军全军进驻洗马姑。

这次谈判中，双方各有各的想法，杨应刚，王松林认为，只要谈判成功，就算立了大功，至于对石达开本人如何处理，那是上级的事。他们相信只要石达开肯作官，朝廷是会加以重用的。石达开，曾仕和认为，只要太平军将士能够暂时脱离险境，就有伺机袭击东山再起的希望。诈降成功，可以重振军威，诈降即或失败，只要部下能够保全性命，石达开也甘心粉身碎骨。不管成功或失败，他自己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

当晚到达洗马姑，经过反复谈判，商定对石达开部下六千人先遣散四千，暂留精锐两千，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等骆秉章回文再作处理。杨应刚等人则在洗马姑设宴招待太平军将士，圈大家安心。

石达开答应这样的条件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晚如果发动袭击，将士们体力太差，一旦冲突，未必能操胜算。既然可以保留二千精锐，携带武器移驻大树堡，不妨把行动略微退后。大树堡是南来北往的通途，粮食充裕，到了那里，更容易成功。

6月21日，预定遣散的四千人遣散完毕，6月13日一早，留下的两千人重新编队，不愿意遣散回家，死活都要追随石达开，他们仍由石达开部下周宰辅指挥，作为前队先行，向大树堡进发。

人马行进中，突然人喊马嘶。原谅，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隔岸观火，等招降成功，就迫不及待地跑出来抢功，把石达开和其子石定忠，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抢到自己手中。这不仅打破了杨应刚亲到成都报头功的美梦，也使石达开与其部下脱节，诈降计划落空。

石达开等人离开后，雅州知府蔡步钟按照唐友耕的布置，开始行动。他增派军数营到大树堡。与原先驻扎的都司唐大有，参将张福胜，都司庆吉会合。尽管二千太平军局促于一隅之地，他们还是不敢贸然进攻，而要等到半夜，才从四外放火，想把太平军烧死。太平军将士从梦中惊醒，奋起反击，但火光中容易暴露目标，大都被火抢击中，只要少数人夺路杀出，大都战死。逃出的太平军流入民间，群众同情他们，就把他们掩护起来。

## (二)关于诈降与舍命全军

是“诈降”还是“舍命全军”？这个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关于舍命全军这一点，争议不大，如史式先生就认为，“石达开当时有舍命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等的想法。他当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诈降成功，固然可以东山再起，纵然失败，至少也已经存活了四千人。”

也有史学家不同意诈降说，认为这一说法出自《擒石野史》，但此书中很多记载并不确实，尤其是完全提有听到杨应刚，王松林诱降这一重大事件，因此不足为信。

本人个人赞同“诈降”与“全军”思想并存的推断，“诈降”思想，本来就是石达开在置生死于度外后产生的，“全军”是目的，诈降是手段。

不过我认为所谓的诈降，决不是说想让敌人真心以为他会投降而是在在首先确保四千将士生命的情况下，是否存了可能脱险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诈降说是有道理的。当然，石达开并不是指望着有逃脱的侥幸，才赴清营的。如果有万一的机会，他也未必会坐失。这里牵扯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留两千精锐下来，而遣散的是四千伤兵和老幼病残？为什么没有全部遣散？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怕清军翻悔。在这四千人没有离开前，如果清军不遵守约定，对他们动手，这两千人就可能有所行动，就可能影响到生擒石达开。因为最初石达开所赴的清营离两千精锐所在驻地不远。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石达开在四千人没走掉之前反悔，那么那四千人就活不成。正因为石达开知道清军把生擒他看得重于一切，清军也知道石达开把那四千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性命重要，双方都相信对方不会轻易冒险，所以这个协议才能达成。

从以上分析看，石达开遣散的四千部众基本是活下来了，在骆秉章给皇帝的奏章中也说遣散了四千人。骆秉章应当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欺君。

很多资料都能从侧面证明，石达开所部未被杀绝。

史式先生在《石达开舍命全军考》证实，“我访问了不少当地群众，他们言之凿凿，证实了太平军後裔仅在石棉、越西、甘洛等地就有数千人之多。”

1995年12月，甘洛县中学教师谭黎在向《四川日报》采访组讲述了他撰写毕业论文作社会调查时说“位於乌斯河、金口河一带的高山上，生活着石达开残部的後代。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有些与不同。”《四川日报》采访组辗转数千里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发表了《大凉山：太平军後裔探秘》一文，证实了当地留有不少太平军後裔的事实，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在漫长的生活和特殊的环境影响下，已成族”。

70年代末，刘伯承元帅由夫人汪荣华代笔，给中共四川省委致信：“在红军长征中，我由会理奉毛主席命令任先遣司令，经四川冕甯强渡大渡河时，在冕甯大桥驿找到一个姓陈的向导。他原籍湖南人，他的父亲是石达开的前队营的兵，对去大渡河道路很熟。他做向导对我们帮助很大。”1986年10月1日《解放军报》刊登的《刘帅不忘革命有功人》一文中详细介绍道：“……徐宝珍（陈志喜妻）向女儿们详细讲述了当年的事情。红军长征来到冕甯，刘伯承将军就住在她家，并问陈志喜，怎样才能顺利通过区。陈志喜建议红军做好当地族头人中最有威望的小叶丹的工作，并说自己和小叶丹是乾亲家，可以把他请来。不料小叶丹不肯前来，是陈志喜去向他宣传刘伯承提出的“伤他一根毫毛愿意当中柱赔”的保证，才解除了小叶丹的顾虑，促成了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

《四川彝族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的调查显示，石达开余部(包括四千人及剩下两千人中的幸存者)的後裔在石棉，甘洛，越西三地就有数千人，还有不少移居到其他如冕甯，西昌等地区的。而这仅仅是被遣散后留在四川地区的部分。有多少人后来又重新回到两广或江南地区，已不可考。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巫达，在《城镇与种群》调查中，也提到“甘洛县的汉族成份，有政府鼓励的移民，也有军队掩护下的军屯，还有其它突发事件流落到甘洛的汉人。比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边被剿灭，石达开的军队被打散后，许多人逃入甘洛的彝区和汉区。到1990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时，甘洛县全县有148,008人，其中汉族为54,269人，彝族为99,262人，汉族的人口比例已经很大了。”

《夹江乡土志略·文苑·补一课·过路人》记载了一位当地教书先生的事迹，当地口碑流传，他和另一位武师都是大渡河畔逃生的太平军，临死前向当地人说出现真相，“我当年兵困紫打地，翼王看到大队人马已无法入川，便改变主意，把队伍化整为零，叫我们分散潜进四川。。。。。”

在四川涪陵一带，有一个很奇怪的姓----“陈没”，据考证，他们就是石达开部太平军的后人，“陈没”与“长毛”谐音，是一种身份的暗记。

2001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太平天国》播放，大渡河附近有太平军後裔拿出祖上所传与剧中相同的太平军佩刀。

至于没有留在四川而返回广西和江南的石达开余部，则已很难考证，但综上所述，石达开的“舍命全军”绝非没有意义的幻想，他的牺牲换回了四千将士的宝贵生命。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九)千秋余响

### (一)从容就义

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周洵《蜀海丛谈》

1862年6月18日，唐友耕率领清军数百名，押解石达开等五人前往成都。石达开携子乘轿，曾，韦，黄三人乘马，仍一色天朝衣冠，气宇轩昂，乃至沿途士民争相瞻仰翼王风采。一路上的地方官都办了上等酒席招待他们，如迎贵宾。这些地方官都慑于石达开的威名，佩服石达开的才能，唯恐在自己管区出事，承担不起，因此态度十分恭敬，丝毫不敢侮慢。一路之上，莫不如此。

一行人于25日到达成都，骆秉章一见石达开，便问“汝欲降否？”石达开坦然凛然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九泉当拜公赐。”骆秉章不敢贸然进行公审，便先派人私下与石达开谈话，石达开在讲述太平天国历史及个人经历时，口若悬河，应答不穷。石达开并没有留下任何亲笔自述，后来骆秉章在奏章中所附的所谓自述，就是这次谈话的摘要，而且篡改了很多

6月27日，骆秉章在四川总督府大堂上进行会审，当时署内署外，刀枪林立，堂上堂下，警卫森严。堂上坐的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与省司道一级的大员，堂下兵丁人人弓上弦，刀出鞘，一片杀气腾腾。大家都知道要审讯的是威名赫赫的石达开，当犯人带到时，许多差役大声吆喝，想给自己壮胆。石达开缓步登堂，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三人随侍左右。他们穿的仍然是天国衣冠，身著太平天国黄缎龙袍，脚踩黄缎靴，头戴黄风貌，石达开的风帽上更绣有五条金龙。他们从容自若地穿过刀枪箭林。石达开立定之后，向全堂扫视一周，全堂鸦雀无声。堂前放着四个拜垫，那些差役们是想让他们下跪受审，石达开等看着拜垫，却在上面盘膝而坐。那些差役面面相觑，左右无一人敢喝其下跪。

清制满人担任的成都将军位在总督之上，故骆秉章让崇实先问，但崇实却“音低，不知做什么语”，大不起声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石达开“昂头怒目”的反驳下，崇实更“气沮语塞”，狼狈不堪，被驳得说不出话来。骆秉章只好亲自出马为他解围，但石达开“桀骜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他在答话中痛斥清廷无道，大讲革命主张，救国道理，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不仅两旁差役兵丁听得发呆，连堂上一些官员都为之动容。骆秉章觉得难以下台，乃自我解嘲道，“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冷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遂起身从容就绑。赴刑场时，石达开仍从容缓步，部将曾仕和，黄再忠左右侍立等候，齐声说“仍旧请主帅先行！”石达开遂放步前行，昂然赴刑场，两部将左右护卫，韦普成跟随在后。

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成都百姓到刑场上来围观的达数万人。大家都想看看翼王的风采。敌人公开行刑，是想杀一儆百，其慑服作用，想不到他们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不仅许多百姓深深感动，连监刑的官员也都叹服气。凌迟酷刑开始后，刽子手持刀碎割曾仕和“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立即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刘蓉称其“临刑之际，神色怡然”，骆秉章称其临行前“桀杰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身为地主文人的周洵，在记载石达开受刑经过时，这样写到：“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引者注：以上这些记录，几乎都出自石达开的敌人，以及与他站在敌对立场的人的记载，他们也不得不惊叹甚至钦佩石达开在受审时表现出的胆识气度和临刑时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气概。大量关于石达开受审和受刑的表现，由唐友耕的亲兵告诉周洵，写入《蜀海丛谈》中。唐友耕的弟弟则将从唐友耕处听到的一些情况告知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写成的《书

巨寇石达开石达开就擒事》和在松林河阻截石达开部的土司王松林的记室许应儒写的《擒石野史》都充满了钦佩与惋惜，后者甚至伪造出《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一文，代石达开写下“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的心声。

此外，据薛福成记载，石达开受审时曾评品清方著名将帅，但现存的《石达开供词》中这些内容已全然不见，原因不难推测，因为石达开“于当世诸将负盛名者皆加贬辞”，骆秉章想必亦在其列。当然，如果骆秉章能够驳倒石达开，自然不妨将供词上呈，但倘若他对石达开的贬斥无以为辩，那这段供词是万万不能用呈御览，否则，他谎报邀功，篡改真相的行为就不免传诸天下了。但从石达开对清方将帅多加贬抑，而且对于敌人的询问反诘“应答不穷”来看，现在留存的远征军历史中恐怕还有不少是骆秉章刘长佑等将领为了邀功而扭曲事实，诬败为胜，除此之外找不出他们将石达开供词中品评清方将帅的部份完全删去的动机。

但薛福成是曾国藩的幕僚，因此他的笔记中还是保存下了一小段石达开对曾国藩的评价：“谓曾文正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覩也。”这段对曾国藩曾国藩优缺点的评价应该说是基本客观的)

石达开就义之时，年仅 32 岁。

## (二)关于大渡河一战

史式《石达开远征是非得失考》王洪峻《论石达开的入蜀》

进入四川后一年的战斗，使石达开认识到了长江天险在突破上的巨大困难，因而决定发挥太平军“惯走边地，避实蹈瑕，……善陟奇险，蹊幽径”的特长，绕道川西，直取四川腹地。大军之前，先后分兵两路，一路由李福猷率领，回攻川东，牵制川东敌军不得向西；一支是赖裕新部中旗，先本队北上，吸引防守清军，造成防御漏洞，以利主力伺机入川。这两支牵制部队都发挥了作用。赖裕新率领的中旗部队于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渡金沙江”，进入四川西昌地区。为吸引布防清军，赖部不急于过大渡河，而是直到把骆秉章派来阻击太平军的肖庆高部湘军等来了，才与之接仗，然后，牵着肖部向后转，过大渡河，冲入了川西平原。据《新繁县志》记载：“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入蜀，其前哨悍将赖剥皮(裕新)，率劲旅四万自邛州趋温江，逾羊马河，省城大震。”骆秉章慌忙调集川西地区清军堵截，命肖庆高部守彭县，何胜必部守什邡，唐友耕部守邛州，进行合围。中旗太平军将士英勇奋战，“复兼程冲去，飘忽如风雨。”突破清军包围之后，又分兵两路，死死把清军主力背在身上。一路北上绵阳，“突入绵东刘家河，旋被楚蜀各营跟踪追剿，赖不敢停，向梓潼窜去。”一路冲向什邡，“楚军湘军果护军桂字等营踵至，贼不能支，分股宵遁而去。”这样，川西清军的湘、楚、蜀军各部均被中旗牵制住了。加之川东清军要防御李福猷部，在整个防御体系上，“南路空虚”的漏洞已经出现。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石达开率兵二万余，由滇渡江，循会理侧上。”三月中旬到西昌，十八日歼灭了当地的地主团练武装。十九日入冕宁，走小路奔向大渡河，于三月二十七日(公历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顺利抵达河边。而此时的骆秉章，还被蒙在鼓里。关于上面所谈的情况，唐炯有记载说：石达开入滇后，骆秉章“檄桂字营驰赴西昌，赖文光(误，应为裕新)已掩至，桂字营败。赖文光(裕新)定越嶲间道，出邛州，昼夜狂奔，绕川西走川北入陕。诸军相率尾追。时琴鸣黄丈在幕府，阅宁远报，石达开至紫打地，言于骆公”，骆秉章这才大梦初醒，“急檄唐友耕振武军备大渡河。友耕尚驻邛州，他军远不及也。”邛州距大渡河迢迢数百里，按一般情况估计，唐友耕部就是昼夜兼程赶到，石达开部太平军也一定从容渡过了河。但是，特殊的情况发生了，据《名山县志》记载：知府茅步钟奉命“挑选习战团丁，随赴清溪堵



大渡河。县团抵岸之翌日，石达开开始到，会水涨防严不得渡。各民团虽勇，何能抗石？适逢水涨，殆有数焉。又数日，提督唐友耕兵至。”又据《越嶲厅全志》记载：石达开部“由冕邑奔越嶲属之紫打地……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而贼……为河水阻逼，不得渡。”其他有关石达开部太平军为什么没有立即过河的记载。在“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石达开在抵达紫打地后，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及时渡河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倘若不是气候、水文条件的突然变化，石达开部太平军渡河无疑，那就决不会有紫打地的失败。

多年来，人们每每指责石达开用兵不慎，误入绝地。这是不明真实情况所造成的误会。紫打地原非绝地，大渡河亦非不可逾越的天堑。石达开的先行部队赖裕新所部数万人在未涨水的时候，三四天就全部渡过了河。石达开部在紫打地的覆败，实在是遭受洪水突然袭击所造成的。骆秉章的奏报就足够说明问题“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乃复稍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

### (三) 余部的战斗

石达开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余部还在各地转战，坚持抗清斗争。

当时在四川还有不少太平军的零散部队活动，他们都是石达开的部下，除石达开本军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赖裕新率领的中旗部队。

赖裕新是从金田起义起就在太平天国旗帜下转战的将领，1859年底石达开在江西分全军为五旗，赖裕新率领的就是“中旗”。在无后方，无援军的贫瘠的大西南转战万里，不断有将领在艰苦的环境下对前途失去信心，脱离而去，特别是1860年朱衣点彭大顺等68将领的脱离，使石达开的处境一度变得异常危险和困难，“时穷节乃见，患难见真知”，在这个时候，赖裕新依然坚定地留在石达开身边，给他最为可贵的支持。在元宰张遂谋死活，赖裕新就成为石达开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既是配合默契的战友，又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赖裕新无论是在石达开麾下作战，还是独立转战，都秉承石达开一贯的思想和精神，可以说，石达开的部队的一切优良传统，都在中旗部队得到了体现。例如爱民的思想：赖裕新率部转战至越西地区时，清军与地主团练拼命抵抗的同时，越西德贫苦人民却热烈欢迎太平军。青龙嘴的群众摆了十桌酒席招待太平军，太平军在每张桌子放一锭大银，表示酬谢。中所坝的群众在太平军到达时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在桌上摆了一面镜子，一盆水，比喻太平军如水之清，如镜之明。太平军得到群众的帮助，连续击败敌军，大队长驱北上。

当中旗队伍已经进入陕西省时，石达开率领的本军正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正因为中旗队伍转战千里，成功地实现了石达开的战略布署，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大量敌军的任务，石达开率领的本军才得以乘虚而入，直抵大渡河南岸，还没有被敌人发觉。如果不是大渡河突然涨水，石达开就可以在没有敌人拦阻的情况下顺利渡河，进取成都。因此，中期队伍长期力战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文后附冯一下《赖裕新和中旗部队的战斗历程》介绍中旗和石达开分军后的经历：

除了赖裕新的部队，还有另外一支值得一提的队伍，就是李福猷部。

在石达开远征军的将领中，李福猷可以说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1862年初，他和赖裕新与石达开分兵三路，进取四川，会师涪州，从此成为石达开部下地位仅次于赖裕新的独

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但是在此之前，“李福猷”这个名字却不见于任何记载，以致很多史学界都怀疑他就是在湖北开来凤城迎接石达开的绿林领袖李洪。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他是在1861年夏石达开回师贵县时曾与石达开配合作战的贵县龙山起义领袖，后来加入了石达开的部队。石达开认为他“颇知调度”，因此很快对他委以重任，而李福猷也没有辜负石达开的信任，在此后两年的转战中屡建功勋。

1863年四月，石达开决定跟踪中旗部队，抢渡金沙江西进时，命李福猷率领三万人进军贵州，回攻川东，作为疑兵。李福猷忠实地执行任务，大张旗鼓向东进军，把清军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使石达开率领的本军得以顺利渡江。李福猷经云南镇雄入贵州毕节，5月3日由仁怀东进遵义，5月29日与清提督田兴恕大战于绥阳大关，7月到达务州。而后按预定计划回攻川东，准备与石达开主力配合作战，于8月20日攻克黔江。之后见官府文报，知道了石达开率领的本军已经覆灭，石达开本人已经牺牲的噩耗，就改变计划，不再深入川境，转而向湖南进军，10月进入广西省境，以后又转战湖南，广西，广东各地，1863年12月初，李福猷战败后受伤被俘，英勇不屈，就义于广州。

李福猷的余部在他牺牲后，一部分由他的弟弟李福忠率领，转战于广西和贵州两省，曾多次得到苗族群众，特别是苗族义军的支持，一直到1871年才失败。

而这支部队的另一部分，则归入了石达开部将亲天燕李文彩的队伍，进入贵州，与余老科领导的苗族人民义军和罗光明领导的斋教军联合作战。从1864年2月起，李文彩率领的太平军先后曾与余老科和潘名杰率领的两支苗族人民义军联合作战，1871年3月，又与苗族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会合，两军共同作战，直到1872年3月才最终被镇压。

李福忠和李文彩的部队，都是太平天国坚持时间最长的战斗队伍，特别是李文彩，是整个太平天国起义中最后一支失败的部队。他们的战斗让太平天国的旗帜在天京失陷后又飘扬了长达八年之久。

他的余部，分为两支，一支是和他分兵作战的他的弟弟李福忠部，李福猷被害后，他继续转战于贵州和广西之间，一直坚持到1871年才在贵州被最后镇压。另一支则和石达开部将李文彩会合一处，

### (三) 深远影响

出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

太平军在四川的活动时间为时不长，前后不过两年，地区不算很广，四十多个州县，但对于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是太平军的入川，传播了反清思想，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当时南北各地作战的太平军，全都宣传上帝教的教义，坚持拜上帝的仪式，这些迷信活动大大冲淡了反清的宣传。进入四川的太平军不再宣传上帝与灵魂升天的幻想，而是大力宣传民族大义，鼓励人民奋起反清，他们提出的誓灭胡虏，复兴中国口号能够深入人心，激发民气，所以在他们经过的地方与邻近地区，人民抗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其次，太平军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打击地主豪绅，消灭反动团练，把财物粮食分散给穷人，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

还有，太平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经常帮助农民解决困难，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川东一带，叙南地区与贵州西北都做过这种工作。川南黔北各地农民歌颂石达开帮助他们买种子，农具的民谣一直流传至今。

太平军在四川的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与湖北两省同时成为反清的首义地区，绝非偶然。

-----  
台湾学者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写到：“综观翼王远征之后，历时七载(余部直斗争至同治十年未算)，所过地域共十五省(苏皖赣浙桂湘粤黔滇鄂川西康陕甘)，行程约五万余里(余部，分化各部未算)，实为世界历史上有数之长征。人类有此奇异而伟大的活动，诚值得详细纪录者。”

然而由于建国后左倾思想的影响，太平军在西南战场的战斗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一支从革命中分裂独立出去的流寇，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这么说，目前太平天国史学界对太平军在西南战场作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革前的水平。虽然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评价有所改变，但论及对史料的甄别，对真相的考究，对战略的分析，仍处于极低的水平，大量相关文章引用史料不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盖全，甚至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即使是业余水平的人，只要稍微接触史料，也可以轻易提出诸多质疑。

《石达开远征始末》的重点在于军事，主要想澄清三种印象，一是认为石达开的军队实质已经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仅保留了形式上的一致，二是认为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重大失误，是“削弱了天京也削弱了自己”的自杀行为，三是石达开自离开天京后就处处碰壁，没打过象样的仗，对清廷而言全无昔日的威胁。围绕以上三点，引述了大量事实予以了澄清和反驳。

作者不敢说，《石达开远征始末》所写的就是历史的全部真相，或者就是一定正确，客观。“远征始末”最重要的目的，是将在“天经地义”“众口一词”中被长期忽略的一些问题予以提出，借此给石达开和远征军的将士们一个历史回身的空间。

至于石达开远征军的作战对太平天国战略全局的影响，还是让我们引用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吧----

“石逆素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恃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伏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实有裨于大局”。

附录：冯一下《赖裕新和中旗部队的战斗历程》节选：

石达开部由湖北利川入四川石柱。中旗在赖裕新指挥下，经过多次血战，于1862年12月31日(同治元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由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经披沙、普格、河西、占德昌，进逼宁远府(今四川西昌)，有众三、四万人。此后两个半月时间，中旗始终在会理、德昌、宁远一带活动。中旗此行的目的，“本欲由峨眉、嘉定窜扰叙府，接应石逆渡江以犯省城”(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引中旗被俘指挥龚义慎等称)但因石达开不久即从横江退入云南，所以中旗无法执行此计划。而到3月初，当石达开放弃永善，率主力向巧家一带前进时，3月19日中旗立即离开西昌迅速北进。到4月3日，石达开部前锋已出现在会理凉风营、吃水沟、仰天窝等处。可见中旗始终在坚持执行接应主力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并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对此，石达开是这样说的：“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

大路前进……，达开即率众渡金沙江，经宁远。”（《石达开自述》）骆秉章分析中旗的战术时也说：“此次中旗败匪，足下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皆已跟踪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为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等折》）

1862年3月19日，中旗沿安宁河西岸小径急速北进，至礼州、泸沽、经冕山，直逼越西。越西同知周歧源率参将杨应刚、百长雷显发、土司岭承恩等官兵土兵，登陴顽抗。3月23日，中旗大队乘夜从中所坝冲下，“火炬遍山，威如风雹，趋绕教场而东，人似蚁阵，旗帜如林，”（《越西厅全志》卷六《武功》）向越西发动进攻。狡猾的敌人利用熟悉地形地物之便，由岭承恩带土兵绕西山潜出腊关，在中旗必经的小相岭白沙沟的山上安设滚木擂石。3月24日，当中旗大队进入白沙沟时，滚木擂石俱下。中旗损失很大，大部分士兵奋勇杀出。是役，赖裕新为滚木击中，不幸牺牲。部队“复推唐日荣、杨远富并领其众”（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3月25日（二月初七日）到达保安营。保安营“地极陡峻，有雄观万山之状”（《越西厅全志》卷二《关隘》）。清守军都司赵仁，因恐营内兵单，以攻为守，出营接仗，结果被中旗战士击毙。几天之后，中旗抢占大树堡，以布匹连船为浮桥渡大渡河。（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说中旗“涉浅”抢渡大渡河，不可信。）正渡之间，清经历张溥纠集力量，分路反扑，破坏了浮桥，中旗后队未能过河。已经渡过西南巨壑大渡河的中旗队伍，使骆秉章大吃一惊，即飞调防守金沙江以阻止石达开的川省清军主力唐友耕部速去堵截。中旗渡过河后仍继续北进。4月5日绕过清溪，攻占荣经。4月9日放弃荣经。因雅郡（四川雅安）敌有重兵，故不走直通雅郡大路，而从小河场经鸭子口入山走小径。在山区得到各地逃来掏挖金沙的穷苦弟兄的帮助。他们自愿充当向导，带领中旗直趋天全。清军最担心这支部队东去蒲江，南攻乐山、犍为一带，断绝盐赋收入，影响本已十分紧张的军饷来源，便派唐大有、刘德谦抢先占领要隘之地。中旗与敌展开战斗。4月18日（三月初一）大战方酣时，唐友耕部赶到。中旗与唐友耕部战于邛崃火井漕地区的油榨沱（清和场）、高场一带。“两军相遇，舍死迭扑，唐军几不能成营”（民国十一年《邛崃县志》卷四《兵事志》）。唐军中有先锋张某，亡命顽抗，这才稳住阵脚。中旗后撤，张某拼命跟追。观音阁外，路旁有一大碑，一中旗战士埋伏于后。当张追至，中旗战士一跃而出，出其不意地杀死这个恶棍。这一战，中旗坚持了三天，终因腹背受敌，众寡悬殊，牺牲上千人，指挥龚义等人被俘。第三天晚上，中旗偷越敌营，进入大邑、崇庆山区。后由崇庆的怀远进入川西平原的边缘，攻占温江新场，郫县花园场，距成都已经近了。清军朱桂秋，肖庆高，刘德谦部追击，各地团练截堵。中旗于4月15日在彭县北三十里之敖家场为清军追上，双方战于场南小石枝河上的朱蹄桥一带。中旗占据阵地应战，并以马队突敌阵，但因极度倦劳，战斗不利，又损失上千人。余队向什邡李家碾转移，准备进攻什邡县城。因清军何胜必部已先至，中旗转向德阳孝泉、罗江略坪、三台葫芦溪一线。5月1日，行至江油，敌又追至，中旗与清军连续大战。战于马鞍寺，清参将何世华趾高气扬，匹马突阵，被中旗用从敌那里缴获来的洋枪击毙。又战于东安场，巷战之中，歼灭被敌称为“勇冠全军”的百长赵洪发（据光绪二十年《江油县志》卷十一“坟墓”）。再战于黎雅场一带，毙当地反动团练头目张道平。打退敌人攻势后，5月3日中旗经马阁（角）进至平武地界，在沙窝子击溃团练狙击。这一带山穷径僻，清军为追击中旗，早将锅帐沿途寄顿，现粮草缺乏，不敢冒险深入。中旗得以摆脱长期尾随的敌人，于5月5、6日由平武山内进至甘肃文县毕（碧）口一带。

这个时候，陕西正是各路义军汇集之区。陈玉成派遣的太平军入陕部队在启王梁成富、扶王陈德（得）才和遵王赖文光等的率领下，远征西北。过五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子十二年（1862年）冬由郟阳而进兵汉中，一路攻无不克（《赖文光自述》）李永和、兰朝鼎起义军余部张第才、兰朝柱、曹灿章也活动于陕西。1863年9、10月太平军进围汉中，张、兰“皆迎附之”，“两股合并，众号十万”（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李黼堂方伯书》）也就在这个时期，中旗东出阳平，与陈德才军汇合。“前准大咨，言伪启王已至褒城，与中旗合股。”（《代刘蓉函稿三件》，见《太平天国资料》）至同治2年12月23日（1864年1月31日）黄彭年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还说阳平关为中旗占据，并透露清方正调兵遣将，妄图夹击，

“了办中旗，则后路无虞”（《太平天国资料》）。可见，中旗仍被敌人视为一患。这以后中旗的行踪就难以考察了。1864年2月，陈得才部回援天京，未至，天京已陷落，11月陈得才在湖北英山地区服毒自杀，近二十万大军败亡，中旗应是其中的一部分。

研究中旗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他们在四川的战斗，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中旗将士和石达开部队的广大将士一样，是一支优秀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貌应该得到颂扬。第一，他们担任的是为石达开主力开路的先行任务，目的是引诱敌人“跟踪中旗一股，不暇回顾”，石达开大队即“乘势急进”；使敌“骤不及防”。为此，赖裕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裕新败死，余众穷日夜力兼行，飘忽如风雨，闯入陕西，欲引官军追之北，俾南路空虚……”（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仍是坚持这一目标。石达开也正是继中旗以后，自率大队由滇之米粮坝渡金沙江，经宁远至冕宁的，只不过到冕宁以后，石达开“恐大路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石达开自述》），到大渡河边紫打地。第二，他们有长期坚持独立作战的能力。清军归纳石达开用兵特点是“凡经过之处必分其党为数路，每路复分为数起，使官军不暇兼顾，得以肆行奔突”（《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五）。经过长期锻炼的中旗有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早在渡金沙江前中旗就单独活动，以后又在赖裕新领导下独自为战。赖裕新牺牲后，他们在唐日荣、杨远富领导下，冲破难关，渡过大渡河，并根据情况的新变化，调整作战计划，横穿川西，引诱敌人。这一切是在长期与石达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难能可贵。第三，他们顽强无比，前仆后继，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中旗部队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从金沙江打到川北山乡，行程数千里，和敌人进行过无数次鏖战，近逼过成都，取得击毙都司赵仁，参将何世华，先锋张某等战绩，而这一切是在既无后援，又无粮饷，前有团练堵截，后有清军追击的情况下进行的。骆秉章说石达开“不惮险远，最善伺隙乘虚”，这句话，很能说明中旗的战斗作风。面对这样一支坚韧不拔的战斗队伍，清朝官员哀叹：“越山逾险，疾如飘风，我师竭昼穷追，若不能及，前股方逸，后股踵至，用是疲于奔命”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第四，他们善于争取各地人民的支持，敌人诬称中旗在会理“裹胁烟帮游匪不下三四万人”，在荣经裹胁淘金沙匪徒为之向导（骆秉章《奏为中旗发逆折》），在云南“裹胁七、八千人”（据《佚名日记》，载《太平天国资料》）。这些材料正说明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中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去，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第五，他们实现了与兄弟部队的联合作战。这些都是中旗十分突出的地方。